

# 中国社会语言学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 2018 年第 2 期 )

田海龙 主编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中国社会语言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田海龙

编委会副主任 周洪波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志耘

陈瑞端

程祥徽

高一虹

谷晓恒

郭龙生

郭 熙

胡松柏

梁 云

邵朝阳

苏金智

田海龙 (天津商业大学)

汪 磊

徐大明

周洪波

周庆生

主 编 田海龙

副 主 编 邵朝阳 郭龙生 (执行)



# 目 录

## 陈原先生纪念专栏

### 春风两度忆故人

- 纪念陈原先生百年诞辰····· 江蓝生 (1)
- 在陈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田立新 (4)
- 传承陈原老师的学术思想, 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 苏金智 (6)
- 陈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综述····· 郭 松 (10)

## 论文

- 晚清“国民”概念考····· 曹 青 (13)
- Attitudes Towards World Englishes Among Chinese Intercultural Volunteers:  
A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Study* ····· Gao Yihong Xu Hongchen (29)
- 高中生对世界英语态度的实证研究····· 张 茜 刘宏刚 (52)
- 澳门本地大学生性别与语言态度相关性研究····· 阎 喜 (65)
- 詈语使用的性别差异样本分析  
——以英雄联盟游戏主播为例····· 许 婷 (75)
- 京张两地城市语言景观的状况、问题及建议  
——以北京市延庆区和张家口市区的公示语景观为例····· 王帅臣 (84)
- 澳大利亚华裔的中文母语保持和身份认同: 历史与现状····· 沈椿萱 姜文英 (100)
- 香港南亚裔学生学习中文的研究调查及政策建议····· 李楚成 梁慧敏 (112)

## 书 评

### 语言变异研究第三思潮的新发展

- 评《中国的语言与社会变迁——大都市普通话消除平庸》  
····· 刘永厚 张 颖 (132)



# 春风两度忆故人

## ——纪念陈原先生百年诞辰

江蓝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十四年前,也就是2004年10月26日,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出版家陈原先生逝世,享年86岁。我没有及时得知消息,此后也没有写过任何纪念文字,但是内心对于他的离世是很惋惜、很沉痛的,而且这种痛惜的感情随着岁月的推移越发加深了。有些人,当他在世的时候,当你想见就能够见到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可贵、幸运,只有当他走了,走得越来越远、再也回不来的时候,才会突然懂得有他在多么好,也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巨大损失”,对国家、对集体、对自己。陈原先生对于我就是这样的前辈。

我是通过阅读陈原先生有关论著认识他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博学,读了许许多多的书。他的脑子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通。他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具有专业知识这是可以想见的,令人惊奇的是,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举凡文史哲、政经法诸多领域都广泛涉猎,其中在语言学方面还有精深的研究。他精通英语,还会世界语,对拉丁语、俄语、日语等其他语言也多通晓;他的脑子里装着古今中外的知名人物、大小历史事件、各种思潮学派乃至种种轶闻趣事,因而在文章中、在讲话时,都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他精通编辑出版,具有世界眼光,参与策划并主持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在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所积累的时代文明的精华,“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他深知辞书出版事业的重要性,主持并参与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辞书出版规划的制定,并为规划的落实竭尽心力地鼓与呼。《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辞源》第二版的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的劫后重生都与他的推动有关。他深知辞书编纂者的艰辛,多次说“搞词典工作的甘苦,不搞这工作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出来的”,甚至还说出了“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这样石破天惊的警句(1980年11月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的讲话)。作为

党和政府文化事业的领导干部，他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善于辩证地分析对待客观事物。例如在《关于词典工作中若干是非界限》一文中（《中国语文》1977年11月），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九个方面深刻地辨析了被“四人帮”一伙故意混淆的是非界限，其中关于词典和政论的界限、客观态度和客观主义的界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封、资、修大杂烩”的界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革命的文风和帮八股、繁琐哲学的界限的辨析尤为精审。作为一名辞书工作者，我深感此文的观点和思想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再如，他曾主管国家语委工作，抓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但是他跟别人不同，强调要研究语言文字的变异，指出“变异同规范是矛盾的统一，没有变异就没有规范，没有规范也就看不出变异”。他指出：“不要只看到变异的消极作用，而无视变异对于丰富语言并且使语言更加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这种积极意义”，他提倡“社会语言学既要研究语言变异的消极方面（即冲击并妨碍规范化的方面），也要研究语言变异的积极方面（即丰富语言表达力和适应语言交际需要的方面）”。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法，非常深刻，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网络语言、网络文学、网络信息等问题都极具启发和参考意义。读他的文章，听他讲话，你能感到他在政治原则上的刚性，也能感到他实事求是、通情达理的柔性。他是运用语言的大师，他的文章逻辑性强，语言朴实简约，幽默风趣，激情洋溢，一泻千里，有真性情，能感染人，一如他的为人。我深感，像他这样真懂马列，能在非常广博深厚的中外文化知识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行政领导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专家型领导干部是多么宝贵、难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今天，在我们为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这样既立足本土和传统，又放眼世界和全球的睿智远见的文化带头人、策划者和富于革命激情的实干家。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纪念他百年诞辰的现实意义吧。

我跟陈原先生相识得很晚，只有两次实质性的接触。第一次直面对是1998年上半年，那是一次只有三个人参加的特别午餐会。说是午餐，事后得知，原来是一次面试。当时商务馆的总编辑一职付阙，陈原老有意推荐我，但又不知我的底细，于是，让时任商务馆总经理的杨德炎同志安排了这次午餐见面会。陈原先生和蔼可亲，春风拂人，使我一下子就没有了与长辈、名人初次见面的拘谨。吃饭间，陈原先生问我对办好商务有什么建议，这个突然袭击让我措手不及。我对于出版业完全外行，哪里说得出什么建议，但又不好什么都不说，就无知者无畏，搜索枯肠地说了几句。没想到陈原老高抬贵手，让我通过了这次面试，报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调我到商务工作的程序，虽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原因中止了这件事，但陈原老的知遇之恩却记在了我的心头。以我浅薄的学识和



习惯于书斋生活的性格，根本担不起这副重担，而他对我竟然如此看重和信任，让我惶恐不安，像背着块沉重的巨石，实在是承受不起。那之后，连续两年春节我都到前三门他的寓所去探望、拜年。

说起陈原老前三门的寓所，我的印象是逼仄而狭小，所有的空间几乎都被书和家具占满了，书房像个作坊，而作坊的主人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写出了洋洋洒洒、穿越时空的华章。当时我有些为陈原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和文化名人抱屈，觉得他应该有更好一些的居住条件，但回看陈原老，他谈笑风生，乐呵呵的，好像从未考虑过这类事情似的。有一年春节我去看他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记不清他家里是门钥匙还是电闸什么出了问题，他有些无奈，我连忙给杨德炎同志打电话，杨总很快找人给解决了。

我跟陈原先生有联系的第二件事是《赵元任全集》的编辑出版。这是陈原先生在八十高龄时为商务馆推荐并亲自谋划的一个重大出版计划。自1999年起，陈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亲自担任全集的编委会主任，筹划和定夺重要事宜，又抱病为全集撰写前言，终于使皇皇20卷，2000万字的《赵元任全集》得以隆重推出，为学术界完成了一件大功德事。记得编委会成立之时，他曾两次提议让我当主任，这简直是开玩笑，我吓得连连反对，并直言这是非常不严肃、不妥当的，让我何以自处！虽然，他的提议应该理解为长者提携后进之意，但是他能想到并提出这个建议，却很能代表他宽厚、大度、慈爱的秉性和属于他的那种大家风范。他后来抱病为全集撰写了七千余字的前言，还差一个结尾没写完就住进了协和医院。商务馆命我为全文补个结尾，我奉命战战兢兢写了几行字，是真正的狗尾续貂。聊可自慰的是，这几行字见证了我跟陈原先生两辈人之间的一丝文字缘分。

在《赵元任全集·前言》末尾，陈原先生对后十卷的内容这样写道：“这十卷的内容展示了这位语言奇才怎样把他的智慧扩展运用到音乐创作、文学翻译等艺术领域的；展示了他的博学，他的勤奋，他的淡泊，他的豁达，他的幽默，他真挚的友情和温馨的亲情。”我读到这里，深感这一段文字其实是夫子自道，是知音者的惺惺相惜与灵犀相通。不是吗？每一个跟陈原先生共过事的同事朋友，受过他教导的后辈学生，都会感受到“他的博学，他的勤奋，他的淡泊，他的豁达，他的幽默，他真挚的友情和温馨的亲情”，都会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党的文化战士而痛惜。

陈原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文化出版事业，并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纪念他，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把他关心并为之奋斗终生的文化出版事业、辞书编纂事业、语言学研究事业做得更好。

哲人行已远，两度沐春风，谨以上述文字表达一个晚辈对陈原先生的敬意和怀念。

2018年12月21日

# 在陈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田立新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北京 100032）

尊敬的各位前辈，

各位领导、专家、来宾：

今天，大家相聚在商务印书馆，共同纪念陈原先生诞辰 100 周年，缅怀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在编辑出版、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追思和学习他伟大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精神风范。

陈原先生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出版业投身到语言文字领域，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他为语言文字事业呕心沥血，集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于一身，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语言规划的研究与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原先生是著名的出版家、翻译家和社会语言学家，他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开创者，也是中国语言规划活动的实践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语言规划研究的理论家。先生在担任国家语委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期间，支持、倡导和策划了现代汉语若干要素定量分析工作，主要是字频测定、常用字测定和通用字测定。现代汉语字频测定的成果 1985 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其结果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由以往的定性分析过渡为从定量到定性分析的一次具体实践，开辟了语言文字研究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局面；常用字测定的成果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 年 1 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通用字测定的成果是《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 年 3 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2013 年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也是在对多个语料库进行字频统计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以上两表是重要的基础。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当前，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蓬勃发展，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成果颇丰，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的多次批示，为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方向。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实施《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来，我们进行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形势下语言文字工作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大语言文字工作”的发展新思路的构建，立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大视野，树立高站位、全覆盖、广动员、深合作的大格局。国家语言能力全面提升，重大工程实施不断取得新突破，分管共推、上下联动的语言文字工作大格局基本形成，语言文字工作迈向国际步伐明显加快。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先生的努力和奋斗是分不开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是踏着前人开拓的脚步，感受到先生在社会语言学研究 and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中的开拓和重要奠基作用。

在陈原先生的一生中，“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是他始终遵循的箴言，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站在新时代新的起点，我们要继承陈原先生严谨治学、有情怀有担当的精神，将他留下的丰硕成果和精神财富永远传承下去，为语言文字事业繁荣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各位！

（2018 年 12 月 21 日）

# 传承陈原老师的学术思想， 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

苏金智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北京 100010）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组织陈原老师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同“四人帮”破坏出版工作的斗争中，陈原老师是个有胆识有担当的出版部门的领导者。在中国文化受到“文革”严重摧残后，在文化重建过程中陈原老师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陈原老师为出版界解放思想，进行对外出版合作交流、传播知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不仅让陈原老师在出版工作中大显身手，也促发和成就了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陈原老师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大好局面。

陈原老师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是在接触了欧美社会语言学理论之后，对中国的语言使用现状与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尤其是对“文革”的语言暴力与语言拜物教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苏金智，2018a）。陈原老师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因此他把自己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戏称为“自留地”。《社会语言学》（1983）一书出版后，王宗炎教授说陈原老师是社会语言学的“专业户”“重点户”（王宗炎，1984）。美国社会语言学家马歇尔（David F. Marshall, 1990）说陈原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国著名方言学家张振兴（2016）认为中国社会语言学走了一条与西方社会语言学不同的道路，功劳是陈原老师的。

在缅怀老师的同时，重新阅读老师的遗著，思想上再次接受老师的洗礼，学术上又有了新的收获。继承陈原老师开创的中国流派的社会语言学的学术思想，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应该怎样合理地去继承，本文拟谈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认识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作用，尤其是要正确认识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当前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社会语言学是中国学术体系中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它对推动中国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作用。社会语言学在推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在推动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语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作用更为明显。但是，由于这门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因此也常常被传统的学科所忽视，难怪陈原老师曾经幽默地跟我们说“不入流”。老人家有时还称自己是“杂家”。作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者，不应该自卑，也不要自夸。一个新兴学科的发展，是需要时间和付出的。只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有付出就一定有收获。中国社会语言学经过大家四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当然，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也是没有必要的。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定位和作用，只要认真做好研究，都能为学术事业作出贡献。陈原老师在《语言与社会生活》（1980）一书中对语言灵物崇拜进行了批判，在当时的社会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仅让人们认识到现代语言迷信的荒唐可笑，也让人们对语言文字的功能有了正确的看法。《社会语言学》（1983）一书中批评了把语言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错误做法，对语言相对论假说也进行了批驳。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过分强调了语言的功能。把语言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者认为语言具有阶级性，因此人们应该利用语言进行阶级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陈原老师认为语言是为整个社会成员服务的，是没有阶级性的，决不能被一个阶级“没收”或“垄断”。阶级语言是不存在的，但是语言使用存在着阶级差异。语言相对论假说认为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陈原老师认为这种假说是违反唯物史观的，是不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陈原老师进一步批评了受这种假说影响而夸大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观点，他说：“名能够改变现实，名称能够决定社会进展，天地间未必有如此令人捧腹的事了——可见这个‘假说’对西方某些学术生活影响之深”（陈原，1983: 109-110）。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批评话语学界，都仍然存在着过分强调语言社会功能的倾向，这种倾向会误导人们走向夸夸其谈、脱离社会实际的歧途，这不利于客观地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利于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更不利于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设。

第二，要处理好外来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关系。

陈原老师的社会语言学是在借鉴欧美社会语言学理论，在具有中国学术传统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罗常培等前辈的影响下创立的。没有欧美社会语言学家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就没有社会语言学这个学科，中国也不会产生具有自己流派的社会语言学。我们决不可以、更不应该妄自尊大，但也不应该妄自菲薄。过去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关注与国际接轨问题。或者准确点说，比较关注这个学科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如果让我们选择表达方式，我们更愿意用“对话”“对接”而不是用“接轨”。因为用“接轨”似乎有点看不起自己的意思，有好像人家是正宗的，是研究的中心，我们得跟

人家接上茬的意思。用“对话”似乎平等些。因为“对话”是双方的，我们要了解对方的行情，对方也要了解我们的情况。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同人家对话，不首先了解人家的东西也是不可能的。了解西方主要社会语言学流派的观点和西方语言与社会文化的特点是社会语言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了解得越多越好。社会语言学是一门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学问，如果不根据中国的特点来研究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并且大胆创新，而是简单地套用一些根据外国社会文化特点得出来的理论方法，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语言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拿中国社会语言学与国外社会语言学比较时，不应该以西方社会语言学研究为标准来评价中国的社会语言学，而是应该把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看成是国际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流派，一个继承了中国悠久的语文学和语言学传统，吸收了西方社会语言学思想的具有自己创新特色的中国学派。

第三，要坚持学术研究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方向。

社会语言学研究不是纯学术性的研究，除学科建设外，还应该致力于解决由社会产生的各种语言问题，在研究解决这些语言问题过程中进一步推动学科建设。陈原老师社会语言研究的特色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一方面是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是为提高全社会的语言社会交际水平服务。他对语言变异与规范的论述，为国家制订语言规范标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见；他对词典编纂和新词新语的研究，是为提高全社会的语言交际水平服务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将近四十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在这两个服务方面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应该继续做好两个服务工作。

要做好这两个服务性的研究工作，首先需要了解我们国家语言文字使用的基本情况，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语言文字的国情，才能做好有针对性的服务工作。全国性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工作已经快二十年了，数据需要更新。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启动新一轮的全国性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获取新的数据，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订提供支持。要做好两个服务性工作，还需要加强社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来源于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才能做好基础理论研究，才能做好两个服务工作。

只有把这两个服务与当前国家的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应该认识到中华文化是长期以来主体文化在不同地域与外来文化相互接触、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同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密不可分。中华文化为众多民族所创造、拥有和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当然为众多民族所使用和认同。中华文化和负载这一文化信息的语言文字是海内外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财富和精神家园。语言文字是维系海内外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要复兴，海外华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应该发扬过去的优秀文化传统，共同努力，在学习好和使用好

我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也保护好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文化，让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让海内外华人和全国各族人民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语言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在发展，语言文化也必然要发展。我们面临着中华文化复兴的新时代，时代需要建设新的文化，形成新的语言使用格局。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给我们提出来的要求。新媒体出现了不少新的语言现象，虽然有些成分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但总体上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它给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和外来语言文字的接触和碰撞，这也是一件好事。只有把中国的语言文化放到世界文化的大家庭中去交融，才能够显示出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能够显示出中华文明真善美的光芒。

第四，要有坐冷板凳，不为名利所动的做学问精神。

老师经常告诫我做学问要专心，不要旁骛，要甘于坐冷板凳。老师一生忙于编务和政务，觉得能有时间专门从事研究，是一项令人羡慕的工作（苏金智，2018b）。陈原老师没有时间专门做研究工作，他的许多论著是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写成的。老师在我们入学时就告诫我们，想做学问就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要急于求成，尤其是不要跟风。活在当下的学人，在职称、项目等多种压力下，如果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有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要做出点成绩是不容易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繁荣发展需要一批脚踏实地、不求名利的学子在社会语言学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奋勇攀登，不断创新，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任重而道远，愿陈原老师的学术思想指引我们去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跨越新的学术高峰。

#### 参考文献：

陈原 1980 《语言与社会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陈原 1983 《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

苏金智 2018a 《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缅怀陈原老师》，《文化学刊》第7期，第6-10页。

苏金智 2018b 《陈原先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及其影响》，《文化学刊》第8期，第22-28页。

王宗炎 1984 《读书》第12期。

张振兴 2016 《把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紧密联系起来》，《中国社会语言学》2016年第2期，商务印书馆。

Marshall, David F. 1990. Acknowledg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81,7-8.

# 陈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综述

郭 松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2018 年是我国当代著名出版家、社会语言学家、世界语运动开拓者陈原诞辰 100 年。12 月 21 日，“为书而生的智者——陈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礼堂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等协办。来自出版界、语言学界等社会各界的领导、嘉宾以及陈原家属齐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为我国语言文化出版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智者。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两任会长苏金智教授、田海龙教授出席了座谈会。

陈原是著名出版家，历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国际书店副经理、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和第二届副主席。陈原长期奋斗在文化出版工作第一线，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邬书林在发言中称他为我国出版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实践者，对外出版交流的先行者。在十年书荒之后，陈原以非凡的眼光和勇气组织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丛书，是出版界公认的精品。直至今日，这套被陈原称赞为“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的丛书仍然在社会上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滋养着学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在致辞中指出，该丛书是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标志性出版物，也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成果。陈原是中外语文词典规划的设计者和指导者，为我国辞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领导了《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的编纂与修订工作，而且还长于词典编纂理论，为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词典工作指明了方向。几位与会嘉宾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陈原在特殊历史时期冒着政治风险保护《现代汉语词典》的故事，充分展现了其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江蓝生用朴实却又感人至深的语言讲述了她与陈原的交往，并对陈原的领导才能和学识表达了由衷的钦佩。陈原参与创办《读书》杂志并亲任首任主编，开辟了



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文化园地。上个世纪 80 年代,《读书》成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推手。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董秀玉在座谈会上深情回忆了陈原在经营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上给予的指导。

陈原是著名社会语言学家,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曾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陈原因为《现代汉语词典》而在文革中受到错误的政治批判,感到十分不服气,“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尽管陈原将其语言学研究称为自留地,但他却利用“更深夜静的子夜”在这块自留地上干出了大学问。陈原丰富的社会阅历、敏锐的语言感知,再加上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促使他开创了中国社会语言学本土化研究之先河。陈原的《社会语言学》是我国第一部社会语言学专著,填补了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空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陈原在社会语言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陈原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语言变异冲击着语言规范,但与此同时进一步丰富了语言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语言规范。这种辩证观对于树立科学的语言规范观以及制定科学的语言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国家语委和语用所任上,陈原积极倡导并策划了现代汉语的定量分析工作。陈原既关注微观语言研究,又强调语言规划与语言规范化研究;既注重理论构建,又注重实践经验。陈原唯一的弟子、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原会长苏金智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要继承和发扬陈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传统。社会语言学者要摆正学科地位,既不自卑,也不自夸,脚踏实地、立足社会现实做研究,同时要甘于坐冷板凳,不要花架子。苏教授谈到,他要求他的博士后、博士出席座谈会,就是希望年轻的社会语言学者能够向先生学习,为社会语言学的持续发展提供新鲜血液。

陈原同时也是著名的世界语活动家,曾担任过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以及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陈原 13 岁开始学习世界语,一生热爱世界语。他将世界语与人类进步联系起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引导世人追求和平,追求进步,追求知识,为人的幸福,为人的尊严,为人的美好理想而不断奋斗”。世界语引导陈原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他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武器。陈原为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殚精竭虑,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发展史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荣誉会长陈昊苏指出,陈原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和民间外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原会长谭秀珠认为,世界语活动是贯穿陈原一生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陈原开创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黄金时代。在谭秀珠的记忆里,陈原的世界语水平之高,足以让她这个专业的世界语工作者汗颜。

晚年的陈原仍然心系学术与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八十高龄时亲自谋划推动的

《赵元任全集》的编辑与出版工作。陈原亲任编委会主任，并撰写出版前言，直至最后病倒在《全集》工作会议上。而这一病，老人再也没康复过来。陈原助手、商务印书馆编审柳风运讲述了陈原在病倒前紧张而忙碌的工作生活，让人们愈加钦佩这位将一生都奉献给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老人。

原定三个小时的座谈会在主持人的不断催促下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每一位拿起话筒的嘉宾似乎都舍不得放下话筒，他们对于陈原有无尽的思念与敬仰要表达。座谈会从不同侧面还原了陈原的多彩人生，陈原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值得后人继续发扬光大。

# 晚清“国民”概念考

曹 青

**提 要：**近代中国发生最深刻的变化之一便是由“天下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过渡，然而制度更迭往往由观念的引领与推动，观念由语言构成与传播。以往晚清社会变迁研究侧重于制度的演进，而对思想观念变迁中的语言作用重视不足。本文以语料库为研究方法，以语言建构概念图谱及语义场“语义重组”为视角，考察晚清风靡一时的“国民”概念，讨论传统“天下观”向现代“民族国家观”转变中“国民”概念的意义。本文认为，“国民”作为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同时强调的理念，并非仅指“个人意识”之觉醒与张扬。恰恰相反，晚清精英对“国民”观弘扬褒举，反映了“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对中国散沙般民众的工具性需求，是由上而下为迅速组成现代国家对大众规范性要求，而弘扬个人解放居次要位置。通过 WordSmith Tools 软件对语料库中“国民”搭配词语的义场考察，本文详析“国民”概念多层级的语义复合构成，梳理“国民”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讨西学东渐中欧陆概念的中国本土化过程。

**关键词：**国民；晚清；民族国家；语料库；语义场；新民丛报；民报

## 引言：社会变迁与语言变迁

在晚清社会变迁研究中，思想观念的冲突，往往被纳入黑格尔式的历史进步论逻辑框架，在启蒙进步论视角下，丰满的社会生活被嵌入了单向、平面、机械的思考模式，陷入历史目的论的窠臼。在启蒙两极思维中，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开明与愚昧、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被赋予先验价值判断，忽略了社会生活鲜活、复杂的厚度与本性。本文脱离以往先验价值框架，以语言与社会互动为视角，解析晚清精英如何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为促进社会转型服务。讨论以“国民”为例，解析“国民”概念如何以救亡为核心，以“民族国家”建设为宗旨，为中国寻求复兴之路。由于传统中国既无“民族”概念，只有“家族”与“宗族”；秦汉以降亦无“国家”意识，只有“朝廷”与“天下”，“民族国家”建设首先遭遇了语言表达困境。晚清精英只能以新创语词（多由日语传入）表达欧陆“概念图谱”（见下文讨论）。这些根植于欧陆近代观念词语，通过近代报刊传播，促发社会价值层面的舆论风暴，引发社会变革。“国民”概念兴起构成“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国民”作为改良派与

革命派同时强调的理念,并非仅指现代个人意识觉醒,或个人观念张扬。恰恰相反,晚清对“国民”观褒举反映出“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对中国散沙般民众的工具性需求,是由上而下为迅速组成现代国家对大众规范性要求。“国民”指“一国之民”,聚一国之民组成“民族”。由是“国民”与倡导个人主义,弘扬个人解放等个人主权观念关联,远低于以一国之民建中华之国的内涵。本文以语料库为研究方法,通过对晚清语料的梳理,解析“国民”不同层次的语义构成,及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所用语料取自晚清重要报刊,以1905-1907年间《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与革命大辩论主要文章语料库(以下简称《大辩论语库》)为分析案例。通过 Wordsmith Tools 软件对语料库词频及词语搭配(Concord)进行详细语义分析。除大辩论语料,本文使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下简称《专业数据库》)对晚清民初与“国民”相关词进行历史纵向走势及相关背景分析。

#### 概念图谱与语义场:“国民”话语理论透视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无论是功能派、结构派、生成派还是认知派,均强调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的关系,辨析其关系的结构特征。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77)将文化观念纳入语言与思维讨论中,提出语言系统与概念系统双系藕动的观念,认为语言与思维内在关联的运作机制以文化为纽带,由人类对主客观世界进行的表征活动完成。所谓表征,即“人脑在语言作用下通过概念产生的意义”的过程(Stuart Hall, 1977: 17)。霍尔将文化定义为“意义共享”,“意义共享”前提是语言共享,因为意义由概念而生,概念由语言构成,人们须享有共同语言,才能拥有共同概念,进而拥有共同价值。由此,霍尔将语言与思维关系纳入历史的范畴进行动态考察,将语言从“结构”与“生成”机械框架中解脱出来,纳入语言实践中加以剖析,观察其与思维的现实关系。这种动态关系由语言与概念双重系统叠加而成。即一方面,语言活动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以表征方式认知世界,在表征过程中将语言与概念连接起来,使人类可以思考交流,建构意义。然而所谓“意义”,只产生于人们所指事物与大脑中概念的关系。因而,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概念系统。概念系统的功能是将各种概念进行分类组合排序,在概念间建立关系。正是由于概念间特定关系的确立与有序互动,单一概念才产生了意义。换言之,单一概念本身不具备意义,必须与其他概念发生关联才获得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外界因素的变化,单一概念背后的概念群永远处于变动之中。因而对单一概念的考察必须是历史与动态的。本文对“国民”观念的梳理便在这一理论关照下展开。

由于语言的意义产生于概念,霍尔(Hall)认为语言与概念互动发生于“概念图谱”(conceptual map)中<sup>1</sup>。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概念间互动形成概念群,概念群叠加形成“概

念图谱”。任何单一概念背后，都存在不同阶次的概念群落，如一个同心圆，处于圆心单一概念的意义由不同层面概念群支撑，每层都构成与圆心概念的一组关系（见图1）。霍尔所言“概念图谱”便指这一概念群落。“概念图谱”将理论语言学抽象的“概念产生意义”的义理，转化为社会语言学“文化产生差异”的分析机制。作为理论视角，它揭示了意义产生的机制，也提供了考察语言变迁的框架。霍尔以“概念图谱”的观念强调社会成员间共享的独特概念群落。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概念图谱”截取的概念群落范围可大可小。以大范围而言，不同社会概念图谱在物质层面相同或相近，如工具使用、粮食生产等。而在精神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不同社会间呈现很大差异。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对主客观世界进行表征活动依赖于概念系统的存在；社会制度的形成则依赖以文化为分野的“概念图谱”的存在。然而，无论是语言或概念，都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历史进程中产生、发展、完善的。任何语言都是历史的，是人类活动的沉淀与结晶。支撑思维活动的概念系统及维系社会生活的概念图谱，使社会成员认知环境，适应环境，从而达到最佳生存状态。以文化分野为根基的概念图谱，其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及变化性，构成了考察语言变迁的学理依据。以此出发，可从晚清社会变迁的“现代化进程”宏大叙事框架外另辟蹊径，避开思维定势，探究社会变迁与语言变迁的内在联系，观察“国民”概念兴衰的历史轨迹及演变逻辑，从另一侧面透视晚清社会变迁的内在机理及当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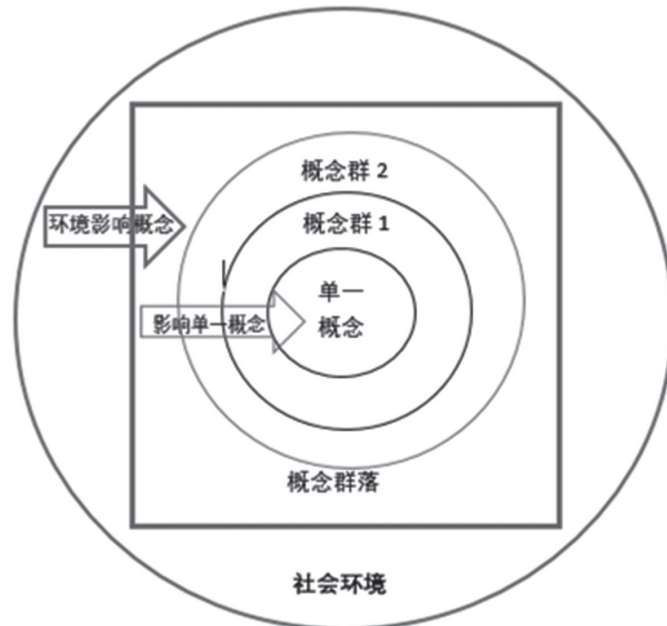


图1 概念图谱示意

具体而言,晚清“国民”概念可从“语义场”角度考察,因为概念由词语表达,词语由语义构成。语言学家利奇(Leech, 1981: 第二章)将语义分七类,而“概念意义”被单列为独立范畴,称之具有重要“认知意义”(亦如概念图谱等同于认知图谱)。其他六类语义,即外延意义、社会意义、感情意义、反射意义、搭配意义及主题意义则归于第二层级范畴。维斯格伯(Weisgerber)提出词汇意义圈(spheres of meaning)理念,认为词汇的意义通过“意义圈”演变构成语言对思维影响的机制(Werner, 1952: 252)。“语义场”理论则认定单词只能从其搭配语中展现语义。语义场理论开山学者特雷尔(Trier)通过对古德语与中世纪德语的比较研究,提出语义存于邻近词的观念,即邻近词构成了某词汇的语义圈,语义圈又可分成不同层级(semantic sub-areas)。特雷尔将这些语义圈称为“语义场”。语义场理论的核心是语义产生于“场”中,而非单一词汇。所谓“场”就是词与邻词的关系。显然,特雷尔“语义场”与霍尔“概念图谱”在理念与结构上有高度重合之处。两者均强调意义产生于“场域”或“图谱”中,存在于“词与词”“概念与概念”的关系中。这与中国传统诗学强调“功夫在诗外”有异曲同工之妙。欲知某词某概念的真义,须跳出该词该概念,顺藤摸瓜,藤是关系、瓜是意义。因而语义场可看作是概念图谱的延伸及细化(见图2),语义场探寻的是微观意义,概念图谱关注的是宏观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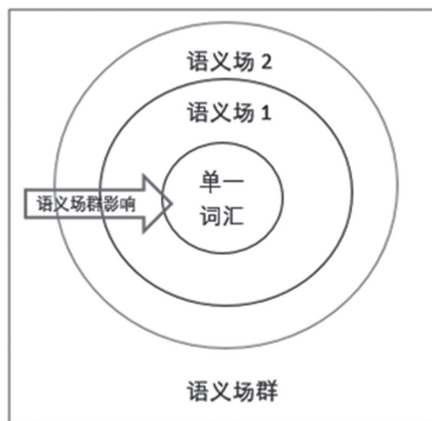


图2 语义图谱示意

以索绪尔的历时与共时语言学观之,“国民”背后现代国家概念图谱的输入是语义时空大移植。以历时语义看,“国民”<sup>2</sup>作为民族国家民众身份认同,经数百年积淀,在欧洲家喻户晓,意义已常识化。但“国民”语义不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国”与“民”观念嫁接,只能在民族国家概念中发生意义,保持历时语义。以共时语义看,“国民”

须与搭配词互动产生共时语义。正是在共时语义中，“国民”概念注入了晚清精英使用“国民”概念的强烈用意，那便是“改民建国”，“以民建国”。在这个意义上，“国民”涵盖了“公民”（citizen），但不等同于“公民”（见下文分析）。晚清“公民”一词出现率极低。《专业数据库》显示在1830-1930百年间，“国民”出现34,080次，而“公民”只有737次（见图3），后者仅占前者2.16%。“国民”虽根植欧洲民族国家观，但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对应词，因其概念虽取citizen，语义远远超过该词。“国民”是晚清以欧陆思想为圭臬创造的理念，以重建国与民的关系，以“国”统“民”。据其语义应译成national people。与“国民”搭配的词组如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国民经济等可译成national revolution, national government, national economy。这正应了特雷尔对“语义重组”（semantic regrouping）的论述，语义重组是将同一个词置于不同词群中而产生了新的语义。在特雷尔看来，语义重组将语义历时与共时意义结合起来，因为在语言使用中，语义产生于历时与共时的互动。“国民”一词的创造性及挑战性源于语义的历时与共时双维大幅重组，将欧陆国家观与公民观双重转型浓缩于“国民”一词，赋予其“改民建国”“以民建国”的纲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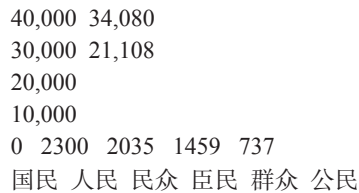


图3 《专业数据库》人群指称词频

### “天下王朝”与“民族国家”：概念图谱跨文明嫁接的语言困境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产生过形形色色的国家形态，从古希腊城邦到古罗马共和国；从帝国政体到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理念源于近世西欧，脱胎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现代欧洲世俗国家，从以神圣罗马帝国为纽带的基督教统一体，向近代主权国家演进；基督教义统领的传统格局被新型国际社会共同价值及规范取代。相互承认、相互独立、力量均衡、主权至上等法则得到普遍认可，欧洲王朝体系渐次过渡到“民族国家”为根基的现代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引发神圣罗马帝国及基督教统合模式的衰微，整合了欧洲分散的政治行为体，改变了欧洲国家形态。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与民族国家新范式相关的一系列观念，这些观念由大量新词语所表达、深化、传播并渗透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主权”“民权”“领土”“边境”“实力均衡”等。每一名词后又有相关概念支撑，形成以该词为统领的概念群。如“公民”

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涵盖新的政治关系(法权)、经济关系(市场)、社会关系(个人独立)及文化关系(民族认同)等。这些新型社会实践催生了新语言、新概念,构成新的民族国家观概念群落。“公民”观念的形成与国家内部现代转型及新型国与国关系息息相关。一方面,民族国家形态强化了国家内部以共同语言、文化、宗教、历史、风俗为纽带的民族认同,将松散的民众凝聚成有共同利益与追求的共同体,谓之“民族”;而另一方面,一国之内民众身份认同发生转变,忠诚对象由封建领主或国王转向以制度为代表的国家。由是,民族国家作为新型共同体,促进了外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及内部民众身份与国家制度的转型。内外互动的新型实践促生了两种概念体系的成熟。其一,对外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实践准则,以国际法为规范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其二,对内以语言、文化、历史为核心的民族观,及以民权为核心的国家观体系的形成。两种概念体系在晚清,特别是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迅速传入中国。这些概念在传播中遭遇了巨大的语言障碍(Cao, 2017),背后根本原因是中西“概念图谱”间存在巨大鸿沟,图谱间重合面过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列文森(Levenson, 1968: 156-163)<sup>3</sup>认为晚清西学东渐中语言领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欧洲语言对晚清影响不仅增添了汉语词汇的丰富性,而是给中国带来了“全新语言”。这并非指中国采用了拉丁字母语言,而是欧洲语言代表的认知世界方式,取代了汉语言所代表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中国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列文森举例说,自古以来外来语对汉语有重大影响,如佛教的传入极大地丰富了汉语,但虽与儒学发生摩擦,佛教最终被汉化而消融于中国主流传统之中;因而佛教只为汉语带来了新词汇,而未带来新语言。列文森所说认知结构的“范式”转移是以“概念图谱”输入为标志的,所谓“新语言”即西方概念图谱产生的一整套话语,这套话语为晚清精英所用,企盼将古老中华文明转化成现代国家。“国民”便是欧风美雨吹来的“新语言”,它将意义宽泛的“国”与“民”连结起来,赋予现代内涵,凝聚改造社会的能量,统御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

### “国民”话语勃兴:“以民建国”

“国民”一词于1903年后爆发式涌现,反映出“百日维新”失败后部分精英沉痛反思。制度改良的艰难,使改良派目光由制度转向制度背后的人,不仅是少数权力执掌者,而是芸芸大众。晚清民初“国民”一词使用最多者为梁启超,他极力推行“以民建国”理念。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报告白》宣称办刊宗旨是“维新我民”,即改造国民性。改造重点是建“公德”,而非扬“个人”私利。虽倡导个人权利意识,但目标是为国家建设铺垫基石,有明显工具主义色彩。改造国民目的明确为“国家主义之教育”,借西洋政治理念“养吾人国家思想”,“以导中国进步”: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中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开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之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洋，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辞费也。本报为中国前途期间，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与一党派。

发刊词毕显梁启超“改民建国”苦心。《新民丛报》之初梁启超连发系列长文《新民说》阐述改民建国的迫切性。《新民说叙论》强调：“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虽然《新民丛报》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进行大辩论，梁孙对“以民建国”的宗旨完全重合。孙中山（2011: 5-6）痛感民众一盘散沙，无民族国家概念，便以“国族主义”诠释“民族主义”，强调“民”之于“国”的重要性。与梁启超强调“民德”不同，孙中山更关注民与民之间纽带的缺失，及民众忠诚范围之狭隘，导致无“国家观”：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象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对孙中山而言，民族观欠缺源于民众认同范围狭隘，囿于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与宗族。宗族外便无共同利益凝聚民众的忠诚，民与民间便无情感纽带。虽有文化意义的“天下”及高高在上的“朝廷”，两者都无法牵动人们情感，统合利益，勾织共同体。“天下朝廷”政治构架只是士大夫阶层关注的对象，与民众无关，民众的视野与利益从来没有超出血缘为重的熟人社会。“天下”与“朝廷”关系也只由士大夫官僚体系维系。

“国民”一词最早出于先秦典籍，意为封国所辖之民，例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周礼注疏》（春官宗伯第三）中说“令国民族葬”。秦统一中国后，废封建，建郡县，“天下归一”，“国”的概念随先秦六国消亡而渐淡，被“朝廷”与“天下”取代。“朝廷”承载了“国”的政治组织架构；“国”的疆域观则泛化成“天下”，并由强大中原华夏文化承载，形成文化意义的“天下观”。“天下观”

以“华夷之辨”为认知基础，将政治之“国”虚化成文化之“理”。秦后不仅“国”演变成“天下王朝”，先秦国名，燕、楚、齐、韩、赵、魏等也随之消失，由王朝称号取代，如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国人作为东亚大陆族群，由文化意义的“华夏”观念承载其身份认同。王朝更替只意味着主政皇族的流转，与统合国人身份的华夏意识无关。只在文化意义上“外族”入主中原时，才引发文化保卫战，如元清时期。进入十九世纪，“国民”语义发生变化，先指外国人（金观涛、刘青峰，2009: 309-310），后指一国之民。《专业数据库》显示，1830至1895的65年间“国民”出现频率极低。但于1895至1930年间迅速增长，出现六次高峰，分别为1903年（3906次）、1906年（1551次）、1913年（1065次）、1915年（1601次）、1919年（687次）与1926年（4307次）（见图4）。每次高峰均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前两次高峰与梁启超于1903年办《新民丛报》倡导改民建国，及1906年与《民报》大辩论有关。1913年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及二次革命。而后三次高峰与1915新文化运动、1919五四运动及1926国民革命相关。前两次高峰属“改民建国”舆论宣传，后四次则属“以民建国”政治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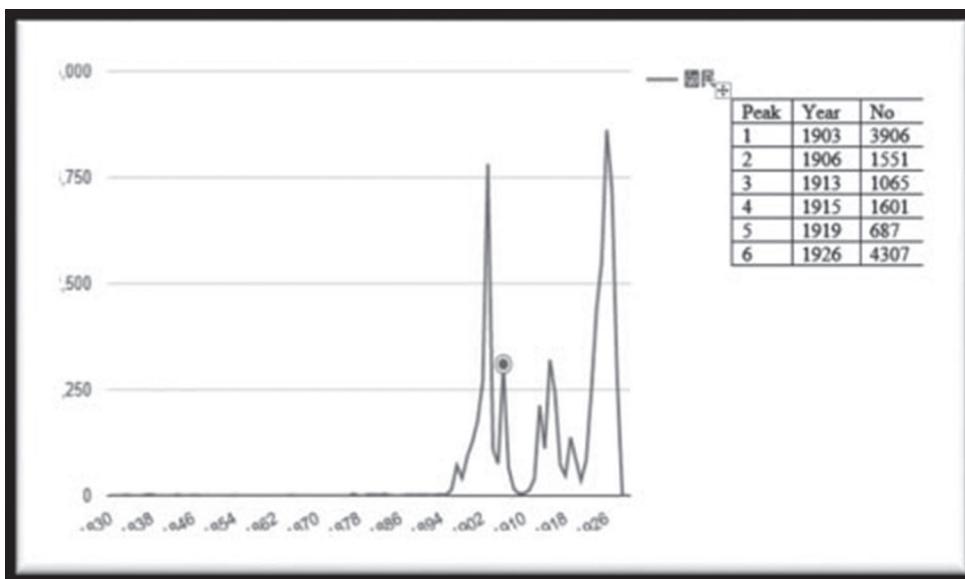


图4 《专业数据库》“国民”词频

国民核心既在“国”，亦在“民”：国者，化天下为国；民者，聚散众为民。“国”与“民”虽是使用了数千年的汉字，内涵全然不同。“国民”概念图谱发生了跨文明移植，割断了历时语义，引发了认知范式转移。“国民”以民族国家定义民与国、国与国间的关系，这恰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关键所在。“国”是民族国家之国，

“民”是现代国家全体之民。关于“国民”的全民性，毛泽东（1940）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著名论断，对“国民”统合性及非阶级性提出质疑：“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对晚清精英而言，松散的、以文化立意的天下王朝正是中国无力抵御西方的软肋。西欧近世以来，脱离罗马天主教，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以强悍的民族观念建立独立主权国家，凝聚起无穷政治能量。一个个新生民族国家如旭日东升，宛如柄柄利刃，在世界范围传统社会中所向披靡。船坚炮利的技术在民族国家统领下发挥了巨大威力。晚清精英以新型国家建设入手，集结政治能量抗击西方殖民入侵。力图将流沙般个体纳入“国”之容器，凝结成坚固的民族国家，将血缘亲情“族民”铸成民族认同的“国民”，将一族之私铸成一国之公。正是在这个历史语境中“国民”概念应运而生了。

### “国民”语义解析

“国民”语义分析采用 WordSmith Tools 对《大辩论语库》进行语义挖掘。在软件三个分析功能之一的 Concord 中，通过 pattern 功能提取“国民”搭配词分布图。Pattern 以列表方式（见表 5），将近 24 万字语库测算后，按“国民”搭配词词频率及与“国民”空间距离，列出“国民”搭配词量化分布图。测算取“国民”前五及后五个搭配词，在表 5 中以左 1、左 2、左 3、左 4、左 5（L1、L2、L3、L4、L5）及右 1、右 2（R1、R2）等横列标识。纵列表示词频的高低。如“国民”前左 1 频率最高的词是“共和”，居左 1 纵列之首，左 1 词频排序第二是“中国”，第三是“民族主义”。位于“国民”之后右纵列之首第五个词也是“共和”。纵列词序中词频越高对“国民”语义影响越大。横列显示搭配词与“国民”距离，与“国民”越近对其语义影响越大。搭配词中占最重要位置的是距“国民”最近的左 1 及右 1 纵列，占第二重要位置的是左 2 及右 2 纵列，其余类推。分布图以量化方式标识“国民”搭配词群，勾勒出“国民”语义场。WordSmith Tools 将散布于大量文本中显得无序的概念梳成有序的，以“国民”为中心的量化关系图，确定“国民”背后隐性概念群，即“国民”语义赖以生成的微型“概念图谱”。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语料的关系，此处“国民”语义剖析只是一个案例，意义限于晚清《民报》与《新民丛报》大辩论语境。由于大辩论影响重大，涉及改良与革命的两个现代化路向，两报对“国民”语义的建构具有代表性意义。

N	L5	L4	L3	L2	L1	Centre	R1	R2	R3	R4	R5
1	国民	国民	可以	今日	共和	国民	主义	资格	利益	国民	共和
2	该报	论者	政府	民族	中国		全体	心理	可以	机关	国民
3	政治	政府	作成	机关	民族主义		心理	能力	作成	政治	机关
4	政府	约法	最高	国民	梭之		多数	国民	必要	共和	政治
5	精神	不能	所谓	政府	所谓		程度	责任	思想	政府	能力
6	论者	革命	机关	以为	对于		对于	国家	国家	关系	最高
7	本报	机关	不能	所谓	一般		思想	民族主义	而已	与否	革命
8	国家	政治	革命	国会	唤醒		自身	不能	政府	民权	不能
9	不能	记者	以为	主权	法国		利益	代表	革命	变迁	纯粹
10	而已	不可不	政策	共和国	以为		革命	责任心	民权	统一	政府
11	中国	民族主义	一面	民权	鼓吹		直接	政治	机关	议院	实现
12	革命	专制	国民	历史	国民		实力	自身	自由	最高	资格
13	能力	中国	主义	其果	称为		资格	国会	普遍	责任	利益
14	主张	可谓	利益	养成	表现		既有	革命	民主	论者	议院
15	改良	心理	中国	原本	全体		论者	共和	不可	观念	与否
16	共和	最高	宪法	将来	现在		总会	实力	不足	而已	发生
17	机关	要求	议会	必须	领土		之一	可以	国民	专制	多数
18	今日	责任	而已	影响	注重		能力	作成	共和	国家	国家
19	宁可	资格	要求	政体	至于		权利	最高	资格	基础	不当
20	将来	第二	精神	能力	虽然		国民	民族	政治	未尝	不能不
21	大部分	民主	第一	领土	说明		议会	其果	共和国	昌明	感情
22	说明	目的	绝对	频频	而已		主权	主权	与否	平等	心理
23	资格	第一	日日	秩序	养成		平等	满洲	最高	老辈	自由
24	民族	主义	本报	方面	唤起		约法	感情	统治权	迷孙	观念
25	民主	前提	足以	普遍	共和国		集会	顽固	前提	资格	该报
26	民族主义	与否	责任者	波氏	侮辱		进步	投票	主权	分子	本报
27	开明	作成	之际	今世	优于		自有	民权	以来	不知	然则
28	约法	今日	今日	乃应	在于		自治	精神	责任	不能	约法
29	势力	自由	论者	关系	政府		今日	议院	唤醒	革命	人心
30	主义	保皇党	国会	不过	一分		合成	团体	变迁	自由	分子

图5 《大辩论语库》“国民”搭配词前30条词链

搭配表中“国民”语义可归为纳四层。第一层为国家形态，构成“国民”语义核心。频率最高，距离最近的左1纵列之首由“共和”占据，显示“共和”与“国民”关联最为密切。30条横列中“共和”或“共和国”出现于八列，与“国民”搭配频率与距离双列第一。“共和”是民族国家形式，代表新型治理理念与组织构架。以“共和”为统领，“国民”与国家形态搭配形成一个词语群落，含七重要素。其一为共和政权形式。与“共和”同频搭配词是“国会”“议会”“议院”（可看作同义）出现八条

横列中。“国会”是现代国家政权形式，“共和”的具体制度安排，“共和”与“国会”形成现代国家形态的一体两面。其二是民族国家。“民族”与“民族主义”占六横列，包括左1最重要位置。“民族主义”首现于左1纵列，频率排第三，仅次于“共和”与“中国”。除作为域名的“中国”，“民族主义”量化排序仅亚于“共和”。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出现四次，“民族”三次，表明“民族主义”重于“民族”。正如盖尔纳（Gellner, 2006）所言，民族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理念是民族诞生的助产士。将“民族”与“国家”相连是西方现代国家形态最显著的标志，也构成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严峻挑战。将“国民”与“民族”观嫁接，意味着晚清精英对“国民”之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功能的双重期待。其三是现代国家组织安排：“政府”与“机关”各出现于七条与六条横列中，两词均指官僚执行机构，不仅说明“国民”与国家建设关系，也反映国家机构安排是民族国家建设的自然延伸与细化。其四为现代国家法制。法制观念包含“约法”（四次），“民主”与“专制”各两次，“宪法”与“投票”各一次。在法制概念中，“约法”最重，出现于右1关键位置一次。“约法”为晚清输入的欧陆契约精神的重要用语，是改良与革命两派均强调的理念。“民主”与“专制”在大辩论语境中具特殊涵义。对革命派而言，倡民主必反专制；而改良派则以为，行“开明专制”是迈向民主的必要过渡，认为“国民”意识尚未确立，施行真正民主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开明专制”是最佳选择。当然，梁启超脑中的“开明专制”是波伦哈克式的现代君主，受现代国家体制制约，超然于社会之上，调节社会利益，承载国家统治权，俨然是超脱世俗利害关系的国家主权委托人。然而“开明”是“专制”的前提，“开明”意味着“专制”受“约法”制约。在此逻辑下，“开明专制”被纳入“约法”宽泛意义内。而“宪法”“民主”与“投票”均为革命派所倡导，成为宪政实施的程序安排。

其五是现代国家外部特征：“领土”在左1显著位置出现，占两横列；“主权”于右1位出现，亦占两横列。“主权”“领土”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核心观念、构成现代国与国关系的基石，也是传统中国“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轨所必备的理念。外争“国权”，捍卫“领土”的现代国际观也纳入了“国民”的概念图谱。其六为域名，共三个：“中国”（四次）为改造对象，“法国”（一次）为学习对象，“满洲”（一次）为辩论对象。“法国”以左1显著位置与国民搭配，表示“国民”概念深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考虑到卢梭之名也出现于左1纵列（见下文），并占第四高频位置，“国民”概念来源首推法国。“满洲”与“国民”相联事关“民族”的定义。在革命派眼中，“种族革命”便是推翻满清少数民族统治，建立共和，这是同盟会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而梁启超心目中的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满族。因而“满

族”对“国民”的意义系于“民族”在中国的内涵，事关“国民”身份的界定及标准。其七，搭配表中仅有的两个人名，一是法国的卢梭<sup>4</sup>（1772-1778），出现于左1纵列重要位置。二是德国的波伦哈克<sup>5</sup>（1861-1944），位于左2纵列。两位西欧人成为“国民”搭配词意义重大，不仅表明“国民”样板源于欧陆，更具意味的是两人代表了民族国家框架下“主权在民”或“民权主义”与“主权在国”或“国权主义”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卢梭作为启蒙运动理论家，是反皇权斗士，“主权在民”的旗手；而波伦哈克则相反，是君主主权论者，其《国家论》主张“国家即君主”，视君主为统治权主体，是典型的国权主义者。两人与“国民”搭配恰恰显示了“国民”语义内“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的双重倾向及内在张力。显然，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论中，前者推崇“主权在民”，而后者摇摆于两者之间，对“主权在国”的权威情有独钟。梁启超说：“夫既已三权分立矣，则最高主权，非在国民自身而何在也？共和立宪制，其根本精神不可不采卢梭之国民总意说。盖一切立法行政，苟非原本于国民总意，不足为纯粹的共和也”。然而他又话锋一转，认为理论上的主权在民在中国不可行，因中国“民智不开”，“不惯民政”：“若夫在不惯民政而党派分歧、阶级分歧、省界分歧种种方面利害互相冲突之国，则惟有日以此最高主权为投地之骨，群犬狺狺焉竞之，而彼三机关（指三权分立）者，发置如弈棋，吾一日焉得以自安已耳。盖随时拈一问题，可以为竞争之鹄，而国民复无判断是非真厉害之能力，野心家利用而播弄之，略施小伎俩，即可以刺戟其感情，而举国若狂，故所谓多数者，一月之间，恒三盈而三虚，彼恃多数之后援以执政权者，时时皆有朝不保暮之心，人人皆怀五日京兆之想，其复何国利民福之能务也？”于是梁启超虽然承认主权在民是共和精髓所在，在中国则极危险：“则三权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权在国民之政治也，而最高主权在国民之政治，决非久困专制骤获自由之民所能运用而无弊也，准是以谈，则虽当革命后新建共和政府之时，幸免于循环反动以取灭亡，而此政体，终无术以持久断断然矣，不持久奈何，其终必复返于专制，或返于共和专制，或返于君主专制，然则其去政治革命以救国之目的，不亦远乎”。于是梁启超从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民权主义迅速转移到波伦哈克的国权主义观。这亦说明“国民”语义存在宽泛空间，内涵并非统一稳定，涵盖了大动荡时代精英的思考与探索。国家主义作为晚清意识形态主流是支撑“国民”语义核心概念，正如《民报》所言“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拙于国家主义之下”，“国民主义”作为大辩论重要词语（出现57次）必然在国家主义语境下产生意义。以上是“国民”概念第一层语义的七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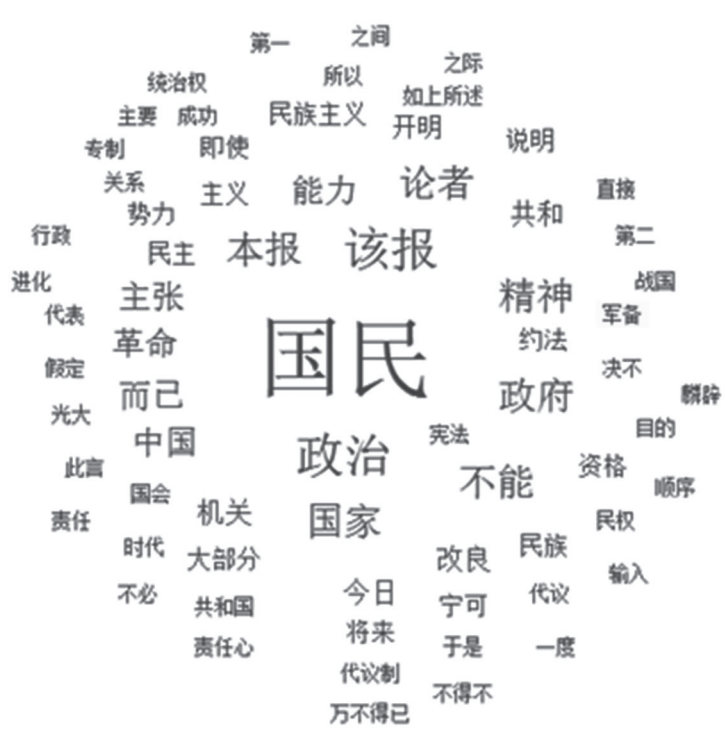


图6 《大辩论语库》“国民”云图

第二层语义关涉“国民”个性特征，侧重于“国民”素质。搭配词包括“资格”（六次）、“能力”（五次）、“心理”（四次）、“感情”（两次）。“资格”高频出现表明对传统“族民”与“臣民”现状不满。“资格”概念的实质是“国民”标准问题，而标准取自欧陆移植过来的工业文明，要求民众具备现代“能力”，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能力”内涵显然不同。晚清精英以工业文明标准衡量农业社会民众，对国民性批评就不足为奇了。细观语料文本，对“资格”谈论最多的梁启超，他哀叹国人素质低下，不具备担当现代国民的资格：“今日中国国民未有能力为共和国民资格”，主张“开明专制”过渡，以时间换国民品格的培养。“国民”资格亦是两报辩论焦点，改良派认为民众“顽劣”无“资格”建共和，革命派认为政府“顽劣”，国民有资格建共和。与改良派不同，革命派对“国民”资格评判暧昧，政治上认可，文化上恨铁不成钢。如果说工业文明个人“能力”可具体化为政治能力（权利与妥协）、经济能力（技能与效率）、社会能力（沟通与守则）等尚可训练的技能，那么“心理”则涉及深层心灵领域，难以细化。对心理讨论最多的是《新民丛报》，企望民众脱胎换骨：“改良进化者，不可不取国民心理洗涤而更新之。然欲洗涤更新国民之心理，必非口舌煽动笔墨鼓吹所能为力，

而必赖秩序之教育”。何谓“心理”？《民报》以为“凡国民心理，必须其为自由发动者”，自由即为自愿。有了愿景则心诚则灵：“国民心理而能如是者，则共和不期成而自成美国也，或且无共和之名，而有其实”。“心理”涵义最终与“共和”相连，被纳入政治格局。因此，“心理”是工具化的心理，心灵是政治化的心灵。在这个语境下，“感情”同“心理”一样将“国民”理性层面的硬素质转向感性层面的软素质。所以梁启超认为改造心理之功笔墨鼓吹不够，需借教育之力。据此“国民”个性特征与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了。

第三层语义为价值观。涉及面较广，搭配词包括“自由”（四次）、“民权”（三次）、“平等”（两次）及“权利”“自治”“进步”“集会”（各一次）。与第一、第二层面语义相比，第三层价值观搭配语词频偏低。无疑，价值观搭配词语与欧陆启蒙主义概念图谱直接相连，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理念。在大辩论语料中，与“自由”搭配最频者是“平等”与“博爱”，三词相连出现18次，为“自由”词链（cluster）之首，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口号。与“自由”相连则为“意志”与“精神”，可见国民“自由”观突显个人，弘扬“民”作为个体的自主精神，其意义源于法兰西“人生而自由”的天赋人权说，较少工具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国民”与“公民”高度重合。因而“国民”常被译成Citizen。这不仅是望文生义的错误，而反映了“国民”语义的多重复合性。

“国民”与“臣民”相比，则为“公民”，与“族民”相对便是“一国之民”（national people）。“国民”语义重“国”轻“民”反映了晚清对救亡图存轻重缓急的排序。以民国首首要任务是去“一己之私”立“一国之公”，举全民之力建新型之国，将可见的“族民”改造成安德森（Anderson, 1983）所说“想象的共同体”中互不谋面的“国民”。

“国民”重铸与扩大利益共同体，以民力鼎撑现代国家，取代朝廷承载天下的旧制度。与建国相比，增进个体利益的自由、民权、平等、自治等居次要地位。第四层语义为革命。“革命”出现于八条横列中，并占右1、右2重要位置，显示革命与国民关联密切。作为大辩论争论焦点，革命与否涉及现代国家建设的方式，涉及对“国民”品格、素质及能力的判断。在第二层语义中，对“国民”资格的判定确立了两派的分野与立场，导致了改良与革命的不同路向。严格说来，双方分歧源于对“国民”资质的理解，对改良派而言“国民”是救亡图存问题的根源，对革命派而言“旧制度”是问题根源。虽然革命派在大辩论中获胜，但改良派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远未完结，成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民国知识精英承担的时代使命。

## 结语

本文以晚清“国民”概念多重语义为例，探讨在本土实践与外来价值间出现鸿沟状



况下语言遭遇的困境；考察晚清精英通过语言建构，为实现民族国家建设所进行的艰辛努力。本文认为，晚清“国民”概念的意义，在于厘清与奠定现代社会“国”与“民”之间的关系。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建“国”是目标，改“民”为路径；“国”与“民”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所建的是传统社会之“民”与新型政治之“国”的纽带关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一旦民众对现代国家有了常识性认知与参与，“国民”话语便基本完成了概念意义上国家建设的语言使命，作为历史名词淡出人们视野，渐渐退出了日常语用舞台。“国民”概念的构建、传播与起落反映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复杂进程，从一个侧面表明语言是社会观念与社会制度间互动不可或缺的载体与桥梁，是社会变迁赖以实现的思维机制及不可或缺的工具。

附注：

1. 概念图谱或称“认知图谱”（cognitive map）。
2. 见列文森（Levenson, 1968）最后一章：“结语：新词汇还是新语言”（Conclusion: A New Vocabulary or A New Language）
3. 搭配表中出现的是“梭之”，“梭”指卢梭，这是分词软件不能分辨卢梭所致。
4. 搭配表中出现的是“波氏”，指波伦哈克。

参考文献：

中文

毛泽东（1940）《新民主主义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001.htm>.

孙中山（2011）《三民主义》，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英文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Cao, Qing (2017) Rupture in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Radicalism in Late Qing Chinese Press Debate', *Critical Arts: 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31(6), 9-28.

Leech, Geoffrey (1981)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2nd Edition) Middlesex and New York: Penguin.

Gellner, Ernest (2006)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nd edn,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Hall, Stuart (1997)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evenson, Joseph R. (1968)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rner, Heinz (1952)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by Stephen Ullmann, *Language*, 28(2), 249-256.

## **A Corpus-based Investigation of Guomin in Late Qing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dynasty to a nation-state. However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often pushed and guided by a system of ideas.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late Qing transformation focus o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iving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shift of ideologies. Based on a corpus-linguistic,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evalent notion of Guomin in late Q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ap’ and ‘semantic field’. It argues, contrary to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 as highlighting individualism, Guomin prioritises a demand on the normative behaviours of the people, reflecting an elitist requirement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article summarises four levels of semantic meanings of Guomin as a statist construction of a new ‘national people’ in the preparation for transforming the Qing dynasty to a modern republic.

**Key words:** Guomin; late Qing; nation-state; corpus linguistics; semantic field; *Xinmin Congbao*; *Minbao*

# Attitudes towards World Englishes among Chinese intercultural volunteers: A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study

Gao Yihong<sup>a</sup> Xu Hongchen<sup>b</sup>

(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especially those following the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llport, 1954), have suggested intergroup contact is conducive to positive attitudes change regarding outgroups. Taking language attitude as par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is study examined Chinese college-student volunteers' 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s towards World Englishes (WE) before and after fou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vents held in China. The pre-event participants were 758 volunteers, among which 551 completed the post-event test. A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was condu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The test stimulus included five WE varieties: British English (BE), American English (AE), African-American English (AAE), Indian English (IE), and China English (CE). Major findings were the following: 1) accuracy rates of variety recognition had the following ranking: CE > AE/BE > IE > AAE; recognition accuracy for all varieties was improved after the events; 2)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varieties formed the following ranking, consist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AE > BE > AAE > CE > IE. The results indicated basically conservative language attitudes, which was largely independent of increased WE knowledge during the events. Short-term intercultural activities without interventions especially guided reflections had limited effect on positive attitude change. Pedag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language attitud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World Englishes;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volunteer;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 Introduction

Attitude can be viewed as “a disposition to react favourably or unfavorably to a class of objects” (Garrett, 2010, p.20). This mental construct has three components — cognition (beliefs and stereotypes), affect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s (e.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For language attitudes, the “class of

objects” include not only the linguistic entities themselves, but also the “native speakers” or cultural group associated with the particular linguistic variety. So “language attitudes” are not purely attitudes towards languages, but also towards peoples or cultures. It is part of one’s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volves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Garrett 2007). As such, it is a par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C), i.e., “the general ability to transcend ethnocentrism, appreciate cultures, and generate appropriate behavior in one or more different cultures” (Bennett et al., 1999, p.13).

Methodologically, language attitude research can be roughly group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Garrett, 2010): “direct approach”, with self-report technique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s, focus groups,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indirect approach”, using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or more precisely the “matched guise test” to elicit proje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societal treatment approach”, analyzing discourses used in various contexts such as the media and the classroom. For its convenience, direct approach with questionnaires is commonly used. Yet it has the limitation of possibly eliciting socially desirable answers rather than genuine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e societal treatment approach may be seen as discourse-based direct approach (Lybaert, 2017), which can go deeper in meaning exploration, but relies more on the researchers’ interpretation. Indirect, projective tests were invented (Lambert et al., 1960) to avoid validity threats and obtain more genuine attitudes. Although being criticized for using contrived speech samples (Lybaert, 2017),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keeping the social desirability effect to the minimum.

Traditionally, the learning and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favored British and American “native speaker” (NS) varieties as standards, which also entailed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al hegemony. Such NS standards have been challenged, particularly by Kachru’s (1982/1992) “World Englishes” (WE) which classified English varieties around the globe into the “Inner Circle” (NS varieties), “Outer Circle” (traditionally interlanguage based on “second languages”), and “Expanding Circle” (traditionally interlanguage based on “foreign languages”). These multiple varieties were supposed to hold equal status, with different internal standards. Related to WE are other concepts such as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IL),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and “global Englishes”. Despite differences in conceptualization (Kachru & Nelson, 2006; Seidlhofer, 2011), these concepts were aligned in challenging the hegemony of NS standards and advocating more open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t English varieties (Jenkins, 2006; Kirkpatrick, 2015).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varieties have gone through changes in the past 50 year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people speaking “standard” British English (Received Pronunciation, RP) were perceived to have higher status or competence than speakers of other English varieties. Similar results were found in UK (Giles, 1970), Australia (Ball, 1983), and New Zealand (Huygens & Vaughan, 1983).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perceived superiority of RP dropt, while the American variety became its strong competitor in status, as found among US,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n participants (Bayard et al., 2001) .

In Asia where many countries of the Outer and Expanding Circles are located, studies on language attitud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have increased in the new millennium. Recent research have shown tha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RP and American English were well maintained, yet evaluations of other varieties somewhat improved. McKenzie (2008) found Japanese participants’ rating of American Englis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British English. Kaur’s (2014) questionnaire study showed that pre-service teachers in Malaysia preferred English NS accents, and viewed non-native speaker (NNS) accents as inaccurate and inappropriate. Ahn (2014) examined the attitudes towards Korean English held by English teachers in Korea, including Koreans and non-Koreans. The participants were found to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Korean English in cognition, but were “confused” and “conflicting” on the behavioral dimension. Shibata’s (2010)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n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n Japan focused on attitudes towards two types of NNS teaching assistants (TAs). Participants held limited accepting attitudes towards NNS TAs, and TAs with grammatical accuracy were preferred over those with more native-like accents. Adopting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and focusing on the effect of ELF online communication on language attitudes/beliefs, Ke & Cahyani (2014) compared the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among 58 Taiwanese and 48 Indonesian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a two-semester project of NNS-NNS online communication. It was found that although students gained confidence as English users after the project, their NS-based language attitudes remained largely consistent as before.

To account for positive attitude change desired in intercultural contact, the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or “intergroup contact hypothesis” is one of the few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at enlightened empirical studies. Proposed originally by social psychologist Allport (1954), the theory predicts that positive intergroup attitude outcome depends on four optimal

features of the contact situation: equal status of the groups, common goals, intergroup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Later researchers developed this theory (for a review, see Pettigrew et al, 2011; Hodson & Hewstone, 2013) also proposed “membership salience” (Brown et al., 1999), i.e., when the outgroup members contacted are perceived as “typical” of their group, it is more likely that intergroup contact will lead to positive attitude change of the outgroup. The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has gained strong empirical support. Pettigrew and Tropp’s (2006) meta-analyses of 515 studies has shown that intergroup contact typically reduces prejudice. They have also shown that contact has positive effects even when the optimal conditions originally proposed by Allport are not fulfilled. Godon and Hewston and Swart’s (2013)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studies shows the broad range of beneficial outcomes of intergroup contact (e.g., outgroup attitudes, social distance, perceived outgroup variability,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reduced negative mediators (e.g., intergroup anxiety, and threat), and increased positive mediators (e.g., empathy, self disclosure, and outgroup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on IC, descriptive studies of short-term study abroad programs have found positive outcomes (e.g., Chieffo & Griffiths, 2004; Peppas, 2005).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work and drawing on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Yashima (2010) drew on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d adopt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o compare Japanese colleg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2-3 week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projects, and those who did not. Preliminary analyses found that in most IC aspects studied, including openness/ethnorelativism, international concer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self-efficacy, volunteer project participants were higher than non-participants. ANCOVA results further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roject participants and non-participants after controlling for pre-existing differences in all of the variables studied.

Despite the influence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general, language attitude studies guided by this theory have been few. Apart from interdisciplinary barriers, the feasibility of attitudinal intervention and experimental design requirements may also be reasons for its limited application. Another challenge is to sort out the possible reciprocal relation betwee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positive attitude or attitude change. However, the theory offers useful general research insights for a broad range of methodological types.

In China mainland, “China English” (CE) as a WE variety has attracted research attention among language educators since the 1980s and 1990s, generating heated theoretical debates (Li, 1993; Xie, 1994). A general move towar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CE can be discerned i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Currently most Chinese scholars hold that CE results necessaril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show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is in agreement with rather than in contradiction with internalization (Wen & Yu, 2003; Pan, 2005; Li, 2006; He, 2009). At the same time, IC has been promoted in recent years to replac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Gu, 2016), and began to be a formal goal as written in the 2017 version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foreign education at the tertiary level (Sun, 2016). While previous IC education in China focused more on intercultural knowledge, the new curriculum highlighted respect for cultural diversity,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effecti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Yet empirical studies on language attitudes have shown that Chinese students generally held conservative language attitudes and lacked respect for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equality. Their evaluations of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were higher than their evaluation of Chinese Putonghua; their evaluation of CE was low (Gao, Su & Zhou, 2000; Wang & Wang, 2004). They knew little about and held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WE varieties other than standard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though some students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many standard Englishes” (Kirkpatrick & Xu, 2002), and CE should have an equal status with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Bian, 2009). For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attitude studies produced mixed or contradictory findings. Some found “craze for American English” (Yan, 1994) and American English was rated higher than British English (Zhou & Chen, 2008); others found British English was ranked higher than American English (Evans, 2010). However, systematic studies on attitudes toward WE other than standard NS varieties have been rare.

With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the world is approaching China.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have been held in China, with student volunteers providing service in multiple languages, especially English. What W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hese intercultural volunteers held, if their W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underwent substantial changes after the activities, what cultural identities were implied in these attitudes — these questions are important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and IC cultivation.

The present study was targeted at Chinese student volunteers in four international events between 2008 and 2011, namely Beijing Olympic Games, Shanghai World Expo, Guangzhou

Asian Games, and Shenzhen Universiade. Based on independent studies of the four sites (Gao & Lin, 2008; Lin & Gao, 2010; Liu & Deng, 2013; Zhao & Chen, 2014; Chen, Yan & Jiang, 2014). In a general sense, the volunteer work context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group contact hypothesis, i.e., the participating groups were of equal status (fellow sportsmen or trading partners); they were in pursuit of common goals (friendship, solidarity, and fair-play; promoting public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ed worldwide), and the intergroup contact is institutionally supported (by the host government and guest governments alike). The major exception might be “intergroup cooperation,” as in sports meet competition is involved between teams among nations, and there may be commercial competitions behind exhibition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lthough individual perceptions and “membership salience” in specific settings are bound to vary, it would st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if WE knowledge increase and positive attitude change would happen during the event, without deliberately implemented intervention. Results of such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would also serve as a baseline for future research as well as teaching and training practice.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two general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well did the volunteers recognize the given WE varieties? Compared with pre-event recognition, were there changes in the recognition after the events? If so, what were they?

(2) How did the volunteers evaluate the given WE varieties? Compared with pre-event evaluation, were there changes in the evaluation after the events? If so, what were they?

### **Method**

A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was conducted to over college students in a pre-and-post test design. No deliberate research intervention was implemented in-between, except for the intercultural events during which they served as volunteers. Five recordings of the same material with distinct accents of English varieties were played to the participa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asked to fill in a 7-point semantic scale to elicit their attitudes to the above five varieties. T-test was run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volunteers' attitud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events.

### **Participants**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four international events, who served as volunteers,



held in China, i.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ug. 8-24, 2008), Shanghai World Expo (May 1-Oct.31, 2010), Guangzhou Asian Games (Nov.12-27, 2010), and Shenzhen Universiade (Aug. 12-23, 2011) (Table 1). The 551 participants in the post-test were those remaining from the larger sample of 758 participants from the pre-test. Except for those of Guangzhou Asian Games, all the other volunteers participated in both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the research. Reasons for the attrition included various absenteeism, and failure to collect post-test questionnaire copies. For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reasons, no effort was to identify and match individuals' pre- and post-test questionnaire copies.

**Table 1 Number of participants**

	<b>Olympic Games (2008)</b>	<b>World Expo (2010)</b>	<b>Asian Games (2010)</b>	<b>Universiade (2011)</b>	<b>Total</b>
Before the events	200	267	0	291	758
After the events	69	267	119	96	551

Participants had varied tasks in the events. Among those who served sports games in Beiji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76% were involved “language service” which depended primarily on L2 skills such as interpretation inside competition venues. The rest were “non-language service” which did not rely heavily on L2 skills, such as information provision and emergency help in service stations set on public spots outside the venues. For the Shanghai World Expo, 46.8% worked in the Expo Park, their services including guiding visitors, interpretation, media and forum organization, which involved more possible contact with international guests or Expo clerks. 36.7% worked in service stations in the city, and the remaining 16.5% were doing general, miscellaneous tasks (Lin & Gao, 2010; Liu & Deng, 2013; Zhao & Chen, 2014; Chen, Yan & Jiang, 2014).

### **Instruments**

The instrument was a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which consisted of a recording and a questionnaire. The recording was five readings of a 71-word-long text, introducing a technical device “temperature relieve valve”. This technical content was deliberately chosen to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of any cultural attachment influence to participants. Five males, aged 20 to 25, were recruited to record the above mentioned material with their own native accents, namely

British English (BE) (from London), American English (AE) (from Maryland), African-American English (AAE) (an African-American from Indiana), Indian English (IE) (from the south of India), and Chinese English (CE) (from Beijing). The range of these varieties covered Kachru's (1982/1992) Inner Circle (BE, AE, and AAE), Outer Circle (IE), and Expanding Circle (CE). Within the Inner Circle, it included "standard" varieties (BE and AE) and a "non-standard" variety (AAE). The variation of reading lengths was within the range between 26 and 30 seconds.

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fill out after listening to each record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an open question, which required the participants to identify the geographical, racial or ethnic origins of the speaker. The second part, designed to measure attitudes towards the given varieties, was a 7-point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with 1 representing "the least" and 7 "the most". There were altogether 16 rating items in the form of antonymous adjective pairs (e.g., "respected" vs. "not respected"), and these 16 items were distributed into four categories: social status, solidarity, general ability and event-related ability (Table 2).

The first two categories, i.e. social status and solidarity were frequently examined in language attitudes studies, but their trait adjectives varied. Hiraga (2005) generated five adjectives for each category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such as "educated or not" and "wealthy or not" for social status; "friendly or not" and "reliable or not" for solidarity. Ferrer (2010) applied seven pairs of adjectives to measure social status and another three for solidarity. The category of general ability or competence was also included in previous studies. Bernaisch and Koch (2016), for example, included four pairs of adjectives such as "smart or not" and "flawless or not". The present study chose the commonly used adjectives from previous studies for the "general ability" category, and added the last category — "event-related ability". This category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event that the volunteers served. Thus, "sports ability" was used for the three sports competitions (Beijing Olympic Games, Guangzhou Asian Games, and Shenzhen Universiade),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y" was adopted for the exposition (Shanghai World Expo).

**Table 2 Attitude Rating Scale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Categories</b>	<b>Items</b>
Social status	(1) respected vs. not respected; (2) high income vs. low income; (3) high education vs. low education; (4) refined vs. unconfined
Solidarity	(1) friendly vs. unfriendly; (2) warm vs. cold; (3) genial vs. serious; (4) reliable vs. unreliable
General ability	(1) confident vs. humble; (2) having leadership skills vs. lacking leadership skills; (3) capable vs. compliant; (4) enterprising vs. happy-go-lucky
Event-related ability	Sports ability (1) keen for sports vs. not keen for sports; (2) gifted in sports vs. not gifted in sports; (3) robust vs. frail; (4) physically active vs. sedate
	Communicative ability (1) articulate vs. inarticulate; (2) active in communication vs. passive in communication; (3) clear verbal expression vs. vague verbal expression; (4) rich body language vs. lacking body language

The pre-post reliabilities showed satisfactory Cronbach  $\alpha$  values: AAE pretest 0.735/posttest 0.832, BE 0.802/0.817, CE 0.830/0.802, IE 0.794/0.837, and AE 0.828/0.859, all above 0.7.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with the same procedure, though the post-event order of recordings differed from the pre-event order. The five recordings were played to the participants. After each recording, there was a pause, during which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recognize the variety of English first by answering the open question, and then fill in the 7-point semantic scale according to their impression of the recorded speaker.

For the recognition of varieties, the score of 2 was assigned to a correct answer (e.g., “African-American English” or “black American English” for AAE, “Chinese English” or “China English” for CE); 1 was assigned to a close answer (i.e., “American” or “North

American” for AAE, “Western European” or “Europe” for BE, “East Asian” or “Asian” for CE, “South Asian” or “Asian” for IE, and “North American” for AE), while no score would be assigned to answers other than the abov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as then calculated.

For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varieti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tabulated regarding each of the four categories of each variety, and of the sum total of each variety. To compare the pre- and post-event scores of variety recognition and attitude, t-tests were conducted by SPSS 17.0, with missing data automatically excluded, and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was fixed at  $\alpha = 0.05$ .

## Results

Differences of variety recognition accuracy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events

Table 3 shows that the ranking accuracy of variety recognition followed the subsequent order: CE > AE/BE > IE/AAE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reveals tha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for all varieties was improved after the events.

Su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volunteers could identify local varieties of English (CE) (Kirkpatrick, 2007)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followed by “standard” varieties (AE/BE), while they almost failed to recognize other “non-standard” varieties (IE/AAE). While there was no surprise that these Chinese students had no difficulty recognizing their own English variety, the differential recognition rates of other varieties could probably be attributed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these students received. In China, English education at element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all highly relied on “standard” AE and BE models, and students had little access to other English varieties except their own, i.e., CE.

Readers are reminded that the following results of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t varieties should be read by referring to the above accuracy rate of recognition. For those less identified varieties, IE and AAE in particular, validities of the attitude scores were limited. That is, the related attitudes might be directed towards varieties of a vague rather than a specific kind (IE was taken as a certain kind of “non-standard” English, and AAE was sometimes confused with general American English).

**Table 3 T-test statistics of variety recognition accuracy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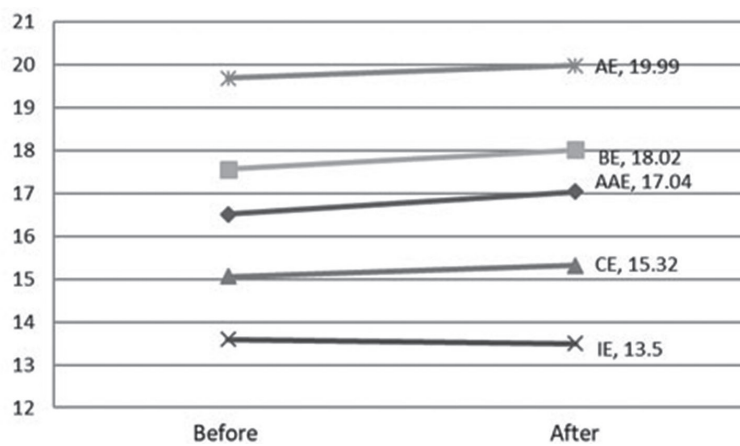
	After (n=551)		Before (n=758)		MD	t (df)
	M	SD	M	SD		
AAE	0.52	0.55	0.42	0.52	0.10	3.195* (1096.755)
BE	1.06	0.95	0.94	0.95	0.12	2.216* (1235)
CE	1.52	0.82	1.40	0.87	0.12	2.394* (1179.834)
IE	0.54	0.85	0.41	0.79	0.13	2.831* (1105.811)
AE	1.13	0.95	1.01	0.96	0.12	2.292* (1257)

\* p < 0.05

**Differences of attitudes to varie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events**

**Overall differences**

Figure 1 indicates that the scores of volunteers’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followed the subsequent order: AE > BE > AAE > CE > IE,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Table 4 reveals that the scores of overall attitudes towards AE, BE, and AAE rose up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events. The results reveal a consistent tendency of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varieties: “standard varieties” (AE and BE) were in a prestigious status and “non-standard varieties” (AAE, CE and IE) were lower in attitudinal ranking. For the last three varieties, namely AAE, CE, and IE, respondents ordered the one in the Inner Circle (AAE) above those in other circles. This result indirectly illustrates the volunteer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standard” varieties.



**Figure 1 Overall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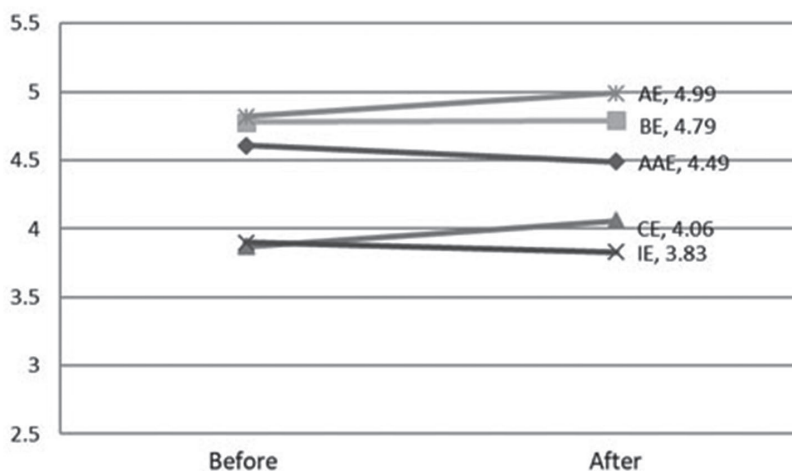
**Table 4 T-test statistics of overall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After ( <i>n</i> =551)		Before ( <i>n</i> =758)		<i>MD</i>	<i>t</i> ( <i>df</i> )
	<i>M</i>	<i>SD</i>	<i>M</i>	<i>SD</i>		
<b>AAE</b>	17.04	3.72	16.51	3.61	0.53	2.566* (1307)
<b>BE</b>	18.02	3.00	17.57	3.40	0.45	2.558* (1259.347)
<b>CE</b>	15.32	2.44	15.06	2.93	0.26	1.765 (1282.769)
<b>IE</b>	13.50	2.88	13.59	2.93	-0.09	-0.555 (1307)
<b>AE</b>	19.99	2.54	19.69	2.96	0.30	1.968* (1271.648)

\*  $p < 0.05$

**Ranking of social status**

As for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varieties, Figure 2 indicates that BE/AE held a high position in the rank, followed by AAE, CE and IE respectively. It also shows that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ev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E and BE ( $p > 0.005$ ), nor between CE and IE ( $p > 0.005$ ). While after the ev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ppeared among any two of the varieties ( $p < 0.005$ ). Table 5 reveals that the scores of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status of AE and CE rose up significantly, while those of AAE drop down significantly, and the scores of attitudes towards of BE and IE did not exhibi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s after the events.



**Figure 2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social stat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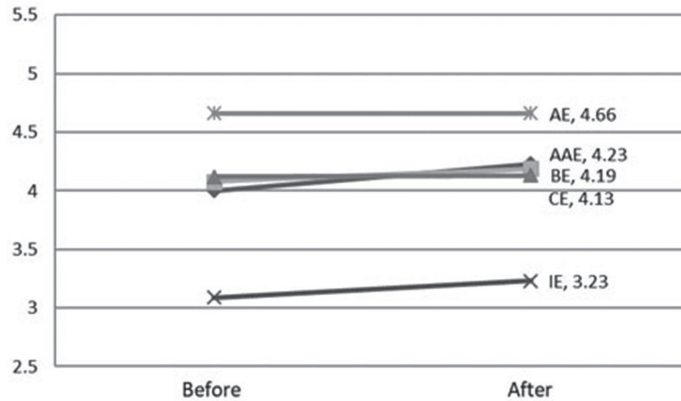
**Table 5** T-test statistics of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social status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After (n=551)		Before (n=758)		MD	t (df)
	M	SD	M	SD		
<b>AAE</b>	4.49	0.92	4.61	0.96	-0.12	-2.276* (1307)
<b>BE</b>	4.79	0.83	4.78	0.94	0.01	0.225 (1260.601)
<b>CE</b>	4.06	0.78	3.87	0.89	0.19	4.052* (1258.901)
<b>IE</b>	3.83	0.89	3.90	0.99	-0.07	-1.312 (1247.494)
<b>AE</b>	4.99	0.82	4.82	0.99	0.17	3.306* (1285.450)

\* p < 0.05

**Ranking of solidarity**

As for the solidarity of these varieties, Figure 3 indicates that AE ranked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CE/BE/AAE, and IE scored the lowest. It also shows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CE, BE, and AAE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r events (p > 0.005). Table 6 reveals that the scores of attitudes towards solidarity of AAE and IE rose up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scores of other varieties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events.



**Figure 3**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solidarity

**Table 6** T-test statistics of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solidar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After (n=551)		Before (n=758)		MD	t (df)
	M	SD	M	SD		
<b>AAE</b>	4.23	1.05	4.00	1.13	0.23	3.749* (1307)
<b>BE</b>	4.19	0.95	4.08	1.07	0.11	1.819 (1259.371)
<b>CE</b>	4.13	0.79	4.12	0.95	0.01	0.149 (1282.119)
<b>IE</b>	3.23	0.87	3.09	0.99	0.14	2.675* (1259.168)
<b>AE</b>	4.66	0.92	4.66	0.99	-0.00	-0.006 (1232.470)

\* p < 0.05

The result of CE's low rating wa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in which participants' local English variety ranked higher than "standard varieties" on the solidarity scale, though its ranking on the status scale was lower than "standard varieties" (e.g., Gao et al., 2000; Wang & Wang, 2004). This may indicate that either the volunteers in this research were more conservative in language attitudes (possibly due to the institutional selection requirement for "good English" skills), or that the participants lacked sensitivity to rating dimension difference and there was a halo effect in the rating across dimensions, e.g., the "good" varieties tended to be judged "good" on all dimensions.

### *Ranking of general ability*

As for the category of general ability, Figure 4 indicates that the ranking order of the five varieties was AE > BE > AAE > CE > IE. Before the ev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005$ ) between CE and IE, but after the events, there appear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ny two of these varieties ( $p < 0.005$ ). Table 7 reveals that the scores of attitudes towards general ability of AE, BE, CE rose up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scores of AAE and IE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ev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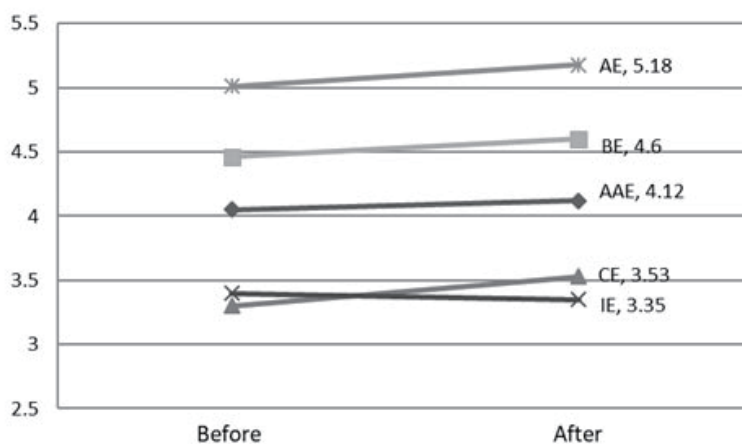


Figure 4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general abi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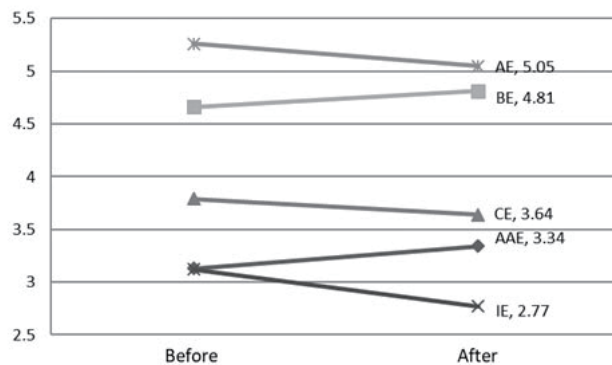
**Table 7** T-test statistics of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general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After (n=551)		Before (n=758)		MD	t (df)
	M	SD	M	SD		
AAE	4.12	1.27	4.05	1.20	0.07	0.950 (1147.592)
BE	4.60	1.14	4.46	1.23	0.14	2.079* (1307)
CE	3.53	0.91	3.30	1.31	0.23	3.732* (1303.998)
IE	3.35	0.99	3.40	1.12	-0.05	-0.815 (1255.246)
AE	5.18	0.92	5.01	1.05	0.17	3.110* (1262.347)

\* p < 0.05

**Ranking of event-related ability (sports ability)**

There were three sports meetings and one business and technological confere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so the event-related ability consisted of two subcategories: sports ability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y (Table 2).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rmer. Figure 5 indicates that sports ability ranking order was AE > BE > CE > AAE > IE. Before the ev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05) between AAE and IE, but after the events, there appear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ny two of these varieties (p < 0.005). Table 8 reveals that the scores of attitudes towards general ability of AAE and BE rose up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scores of AE, CE, and IE dropped down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events. However, the post-event ordering of the varieties was unchanged compared to the pre-event result. The rating of AAE was still far from high enough to compete with those of AE and BE, which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cultural stereotype that African Americans were gifted in sports. This result might be explained by the low recognition rate of AAE, and also the halo effect of variety judgment as discussed earlier in the explanation of solidarity ratings. (For the results regarding communicative ability, please refer to Chen, Yan, and Jiang, 2014).



**Figure 5**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event-related ability (sports ability)

**Table 8 T-test statistics of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sports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After ( <i>n</i> =284)		Before ( <i>n</i> =491)		<i>MD</i>	<i>t (df)</i>
	<i>M</i>	<i>SD</i>	<i>M</i>	<i>SD</i>		
<b>AAE</b>	3.34	0.93	3.13	0.96	0.21	2.907* (773)
<b>BE</b>	4.81	0.89	4.66	1.11	0.15	2.056* (697.891)
<b>CE</b>	3.64	0.98	3.79	1.16	-0.15	-1.994* (675.229)
<b>IE</b>	2.77	0.84	3.12	1.18	-0.35	-4.894* (740.873)
<b>AE</b>	5.05	0.81	5.26	1.14	-0.21	-2.929* (740.288)

\*  $p < 0.05$

To summarize, regarding variety recognition, the accuracy rates had the following ranking: CE > AE/BE > IE > AAE;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rates for all varieties were improved after the events. In other words, the intergroup contact experi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events helped to improve volunteers' knowledge of WE varieties. Regarding language attitudes, the five WE varieties ranked in a systematic way on the four dimensions (Table 9). Generally speaking, the tendency of ranking in all four dimensions is as follows: AE > BE > AAE > CE > IE, the same with the overall ranks (cf. Table 4). AE and BE, the two standard native varieties in the study, gained an advantage in almost all four dimensions. AAE, the non-standard native variety, ranked lower than the above two ones, but higher than the local variety (CE) and the expanding circle variety (IE). On the one hand, our findings are in line with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show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standard varieties and participants' positive language attitudes (Kalmar, Zhong & Xiao, 1987; Long, 1997; Wang & Wang, 2004). On the other hand, we found the participants' local variety, CE in this case, did not rank the highest in solidarity as found in previous studies. This is in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For example, Ogbu's research (1999) found that local variety of English was the most favoured one in solidarity. Participants in our research seem to have revealed a halo effect in language attitudes' ranking: when they favoured a variety (AE in this case), they showed that favourite attitudes towards all the aspects related with that variety. To the degree of its accurate recognition rate,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the consistent low ratings of IE. Pre- and post-test comparisons indicate that Chinese college-student volunteers possessed conservative language attitudes and simple cultural stereotypes, which remained unchang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events, independent of their improved WE knowledge.

**Table 9 Ranking order of varieties on different dimensions (before/after the events)**

	<b>Social status</b>	<b>Solidarity</b>	<b>General ability</b>	<b>Sports ability</b>	<b>Overall</b>
<b>AAE</b>	3 / 3	4 / 2	3 / 3	4 / 4	3 / 3
<b>BE</b>	2 / 2	3 / 3	2 / 2	2 / 2	2 / 2
<b>CE</b>	5 / 4	2 / 4	5 / 4	3 / 3	4 / 4
<b>IE</b>	4 / 5	5 / 5	4 / 5	5 / 5	5 / 5
<b>AE</b>	1 / 1	1 / 1	1 / 1	1 / 1	1 / 1

### Discussion

The research had some limitations. For practical reasons, we failed to collect pre-event data from the Guanzhou Asian Games participants. Also, the pre- and post-test results were not matched on individual basis, so T-test for independent samples rather than paired samples was adopted.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rates of AAE and IE were not high, which affec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pective attitudes. Despite these limitations, some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can be drawn.

Regarding the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variety recognition, Chinese college-student volunteers easily recognized “standard varieties” of AE and BE, but did not successfully recognize “non-standard” varieties except their own local variety CE. The accuracy of variety recognition rose up in general after the events. Regarding the second research question, evaluation of WE varieties, participants’ overall ratings were consist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s, in the following descending order: AE/BE > AAE > CE/IE,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pre- and post-event differences on specific dimensions.

Such findings have several indications. First, the Chinese student volunteers’ attitudes towards WE were very conservative, following the NS-centered tradition. In general, they evaluated “standard” NS varieties much more positively than other varieties, especially local (Outer Circle and Expanding Circle) varieties. This tendency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indings about Chinese mainland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varieties (Gao, Su, & Zhou, 2000; Wang & Wang, 2004; Bian, 2009), yet it seemed more striking in its intercultural contexts, as volunteers for international events were expected to be open and friendly to participants from all cultures. Behind such a phenomenon may be the long dominance of AE and BE standards in China’s English education.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volunteers for intercultural events would unsurprisingly adopt AE and BE as language

standards. The closer the students' English was to AE or BE, the better they were as volunteer candidates. This yardstick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amely the respect for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versities. It is also inconsistent with the IC objective as stipulated in the new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Sun, 2016). As part of future IC cultiv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pedagogical objectives to include open language attitude development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general, and receptive skills of WE varieties for college English majors in particular.

Second, there seemed to be positiv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event participation on WE knowledge, but little effect on language attitude change. The stereotypes were even partially strengthened rather than weakened after the events, as shown in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ratings of AE and BE. This in a way echoes previous research (e.g., Ke & Cahyani, 2014) in showing the durable feature of language attitudes and cultural stereotypes. The strengthening of stereotypes in our study seems more distinct and revealing. In light of the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it suggests that "outgroup knowledge" itself may not be related to positive attitude change. The quality of intergroup contact and internal reflection may also be issue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n this study, the events were held in the volunteers' home country; the intercultural contact was typically in short term, and not very deep. Merely involving peopl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r teach them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knowledge may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attitudinal changes. If task type and contact period are given for such event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may be combined with guided reflection of experience. Moreover, attitude cultivation may be integrated into long-term general education. We have made some pedagogical attempts in this direction and shown preliminary achievements (Zheng & Gao, 2016).

Third, methodologica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ults can be further explor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th its indirect approach, in line with previous studies adopting the same approach (e.g., Gao et al., 2000; Wang & Wang, 2004), seem less optimistic than some language attitude studies using (discourse-based) direct approach (e.g., Bian, 2009; Kirkpatrick & Xu, 2002; Lybaert, 2017; Madariaga et al., 2016). It may be said that projection deals with the deeper, more genuine, and more stubborn part of inner attitudes. Our own study with interview components also identified more open, reflective language attitudes among some participants in the same quantitative sample (Lin & Gao, 2010), but these rational views did not well match the results of indirect projective ratings. While the more optimistic views

of open attitudes will encourage educators to move ahead, the “deeper” or more “genuine” view of conservative attitudes will keep us alert of the challenges of attitude change and IC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 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stereotype projection remains to be scrutinized. Although the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in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capture possible dimensional differences of ratings (e.g., AAE might be rated higher than other varieties on sports ability), such differences were not clearly seen or did not show clear patterns. Instead, there seemed to be a “halo effect” in that when a variety was rated high, it tended to be high on various dimensions. Such undifferentiated ratings might be related to limited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exposures of the participants, or limitations of the instrument design, or general mechanisms of stereotype projection. Answers are expected to be explored in future research.

### **Acknowledgements**

The paper presents a synthesis of the team-research project, “Language Attitudes and Identities of English Users” (China’s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late funding), grant no. 14FYY001). Related findings were published in Chinese (Waiyu jiaoxu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35(1), 43-48) in, 2014, targeted at domestic Chinese readers.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reframing and rewriting was made in this paper targeted at English readers. The authors are very grateful to colleagues who worked in the four research groups led respectively by Jinglan YAN (Shanghai), Jianping CHEN (Guangzhou), Yi LIU (Shenzhen), and Yihong GAO (Beijing).

### **REFERENCES**

- 陈叙、颜静兰、姜叶飞 2014 上海世博会前后大学生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调查,《语言学研究》第 14 辑, 168-180 页。
- 高一虹、林梦茜 2008 大学生奥运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奥运会前的一项主观投射测试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 4 期, 241-50 页。
- 何达倩 2009 中国英语的社会语言学理据,《理论月刊》第 3 期, 111-113 页。
- 李少华 2006《英语全球化与本土化视野中的中国英语》。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 李文中 1993 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18-24 页。
- 林梦茜、高一虹 2010 大学生奥运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奥运后的反思,《中国外语教育》第 1 期, 3-10 页。
- 刘毅、邓婷婷 2013 深圳大运会学生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语言学研究》第 13 辑, 212-223 页。

- 龙惠珠 1999 从职业背景看语言态度的分层,《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56-62页。
- 潘章仙 2005 《中国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孙有中 2016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中国外语》第3期,扉页,17-22页。
- 王志欣、王京 2004 大学生对四种语言变体的态度。高一虹等,《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125-148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文秋芳、俞希 2003 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国外外语教学》第3期,8-13页。
- 谢之君 1994 中国英语:跨文化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山东外语教学》第3-4期,63-68页。
- 颜静兰 1994 “美音热”与美国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27-29页。
- 赵玉超、陈建平 2014 广州亚运会志愿者对不同英语口语的态度调查,《语言学研究》第14辑,155-167页。
- 周榕、陈国华 2008 英语专业大学生英美英语态度偏好与实际口音特点研究,《现代外语》第1期,49-57页。
- Ahn, H. 2014.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s Korean English in South Korea. *World Englishes*, 33, 195-222.
- Allport, G.W.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Ball, P. 1983. Stereotypes of Anglo-Saxon and non-Anglo-Saxon accents: Some exploratory Australian studies with the matched-guise technique. *Language Sciences*, 5, 163-184.
- Bayard, D., Weatherall, A., Gallois, C., & Pittam, J. 2001. Pax Americana?: Accent attitudinal evaluations in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5, 22-49.
- Bennett, J.M., Bennett, M.J., & Allen, W. 1999.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In R.M. Paige, D.L. Lange, & Y.A. Yershova (eds.). *Culture as the Core: Integrating culture into language curriculum*. CARLA Working Paper 15 (pp.13-45).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 Bernaisch, T., & Koch, C. 2016.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es in India. *World Englishes*, 35, 118-132.
- Bian, Y. 2009. Chinese learners' identity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pronunciation/accents. *CELEA Journal*, 32, 66-74/30.
- Brown, R., Vivian, J., & Hewstone, M. 1999. Changing attitudes through intergroup contact: The effects of group membership sal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741-764.
- Chieffo, L. & Griffiths, L. 2004. Large-scale assessment of student attitudes after a short-term study abroad program.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10, 165-177.
- Evans, B. E. 2010. Chinese perception of Inner Circle varieties of English. *World Englishes*, 29, 270-280.
- Ferrer, R. C. 2010. Changing linguistic attitudes in Valencia: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planning measures.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4(4), 477-500.
- Gao, Y., Su, X., & Zhou, L. 2000. Pre-handover language attitudes in Hong Kong, Beijing and Guangzhou.

Attitudes Towards World Englishes Among Chinese Intercultural Volunteers: A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Study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10, 135-153.

Godon, H., Hewstone, M. & Swart, H. 2013. Advances in intergroup contact: Epilogue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G. Hodson & M. Hewstone (eds.). *Advances in intergroup contact* (pp.262-305).

London &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Garrett, P. 2007. Language attitudes. In C. Llamas, L. Mullany, & P. Stockwe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olinguistics* (pp. 116-121). NY: Routledge.

Garrett, P. 2010. *Attitudes to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les, H. 1970. Evaluative reactions to accents. *Educational Review*, 22, 211-227.

Gu, X. 2016.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FL education: A survey on EFL teachers'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in China.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6, 254-273.

Hiraga, Y. 2005.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six varieties of English in the USA and Britain. *World Englishes*, 24, 289-308.

Hodson, G. & Hewstone, M. (eds.). 2013. *Advances in intergroup contact*. London &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Huygens, I., & Vaughan, G. 1983. Language attitudes, ethnicity, and social class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4, 207-223.

Jenkins, J. 2006.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eaching world Englishes and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TESOL Quarterly*, 40, 157-181.

Kachru, B. (ed.). 1982/1992.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Kachru, Y., & Nelson, C. L. 2006. *World Englishes in Asian context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Kalmar, I., Zhong, Y., & Xiao, H. 1987. Language attitudes in Guangzhou, China. *Language in Society*, 16, 499-508.

Kaur, P. 2014.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18, 214-221.

Ke, I-C. & Cahyani, H. 2014. Learning to become users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How ELF online communication affects Taiwanese learners' beliefs of English. *System*, 46, 28-38.

Kirkpatrick, A. 2007. *World Englishe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rkpatrick, A. 2015. Response to audience after Invited Symposium speech. ELF and the Asian Corpus of English: Recent findings. ELF8, Beijing, August 25-27.

Kirkpatrick, A. & Xu, Z-C. 2002. Chinese pragmatic norms and "China English". *World Englishes*, 21,

269-279.

- Lambert, W. E., Hodgson, R., Gardner, R.C., & Fillenbaum, S. 1960.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44-51.
- Lybaert, C. 2017. A direct discourse-bas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ttitudes: The case of tussentaal in Flanders. *Language Sciences*, 59, 93-116.
- Madariaga, J-M., Huguet, A. & Janés, J. 2016. Language attitudes in Catalan multilingual classrooms: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6(2), 216-234.
- McKenzie, R. 2008. The role of variety recognition in Jap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speech variet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9, 139-153.
- Ogbu, J. 1999. Beyond language: Ebonics, proper English and identity in a Black-American speech community.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6, 147-184.
- Peppas, S.C. 2005. The business study abroad tours for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An outcome assessment.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11, 143-163.
- Pettigrew, T.F. & Tropp, L. R. 2006. 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5), 751-783.
- Pettigrew, T.F., Tropp, L.R., Wagner, U., & Christ, O. 2011. Recent advances in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5, 271-280.
- Seidlhofer, B. 2011. *Understand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ibata, M. 2010. How Japanese teachers of English perceive non-native assistant English teachers. *System*, 38, 124-133.
- Yashima, T. 2010.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work experiences o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Japanese you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4, 268-282.
- Zheng, X. & Gao, Y. 2016. Language attitude education as ICC facilitation: An explorative class.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40(1), 3-20.



## 中国跨文化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 ——一项主观反应测试研究

高一虹 许宏晨

(高一虹 北京大学; 许宏晨 中国外交学院)

**提 要:** 过往研究特别是群际接触理论 (Allport, 1954) 发现, 群际接触有利于对外群体态度的积极转变。本研究将语言态度视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 在此视角下考察了中国大学生志愿者在四次本土举行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前后有关世界英语的知识和态度。研究采用主观反应测试, 参加前测的志愿者 758 名, 其中的 551 名参加了后测。录音刺激材料包含英国英语、美国英语、美国黑人英语、印度英语和中国英语。研究发现: (1) 变体识别正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中国英语 > 美国英语 / 英国英语 > 印度英语 > 美国黑人英语; 四次活动后变体识别正确率均有提升; (2) 对五种变体的总体评价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 美国英语 > 英国英语 > 美国黑人英语 > 中国英语 > 印度英语, 该排序在活动前后保持不变。以上发现表明大学生志愿者的语言态度总体说来趋于保守, 且与活动中增加的世界英语知识并无太大关联。未实施任何干预的短时跨文化交际活动对语言态度的正向改变作用有限。文章还讨论了本研究对英语教学和研究方法的启示。

**关键词:** 语言态度;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世界英语; 群际接触理论; 志愿者; 主观反应测试

# 高中生对世界英语态度的实证研究<sup>1</sup>

张 茜 刘宏刚

**提 要:** 外语学习者对于语言变体的态度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经典课题(如 Lambert, 1960; Giles, 1970),随着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学习者对于世界英语的态度研究也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如 Yoshikawa, 2005; 高一虹、林梦茜, 2008, 2010; 许宏晨、高一虹, 2014 等),但研究关注的成年语言学习者较多(Hundt, 2015; Tokumoto, 2011; Gao & Lin, 2008/2010),对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对世界英语态度的研究仍有待丰富。本研究基于高一虹、林梦茜(2008/2010)的大学生对世界英语态度的语义区分量表,根据高中英语教学实际,形成了“高中生英语态度”量表,通过主观反应测试的方法,考察 137 名高二年级学生对五种典型的英语变体:美国英语、美国黑人英语、英国英语、印度英语和中国英语的语言态度,探究(1)高中生对世界英语的语言态度是什么?以及(2)高中生对五种语言变体的态度在每一维度(地位、亲和力、一般能力和交流能力)上的差异是什么?这两个主要问题。研究结果显示(1)受试对内圈英语(英国英语、美国英语)评价较高,对其它变体呈现复杂多元化的语言态度(如对印度英语和中国英语辨识度较高);(2)英国英语得到很高的认同,在地位、语言亲和力、一般能力和交流能力维度上的评价都优于其它英语变体。

**关键词:** 世界英语; 语言态度; 高中生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作为一种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英语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令其成为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全球化带来的语言文化流动使得语言间频繁接触,由此产生了多种与自己国家语言文化相融合的英语变体,世界英语理论应运而生。英语正在变为多种变体的集合体,应用复数的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来描述此状况(祝畹瑾, 2013)。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语言学者开始关注世界英语。他们不仅聚焦于带有本土化特征的英语变体的语言学特征,并将其与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分析新变体反映的世界结构(Kachru, 1992)。随之出现了以世界英语命名的国际期刊 World Englishes (1985), 及 English World-wide (1984)、English Today (1985) 和学

<sup>1</sup> 本文初稿曾在第十一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ld Englishes, IAWE)。英语变体的分类方法有很多(如McArthur, 1987; Gorlach, 1988; Quick, 1990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卡奇鲁(Kachru, 1982/1992)的同心圆模型理论。以历史和地理位置为依据,卡奇鲁将世界英语分为内圈、外圈和扩展圈。内圈英语是本族语者变体,作为英语规范的提供者;外圈英语是制度化的英语变体用于政府、教育等领域,他们对英语的使用进行了发扬。在扩展圈中,英语作为外语,他们对英语的学习和使用依靠本族语变体规范。历史上,在英语的传播过程中,有两次大规模的英语扩散运动。第一次扩散将英语带到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构成了内圈国家。第二次扩散主要是由于英美的殖民扩张,将英语传入亚洲和非洲等国家(如印度、尼日利亚等),这些国家形成外圈(Jenkins, 2015)。全球化促进了国家之间经济贸易的往来,英语在扩展圈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中得以广泛传播。卡奇鲁的同心圆模型为我们理解英语广泛传播的社会语言学现实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Jenkins, 2015)。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非本族语变体的地位在不断提升。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并不意味着是本族语的传播,学习英语已不再是因为对本族语族群或是本族者文化感兴趣,而是反映了来自特定文化背景的英语使用者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认同感(Honna, 2008)。在这种趋势影响下,许多非本族语者英语变体逐渐获得合法地位,而从属于扩展圈的中国是世界上英语使用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英语对英语语言的发展必定产生重要的影响(He, 2009)。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来表达想法,然而某种语言变体总是带有特定社会意义,从而引起不同的态度反应。态度是对社会上特定事物的评价性取向,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Garrett, 2010)。语言态度是对某种语言变体的正面或负面评价。从认知角度来看,态度是一个精神构建的结果,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取向三个维度(Garrett, 2010)。对语言的态度即对讲这种语言变体的群体成员的态度,也即群体的刻板印象(高一虹、许宏晨, 2013)。语言态度的形成更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包括社会上他人对某种英语变体的评价带来的影响,身处多种英语变体环境中的自身体验或者在学习过程中受到教师和同学的影响(Tokumoto, 2011)。这种影响很容易造成英语学习者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进而影响我们的学习行为。语言态度及其所涉及的社会文化规范是我们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Hymes, 1971)。加德纳(Gardener, 1985)指出,二语学习过程同样归属于社会心理学现象,应将语言态度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联系起来。学习者的L2水平不是由年龄,性别或是社会阶层决定的,而是态度和与这些因素相关的社会环境决定的(Ellis, 1994)。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语言态度影响着英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自信心和学习效果。积极地语言态度促进语言的学习。对学生的语言态度的研究能让我们了解他们对本族语变体的刻板印象和他们关于英语如何

教与学的想法。(Galloway, 2018)

人们对某种语言变体(语言或方言)的态度,反映了该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其相关的社群成员在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高一虹、苏新春、周雷,1998)。对语言态度的研究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处理他们自己对某种语言变体的刻板印象、偏见、期望以及了解这种语言的语言学特征(Friedrich, 2000)。Lambert(1960)首次使用“配对变语技术(matches guised technique, MGT)”调查了加拿大蒙特利尔64名讲英语的大学生和66名讲法语的大学生对英语和法语的评价性态度,发现英语学生和法语学生都对英语评价较高,认为讲英语的人具有的聪明、独立、善良和积极进取的品质。平贺(Hiraga, 2005)以英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他们对英美标准变体和地方方言的语言态度,发现美国标准英语变体很受英国学生的喜爱。贾尔斯(Giles, 1970)调查了威尔士南部和英格兰西南部的高中生对英语口语的态度,发现受试对英国标准英语评价很高。认为法国和北美口音动听、有亲切感。同时,法国和爱尔兰口音很具有吸引力。德本(Mina Tokumoto, 2011)调查了来自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学生对他们自己带有L1口音的英语变体的态度,发现历史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使马来西亚对他们自身的英语变体持肯定态度,而韩国和日本与之相反,从中对日本的英语教育得到启示。兰伯特(Lambert)实验的里程碑意义在于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有关世界英语态度研究的历时特点。起初,英国标准英语(Received Pronunciation, RP)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随后,对美国标准英语(General American English, GAE)评价逐步上升。之后对带有非本族语语音特点的英语变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度,直至当今的对能够展示自己身份和声音的本土化变体的关注,“英语的故事”仍在不断丰富。

英语的全球化必然带来英语的本土化,作为在扩展圈内英语使用者人数最多的中国,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卡奇鲁的同心圆模型,中国英语从属于扩展圈国家,英语被视作外语或通用语。最近的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已经达到3.9亿(Wei & Su, 2012),中国英语的发展过程对英语多元化进程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葛传槿在1980年首次提出“中国英语”的概念,并对带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一些英语表达进行了举例,如“双百方针”(Two Hundreds Policy)、“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等。之后更有许多学者对中国英语是否作为英语的一种合法变体进行讨论(如Kirkpatrick & Xu, 2002)。何德源(He, 2009)分析了中国英语的语言学特征,并讨论将中国英语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应用于课堂教学的合理性。而汪卫红(Wang, 2015)调查了1589位中国大学生和193位大学老师对中国英语的语言态度,研究发现大学生和老师都不愿意接受中国英语作为教学模式。高一虹、林梦茜(2008/2010),陈叙、颜静兰、姜叶飞(2013),

赵玉超、陈建平（2014）和刘毅、邓婷婷（2013）分别探究了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上海世博会和深圳大运会前后对英语变体的辨识能力和语言态度，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大学生志愿者对语言态度整体上比较保守，对标准变体的评价高于其它英语变体，对语言变体的识别能力有限。然而，之前的研究关注成年学习者较多，而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语言态度关注的还较少。在此基础上，本文拟探究高中生对于世界英语的态度如何。

## 2. 研究设计

###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长春某中学高二年级的 137 名学生，其中理科生 86 名，占受试总人数的 63%；文科生 51 名，占受试总人数的 37%。所有受试学生均来自实验班（学习成绩较好），是因为期待他们有更高的英语敏感性和能够更好地配合完成任务，以得到较有效的数据。

### 2.2 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背景，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如下：

（1）高中生对世界英语的语言态度是什么？

（2）高中生对五种语言变体的态度在每一维度（地位、亲和力、一般能力和交流能力）上的差异是什么？

### 2.3 研究工具

语音是能反映各变体差别的重要层面，研究采用了配对变语技术（Lambert, 1960）的变化形式“言语伪装技术”（Verbal Guise Technique），也称“主观反应测试”（Subjective Reaction Test）。由来自不同国家的朗读者朗读同一篇英文材料，用以测试受试对朗读者发音的评价，而不是对某种英语变体的评价（Hiraga, 2010）。录音材料节选自期刊《聚合物》上的一篇学术文章《聚合物纳米技术：纳米复合材料》，长度为 60 词。朗读者是五位年龄在 26 到 30 岁之间的男性大学生或研究生，分别来自代表内圈英语变体的美国科罗拉多州（美国英语）、美国亚特兰大州（美国黑人英语）和英国伦敦（英国英语）；代表外圈英语变体的印度德里（印度英语）和代表扩展圈英语变体的中国北京（中国英语）。为减少外部因素影响，选取朗读者的标准为性别相同，教育背景和年龄相似。朗读者语速与高考听力语速一致，即 120 词每分钟，每段录音长 28 到 30 秒。

语义区分量表以问卷的形式呈现，是用来评价发音人的工具。本研究以高一虹、林梦茜（2008/2010）的大学生世界英语态度的语义区分量表为基础，根据高中英语教

学实际,形成了“高中生英语态度”量表。量表分成四个范畴:地位、亲和力、一般能力和交流能力。每个范畴由四对语义相反的形容词组成(表1),16个题项在量表中打乱顺序排序,量表实测信度总体良好(见表2)

表1 语义区分量表的范畴及题项

范畴题项	内容
地位	受人尊重—不受尊重;收入高—收入低; 教育程度高—教育程度低;彬彬有礼—不拘小节
亲和力	热情—冷漠;亲切—严肃;可靠—不可靠;易于亲近—不易亲近
一般能力	自信—谦卑;有领导才能—无领导才能; 精明强干—老实顺从;勇于进取—随遇而安
交流能力	善于表达—不善表达;主动交流—被动交流;言语清晰—言语含糊;体态语丰富— 体态语匮乏

表2 语义区分量表的信度

	美国英语	美国黑人英语	中国英语	英国英语	印度英语
地位	0.65	0.60	0.55	0.54	0.63
亲和力	0.50	0.59	0.48	0.56	0.47
一般能力	0.73	0.59	0.69	0.63	0.72
交流能力	0.56	0.56	0.45	0.56	0.69
总量表	0.78	0.81	0.79	0.75	0.82

受试在听完每段录音后,分别为每位朗读者在语义区分量表上打分,并完成量表下方的单项选择题判断朗读者来自于哪个国家。

#### 2.4 实施过程

实验于2017年12月在该校高二实验班的英语课堂上实施。发放问卷前告知受试,这是一项英语辨别力及敏感性的测试,每段录音播放三遍,录音播放顺序是美国英语、印度英语、中国英语、英国英语和美国黑人英语。要求根据对朗读者发音的印象(将注意力集中在朗读者的声音,而不是材料内容上)在英语辨别力及敏感性问卷上打分,受试同时要识别出朗读者来自于哪个国家,完成问卷下方的单选题。最后填写问卷中的基本信息部分。测试时长10到15分钟。

共发放试卷140份,其中有效问卷137份,问卷有效率为98%。将问卷所得数据输入SPSS 17.0进行以下处理:(1)语义区分量表的实测信度;(2)五种英语变体得分的描述性统计。

###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 3.1 世界英语辨识程度

对受试对朗读者国家判断的正确率进行了统计，反映了高中生对世界英语变体的识别率（表3），用于检测受试的“标签”意识。数据表明，高中生对英语变体的识别正确率为：中国英语 > 印度英语 > 美国黑人英语 > 美国英语 > 英国英语。

表3 高中生对世界英语变体识别率统计

变体名称	美国英语		美国黑人英语		中国英语		英国英语		印度英语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正确	77	56.2%	115	83.9%	134	97.8%	73	53.3%	116	84.7%
错误	60	43.8%	22	16.1%	3	2.2%	64	46.7%	21	15.3%

高中生对中国英语识别正确率最高，在国内，外语环境的局限性使学生接触外语变体的机会有限。接触英语最多的途径就是在英语课堂上与中国籍的老师和同学或极少数的外籍教师交流。因此，高中生经常听到中国英语的口音，因而熟悉度较高。然而，高中生对印度英语和美国黑人英语的辨识率高于“标准变体”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这与之前大学生英语学习者的研究有所不同，他们对英美“标准变体”的识别率往往大于印度英语和美国黑人英语（如许宏晨、高一虹，2014；陈叙、颜静兰、姜叶飞，2013等）。教材和课外读物的音频材料和日常听力（如VOA，BBC广播）以英美音为主。英美文化的冲击，如英国的影视、戏剧和剑桥考试等和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电视剧、音乐、托福考试等。学生接触英美本族语者变体的机会非常多，却不能区分开来。进一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是由于高中生对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标签”贴反，进一步究其原因，发现学生对标签的概念缺乏敏感度，即使听到英国英语，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英国英语。反映出在英语课堂上，并没有受到对变体意识的引领。印度英语最具差异性，口音特点明显，受试可能并不知道这就是印度英语，而是通过其具有区别于其它英语的明显的语音特征，所以很容易选出来，因此识别率较高。美国黑人英语是接近美国英语，且比较有语音特征的，而且，美国黑人的流行元素如hip-hop及黑人篮球明星等，使受试对这种变体识别力增强。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受试除了对本族语者变体中国英语有一定的标签意识之外，对其它变体的标签是靠区别性语音特征来判断，受试不能掌握英美的区别性语音特征，因此识别率较低。

#### 3.2 对世界英语变体的态度分析

##### 3.2.1 综合维度评价

图一显示了对五种英语变体的总体评价，英国英语 > 美国英语 > 美国黑人英语 > 中国英语 > 印度英语，结果显示高中生更加偏爱内圈英语。高中生对英国英语 (22.70) 总体评价显著高于英语其它变体，我国英语教育曾长期以来将英国英语作为唯一的标准英语 (高一虹、林梦茜, 20)，视听说材料也以此为参照。美国英语 (16.29) 排名其次。对印度英语 (11.26) 评价最低，高中生对印度英语的正确识别率排第二位，得分却最低，也进一步说明受试对世界英语变体的评分不受对该变体的了解程度的影响。学生并不关注语音属于哪种变体，而只关注于声音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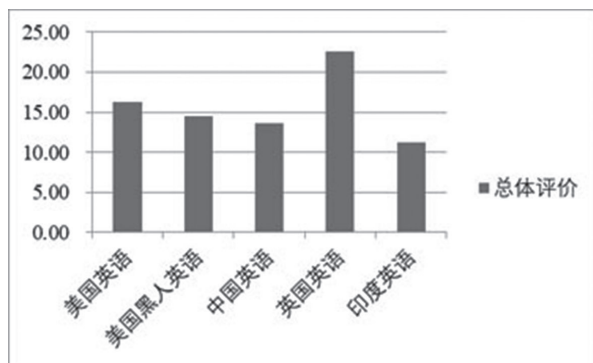


图1 高中生对五种英语变体的总体评价

高中生对世界英语的语言态度总体趋向保守，认同内圈英语变体，尤其认同英国英语变体。对外圈和扩展圈英语变体存在一定的偏见。而在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对美国英语的评价往往高于英国英语 (如高一虹、林梦茜, 2008; 刘毅、邓婷婷, 2013; 许宏晨、高一虹, 2014)，由于高中生英语学习环境的局限性，学生的变体意识模糊。而上大学之后，学习环境多元化，逐渐对英语变体敏感起来。在“中国的美国移民潮”以及“中国拥有着许多来自美国的英语教师” (方帆, 2010) 的背景下，掀起了一股美音热，从而影响着大学生的语言态度逐步向美国英语倾斜。

### 3.2.2 各维度的评价

通过对每个维度的分析，进一步找出受试对每种变体态度差异的原因。首先，在地位维度上，评分高低顺序为：英国英语 > 美国英语 > 中国英语 > 印度英语 > 美国黑人英语。对英国英语 (5.52) 和美国英语 (5.07) 的评价明显高于其他变体，对美国黑人英语 (3.10) 的评价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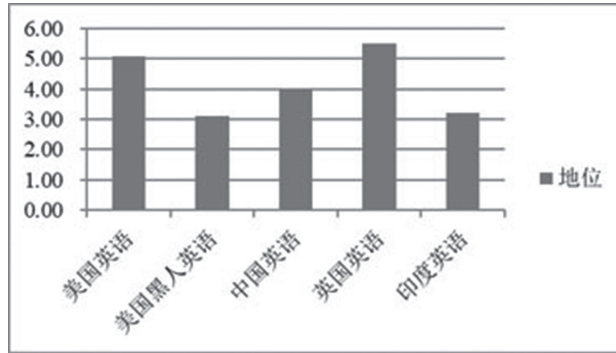


图2 高中生对五种英语变体在地位维度的评价

地位指某种变体的声望或对朗读者在群体中的声望的评价。历史上，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多地扩张殖民地；美国在二战之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强国。语言态度的形成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英美的霸权地位，直接影响着受试在地位维度上的评分。受试对中国英语的评分居中，说明高中生对中国英语的地位认可度一般。同高一虹、林梦茜（2008）；陈叙、颜静兰、姜叶飞（2013）；许宏晨、高一虹（2014）的研究，对印度英语的地位评价普遍都是最低。历史上的“黑人奴隶”贸易，美国黑人受到种族歧视等现象可能导致了高中生对美国黑人英语地位的评价偏低。

在亲和力维度上，评分高低顺序为：英国英语 > 美国黑人英语 > 中国英语 > 美国英语 > 印度英语。英国英语（5.0）评分依然最高，对中国英语（3.73）评分居美国英语和美国黑人英语之后。数据相对平稳，没有明显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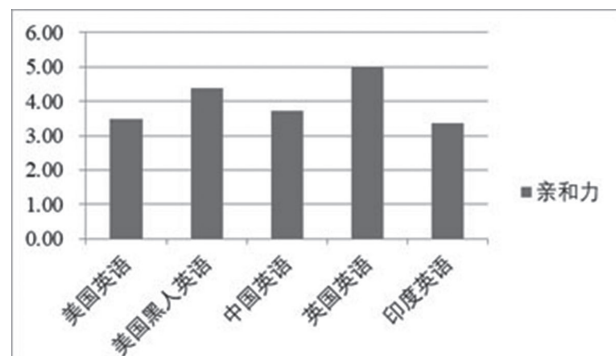


图3 高中生对五种英语变体在亲和力维度的评价

亲和力是指是否愿意亲近和接触朗读者。受试认同英国英语的亲和力，我国外语教

育的教材、教学大纲和教学测试均是以本族语者的使用规范为标准,可见对英国英语的极度认同,而之前研究倾向于认同美国英语的亲合力(如高一虹、林梦茜,2008;许宏晨、高一虹,2014)。美国黑人英语的亲合力高于美国英语,可能是由于美国黑人的热情开朗,会让人觉得很有亲合力。在本研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对本族语变体中国英语评分低于内圈英语,这与刘毅、邓婷婷(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反映出高中生对中国英语的负面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对自身文化不够认同。

在一般能力范畴下,评分高低的顺序为:英国英语>美国英语>美国黑人英语>中国英语>印度英语。高中生对英国英语变体(6.07)非常认可,倾向于认为英国英语更具领导力,自信,精明强干和勇于进取。对印度英语(2.34)评价最低。这与高一虹、林梦茜(2008);陈叙、颜静兰、姜叶飞,(2013);许宏晨、高一虹(2014)研究相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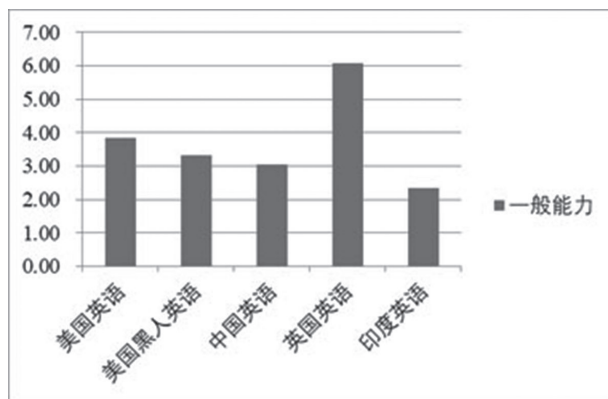


图4 高中生对五种英语变体在一般能力维度的评价

英国英语变体和美国英语变体一直作为英语学习者的典范,学生们主要通过教学材料和外教来接触本族语者英语变体,在课堂之外,却很少有机会接触。这种有限的接触很容易导致高中生对一些英语变体产生偏见。较少的在真实情境下的英语交流体验同样让他们对本土化的中国英语变体评价偏低。因此,他们的评价可能并不是建立在他们的真实体验中,而是建立在社会语言意识形态的导向之上。

在交流能力范畴下,评分高低的顺序为:英国英语>美国英语>美国黑人英语>中国英语>印度英语,英国英语(6.06)评分显著高于其它变体,美国英语(3.90)和美国黑人(3.95)英语评分差距极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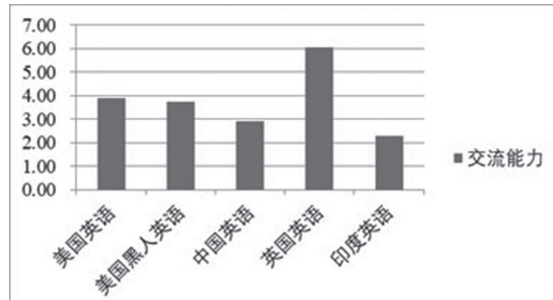


图5 高中生对五种英语变体在交流能力维度上的评价

显然，受试认为内圈英语交流能力更强，对本土英语变体和外圈变体评价较低。我国英语教育一直以来以英美本族语变体为标准，学生会认为只有英美本族语变体才是正确的，任何与之偏差的部分视为不地道甚至是错误的。如果本族语口音是学习的理想类型，他们带有口音的英语就需要纠正，因为它偏离了标准英语的规范（Tokumoto, 2011）。因此很多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会把过多重点放在发音上，而词汇的灵活运用、语法的准确性、句子的结构等也是良好的交流能力的必要条件。过多地关注本族者英语变体，一旦听到来自其它英语变体的语音，就会由于不适应或是心理压力而不能理解对方。

#### 4. 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化和英语使用多元化的背景下，英语初学者的语言态度和跨文化交际意识显得尤为重要。高中生对五种英语变体的总体识别能力有限，对外圈英语和扩展圈英语的识别准确率较高。对世界英语的语言态度总体上趋近保守，相对认同内圈英语，对英国英语在各维度上评分都最高，对外圈和扩展圈评分较低并呈现多元化的态度，对本土英语变体评价高于其它非内圈英语变体。

目前，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仍然以标准英语作参照，学习本族语规范。很多学习者盲目追求英美音，不断模仿英美本族语者的语音语调，以拥有一口流利的英美音为目标，却忽视了应该提升实际的交流能力。在世界英语的背景下，仅将学习本族语变体作为教学目标已不再适用。因为在英语课堂之外的真实交流语境下，接触到更多的是来自外圈和扩展圈的非本族语者英语变体。英语学习者要明确理想的英语使用者要能够在不同的变体之间转换，而不只是简单地加入一个群体。

同样，当前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也将英语本族语规范作为标准来衡量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英语教育者应该意识到学习者对世界英语态度的复杂性，不能把本族语者英语变体

作为唯一学习的对象。将世界英语理论与外语教学结合起来,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尝试将世界英语知识编写于教材中,并应用于课堂教学从而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基于受试对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辨识的混淆,在实际英语教学过程中,语音教学应当增强,学生应当有标准英语意识。不应该让学生只接触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等标准变体,可以适当接触非标准英语变体,增强学生“标签意识”。培养交际的灵活性以适应口音的多样性。在课程设计和英语课堂上,不影响在交流中互相理解的语言学核心特征应作为重点用于课堂教学。文秋芳(2012)曾提出国际语教学框架理论,帮助学生树立“语言是什么”的语言观和建立在语言、文化和语用基础上的教学观。向学生输入英语本族语者变体、非本族语者变体和带有学习者自身语言特征的本土化英语变体和文化背景。期待英语学习者不只是记忆老师上课讲的内容,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内容培养交流能力。

最新版《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版)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意识,世界英语承载的多元世界的信息和认同,对世界英语的认识扩展学生的认识。培养学生具备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包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等跨文化交际能力(文秋芳,2012)。同时,教师不应该把自己对某种英语变体的偏见带入到教学中,要积极创造一些课堂活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语言的学习不仅是学习新的语言形式和功能的过程,更是一个在权力关系、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政策等多因素影响下的过程(Mckenzie, 2010)。詹金斯(Jenkins, 2000)指出如果不促使学习者在语音上努力接近L1口音,会更能传达作为语言使用者的身份认同感。英语变体的多样性折射出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和自身文化独特性。中国英语同样是反映出我们的身份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英语学习者应该意识到包括他们自身变体在内的不同英语变体的价值,从而减少对非标准变体的偏见。英语教学除了工具性目的之外,还应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声音和身份,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意识。

#### 参考文献:

- 陈叙、颜静兰、姜叶飞 2013 上海世博会前后大学生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调查,《语言学研究》第2期, 168-180页。
- 高一虹、林梦茜 2008 大学生奥运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奥运会前的一项主观投射测试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4期, 86-92页。
- 葛传槩 1980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国翻译》第2卷, 1-8页。
- 林梦茜、高一虹 2010 大学生奥运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奥运后的反思,《中国外语教育》第1期, 3-10页。

- 高一虹、许宏晨 2015 英语变体态度研究综述,《外语教学》第 47 卷第 6 期,850-860 页。
- 刘毅、邓婷婷 深圳大运会学生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语言学研究》第 13 期,212-223 页。
- 许宏晨、高一虹 2014 四次大型国际活动前后大学生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外语教学》第 35 卷第 1 期,43-48 页。
- 祝畹瑾 2013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Canagarajah, S. 2006. TESOL at forty: where are the issues? *TESOL Quarterly*, 40: 9–34.
- Deyuan He.& David, Li. 2010. Language attitudes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in the ‘China English’ debate. *World Englishes*, 28(1):70-89.
- Friedrich, P. 2000. English in Brazil: functions and attitudes. *World Englishes*, 19: 215–24.
- Galloway N.& Rose H.2018. Incorporating Global Englishes into the ELT classroom. *ELT Journal*, 72(1):3-14.
- Gardner, R.C.1985. *Social Psychology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 Garrett P. 2010. *Attitudes to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es, H.1970. Evaluative reactions to accents. *Educational Review*, 22: 211-227.
- Görlach, M.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 Englishes’ in M. Görlach,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Heidelberg: Carl Winter.
- Honna, N.2008. *English as a Multicultural Language in Asian Contexts: Issues and Ideas*. Tokyo: Kuroshio Publishers.
- Hymes, D. 1971. The Contribution of Folklore to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4(331):42-50.
- Kachru Braj B. 1982/1992.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ambert. W. , Hodgson. R. Gardner R. & S. Fillenbaum.1960.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1):44-51.
- McArthur, 1987. “The English Languages?” *English Today*, 3(3):9-13.
- Mckenzie, R M. 2010. Social factors and non-native attitudes towards varieties of spoken English: a Japanese cas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8(1):63-88.
- Quirk, R. 1990. Language varieties and standard language, *English Today*, 21: 3–10.
- Schneider E. 2007. *Postcolonial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kumoto, M. & Shibata M. 2011. Asian varieties of English: Attitudes towards pronunciation. *World Englishes*, 30(3):392–408.
- Yoshikawa, H. 2005. Recognition of world Englishes: changes in Chukyo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J]. *World Englishes*, 24(4): 251-360.

- Wang W. 2015. Teach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 China: Investigating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English. *System*, 53:60-72.
- Wei, R. & Su., J. 2012. The statistics of English in China. *English Today*, 28(3), 10-14.
- Wen Q. 2012.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 pedag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1(2):371-376.
- Zheng Y. 2014. A Phantom to kill: the challenges for Chinese learners to use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English Today*, 30(4): 35-40.

##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Attitude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wards World Englishes**

*Zhang Xi Liu Honggang*

**Abstract:** The language attitudes of English learners towards English varieties is a classical issue in sociolinguistics area (Lambert, 1960; Giles, 1970). With the growth of globalization, English learners' attitudes towards world Englishes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eg. Yoshikawa, 2011; Gao & Lin, 2008/2010; Xu & Gao, 2014). While most of the related researche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senior English learners (Hundt, 2015; Tokumoto, 2011; Gao & Lin, 2008/2010), few researches were done about the beginners of English learning. This research uses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ich combined the English teaching reality of senior high school with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used by Gao Yihong and Lin Mengxi (2008/2010) on the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world Englishes.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subjective reaction test, aiming to investigate the second year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N=137) attitudes towards five classical English varieties: American English, British English, Black American English, Indian English and China English. To explore: (1) What wer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world Englishes? (2) What we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anguage attitude towards world Englishes in each dimen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1) the participants' evaluation of inner circle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 English) is higher than the other two circles and their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varieties (higher recognition of Indian English and China English). (2) British English is highly recognized and gains a higher evaluation in each dimension.

**Key words:** World Englishes; language attitud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张茜 东北师范大学; 刘宏刚 东北师范大学)

# 澳门本地大学生性别与语言态度相关性研究

阎 喜

**提 要:** 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以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发现性别对语言态度、语言变异和变化、语言维持和转移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对澳门某高校本地大学生对粤方言、普通话、英语和葡萄牙语的语言态度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澳门本地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对普通话和英语在工具性维度上给予更高的评价,且达到显著水平。

**关键词:** 澳门; 性别; 语言态度

## 1. 引言

澳门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珠江口西岸,北面与广东珠海市接壤,东隔伶仃洋与香港相望,西离珠海市湾仔镇一衣带水。澳门在16世纪中叶成为葡萄牙人的聚居地,并在19世纪中叶沦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1987年中葡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葡联合声明》),规定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澳门半岛,连同凼仔、路环两个岛屿,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诞生。

尽管澳门的面积较小,但是澳门的语言生活较为复杂。许多学者用“三文四语”概括澳门的语言生活(“三文”指的是中文、葡文和英文,“四语”指的是粤方言、普通话、葡萄牙语和英语)。虽然澳门基本上是一个粤方言社会,但是澳门言语社区的多语现象纷繁复杂。从个人层面来看,人们在澳门使用的语言有汉语(包括粤方言、普通话、福建话、客家话、上海话等)、葡萄牙语(以下简称葡语)、英语、日语、韩语、法语等多种语言。从社会层面来看,几百年来澳门言语社区从单语社区演化成双语社区,再到多语社区。与此同时,同一类型的言语社区在澳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而多种类型的言语社区在澳门某一历史阶段并存。总而言之,澳门是一个多语多方言的言语社区。澳门丰富多彩的多语现象为我们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过去三十年见证了澳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起步、发展与繁荣,不少学者从澳门的语言、方言和专名语言,语言接触,语言态度和身份构建,以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多个角度研究澳门社会语言学。

语言态度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人类语言学、话语分析等不同领域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不同社会的语言态度。尽管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语言态度的存在和作用,但是语言态度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而且影响着社会宏观层面和公共政策层面。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澳门本地大学生性别与他们对粤方言、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态度之间的相关性,希望本研究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澳门社会语言学研究。

## 2. 语言与性别研究

语言与性别的关系很早就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从生理、心理、历史、社会和文化等不同的视角分析和解释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语言与性别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热门研究主题,同时也是社会语言学领域中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以往的研究从女性缺陷途径、男性主导途径、男女差异途径以及社会建构途径等多种途径探讨语言与性别的关系(Schilling, 2011: 218-237)。与此同时,学者们从生物学、女性社会地位、社会规范和行为、隐性威望等多个方面来解释性别差异,并提出了各种语言性别差异成因学说(杨永林, 2004: 121-128)以及多种模型(Klann-Delius, 2005: 1564-1581)来解释语言与性别的关系。

性别与语言态度的相关性是语言与性别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研究发现女性不仅在语言学习上比男性表现突出,而且在语言态度上比男性对二语或外语持有更积极的态度。但是,以往有关性别和语言态度相关性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一致的。例如贝克(Baker, 1992)没有发现被调查者的性别与他们对威尔士语态度之间的相关性。克雷默和比伦鲍姆(Kraemer and Birenbaum, 1993)调查以色列343名犹太和阿拉伯学生对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的语言态度,调查结果显示犹太和阿拉伯女生比男生对英语都持有更积极的态度,但是学生的性别与他们对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态度相关性不大。拉德高(Ladegaard, 1998a)调查丹麦一个农村社区里成年人对标准丹麦语及其各种非标准变体的态度,作者从配对变语法的结果发现性别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变量,但是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男性倾向于使用非标准的方言而女性更喜欢说标准丹麦语。在另一项研究中,拉德高(Ladegaard, 1998b)使用配对变语法调查212名不同年龄的人对标准丹麦语、高位哥本哈根语、以及丹麦地区性语言的态度,研究结果显示标准丹麦语和高位哥本哈根语位于威望等级的上层,地区性语言处于中层,而都市语言处于底层,但是拉德高并没有发现性别和语言态度的相关性。

虽然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性别与语言态度的相关性,但是其他一些研究却发现性别



与语言态度的相关性。例如龙慧珠 (Lung, 1997) 综合使用配对变语法、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三种研究方法来调查 103 名香港人对普通话和粤方言的语言态度。参测者来自香港各行各业, 教育背景各不相同, 年龄从 12 岁到 70 岁不等。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对普通话持有更强烈的融合性态度。黎美玲 (Lai, 2007) 使用问卷调查研究香港学生的性别与他们对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的态度之间的相关性, 来自香港 28 所中学的 1048 名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参加问卷调查, 研究结果显示女生比男生对普通话和英语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态度维度上都持有更积极的态度。

### 3. 澳门语言态度研究

澳门语言态度研究在 1999 年澳门回归之前并未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在国际知名语言学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澳门语言态度的研究并不多。曼和黄 (Mann and Wong, 1999) 或许是有关澳门语言态度研究最早的一项研究。他们邀请澳门大学和中学的 72 名师生参加问卷调查和访谈, 研究发现对于各种语言在澳门各个领域的偏好, 粤方言和英语最受参测者的重视, 然后是普通话, 最后是葡语。杨明仪 (Young, 2006) 使用问卷调查澳门某高校大学生 (包括 144 名澳门出生的学生, 197 名内地出生的学生) 的语言态度, 研究发现两组学生都意识到英语对澳门和学生的重要性, 他们在英语学习方面有较强的学习动机, 不觉得使用英语是对他们身份认同的威胁。在另一项研究中, 杨明仪 (Young, 2009) 参照曼和黄 (Mann and Wong, 1999) 的研究对澳门某高校 185 名本地学生的语言态度和语言偏好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粤方言仍然是澳门人首选的社区语言和授课语言, 然后是英语、普通话和葡语。对于回归后澳门语言使用的变化, 大多数学生认为普通话和英语的使用比回归前的使用更加频繁。

过去二十年里的澳门语言态度研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 由于澳门的语言态度研究起步较晚, 直到回归前才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 所以对于后面的研究者来说, 无法了解澳门较早时期的语言态度, 也无法进行历时比较研究。第二, 虽然国际上有关语言态度的研究较早开始注意区分语言态度的不同维度, 但是以往澳门语言态度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澳门人整体的语言态度, 而较少考虑语言态度的不同维度。第三, 以往澳门语言态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澳门人整体的语言态度, 而没有考虑各种社会变量 (例如性别、社会阶级、身份认同等) 与语言态度之间的相关性。贾尔斯和库普兰 (Giles and Coupland, 1991: 104) 指出同一群体内的不同成员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是存在差异的, 所以研究者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个言语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变量与语言态度之间的相关性, 以便更好地了解该言语社区语言态度的复杂性。有鉴于此, 本研究在研究设计中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借鉴国际语言态度研究成果, 注意区分语言态度的不同维度。

参照以往语言态度研究,本研究使用加德纳和兰伯特(Gardner and Lambert, 1959, 1972)的两个态度维度:工具性维度和融合性维度。工具性维度强调语言学习的实用性,而融合性维度指的是个人对言语社区在情感上的认同。第二,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澳门人的整体语言态度,本研究重点分析参测者的性别与他们的语言态度之间的相关性。

## 4. 研究设计

### 4.1 研究问题

如上文所述,龙慧珠(Lung, 1997)和黎美玲(Lai, 2007)的研究发现香港女性面对后殖民时期香港社会语言格局的变化对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和英语(香港的前殖民语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种正式语文)持有更积极的态度。澳门回归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上升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种威望语言。与此同时,葡语(澳门的前殖民语言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种正式语文)在澳门仍然是一种权力语言。面对澳门正在变化的社会语言格局,我们的研究假设是澳门女生比男生对普通话和葡语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态度维度上持有更积极的态度。

### 4.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澳门高校学生。学校是各种语言变体使用者接触最重要的地方,而且大学生可以比较成熟地思考他们周边社会政治的变化和他们的经历。本研究的大学生是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以后出生的,他们经历了澳门回归以及回归前后澳门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社会语言格局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能够对澳门社会的各种语言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本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具有标准化程度高、评分统一客观,可以大规模进行、调查范围广泛,简单易行、经济高效,匿名性强、真实客观等优势。本研究的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获取学生的基本信息,例如性别、语言使用、语言能力等,而第二部分搜集学生对粤方言、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语言态度。本研究旨在调查研究澳门大学生语言态度和他们的性别之间的相关性,基于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可以较为有效地搜集数据并进行量化研究。与问卷调查相比,其他研究方法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例如,一方面,由于澳门人的葡语水平较低,本研究不适合使用配对变语法;另一方面,由于访谈法和话语分析法的参与者较少,较难从访谈和话语分析中抽象概括出学生性别与语言态度之间的相关性。综合多方面的考虑,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研究澳门大学生的性别与他们的语言态度之间的相关性。

### 4.3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流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准备阶段;(2)先导研究;(3)正式问卷调查。

在准备阶段，我们首先回顾以往语言态度研究文献，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本研究语言态度的维度以及相关问题。

在第一次先导研究前，我们参照黎美玲（Lai, 2002）的研究在语言态度测量方面设计了 32 个问题。与彭宁顿和余国强（Pennington and Yue, 1994）和海兰（Hyland, 1997）的研究相似，我们使用 4 点李克特量表（4 代表强烈同意，1 代表强烈不同意）。第一次先导研究是在 2011 年 10 月进行的。在澳门大学几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向澳门大学学生发出 180 份问卷，收回 115 份。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一道有关学生是否在澳门接受了中学教育的问题，并把选择肯定回答的学生视为澳门本地学生，所以最后我们共收到 98 份有效问卷。通过对这 98 份问卷的初步分析，我们发现有关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融合性维度的信度较低。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我们对问卷进行了修改。首先，修改后的问卷使用 6 点李克特量表而不是 4 点李克特量表以便更有效地发现学生对不同语言的态度差异。第二，修改后的问卷删除了询问学生对不同语言说话者的印象是否傲慢的问题，这是因为该问题直接影响问卷的信度，而且不大适合澳门语境。第三，修改后的问卷增设一个题目询问学生在澳门接受中学教育的具体时间，取消原来只是询问学生是否在澳门接受过中学教育的题目，我们想通过学生在澳门接受中学教育的具体时间来更有效地确定澳门本地大学生。

第二次先导研究是在 2012 年 1 月澳门大学某位教师的课堂上进行的，共收到 37 份问卷，其中有 34 份是由澳门本地大学生填写的。这次问卷信度较高，学生在四种语言的融合性维度上的信度都在 0.6 以上，在英语和葡语的工具性维度上的信度都在 0.7 以上，但是在粤方言和普通话的工具性维度上的信度偏低。我们对问卷里的几个题目重新进行修改，使这些题目保持一致并便于进行对比。此外，我们注意到学生对有关在澳门接受中学教育的时间这一问题的回答较为混乱，这可能是由于学生对澳门中学教育的理解有较大差异，所以我们另外增设一个题目询问学生在澳门生活的时间。

第三次先导研究是在 2012 年 8 月底进行的。在征得澳门大学几位老师的同意后，我们在这几位老师的课堂上发放 165 份问卷，学生自愿填写问卷，这样共收回 143 份问卷。我们以在澳门接受 6 年以上中学教育和在澳门生活超过 17 年为标准判断澳门本地大学生，最终 103 名学生被认定为澳门本地大学生。第三次先导研究的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在对四种语言的融合性和工具性维度上的信度都较高。经过三次先导性测试，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确定澳门本地大学生对粤方言、普通话、英语和葡语在融合性和工具性维度上各与 3 至 4 个问卷问题紧密相连。

正式问卷调查是在 2012 年 9 月和 10 月进行的。澳门大学 2012 ~ 2013 学年的大一新生参与本次调查。根据澳门大学注册处提供的数据，2012 ~ 2013 学年共有 1530 名

大一新生注册,其中有1174名大学生是澳门本地大学生(持有澳门身份证),平均年龄为19岁。由于所有的澳门新生都需要接受通识教育,其中包括英语教育,而且他们已经在2012年4月21日参加英语定级测试,并根据他们的成绩被分成五个等级,由澳门大学英语中心负责第1~4级学生的英语教学,英语系负责第5级学生的英语教学,所以本次调查通过英语中心和英语系授课老师向学生发放问卷,学生自愿填写问卷,最终收回407份有效问卷。由于本次调查主要关注的是澳门本地大学生的语言态度,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两道问题(即学生在澳门接受中学教育的时间和学生在澳门生活的时间)以便帮助判定参测者是否是澳门本地学生,但是我们在之前的先导研究中发现学生对于澳门中学教育的理解差异较大,而且学生在澳门生活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学生在澳门接受中学教育的时间,所以最终我们只以学生在澳门生活的时间为标准,并以六年为限,把在澳门生活超过六年(含六年)的学生认定为本地学生。根据这一标准,132份问卷被剔除,我们获得275份有效问卷。由于两名学生没有填写性别,所以最终得到273份有效问卷(92名男生,181名女生)。

## 5. 研究结果

表1展示了澳门本地男女大学生对粤方言、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本问卷采用6点量表,6代表强烈同意,1代表强烈不同意。6点量表的中间值3.5设为标准,3.5以上表示正面评分,3.5以下表示负面评分。从表1可以看出,男女大学生对粤方言表现了最强的融合性情感,其次是英语。他们对英语在工具性维度上的评价最高,其次是粤方言。普通话和葡语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维度上的评价得分分别位于第三位和第四位。男大学生对粤方言、英语和普通话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维度上的评价为正面的,但是对葡语在两个维度上的评价是负面的。女大学生对粤方言、英语和普通话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维度上给予正面的评价,但是对葡语的融合性情感略显负面。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对粤方言和普通话持有更积极的融合性情感,而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对粤方言和普通话的工具性评价更高。此外,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对英语和葡语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维度上持有更积极的态度。通过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澳门本地男女大学生在对英语和普通话的工具性评价上达到显著水平。

本研究发现澳门本地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对普通话和英语的工具性评价存在差异,且达到显著水平。本研究有关澳门女大学生对普通话更积极的工具性评价的假设得以支持,但是对于她们对普通话更积极的融合性情感和对葡语在融合性和工具性两个维度上更高评价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

表1 澳门本地男女大学生语言态度

因素(维度)	男生		女生		显著水平
	平均值	标准方差	平均值	标准方差	
粤语(融合性)	4.5098 ↑	0.93371	4.2807 ↓	0.94923	.059
普通话(融合性)	3.6680 ↑	0.80796	3.6639 ↓	0.89456	.970
英语(融合性)	3.9705 ↓	0.84130	3.9837 ↑	0.88485	.906
葡语(融合性)	3.4411 ↓	0.83311	3.4445 ↑	0.93340	.976
粤语(工具性)	4.1955 ↓	0.88170	4.2775 ↑	0.77185	.430
普通话(工具性)	3.9593 ↓	0.78921	4.1879 ↑	0.85471	.033*
英语(工具性)	4.9050 ↓	0.87677	5.1250 ↑	0.74126	.030*
葡语(工具性)	3.4914 ↓	0.84457	3.7120 ↑	0.95905	.063

注释: ↑ 代表相同因素中最高, ↓ 代表相同因素中最低。

\*p < 0.05

## 6. 讨论

过去社会语言学研究(例如 Labov, 1966; Trudgill, 1974)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有威望的语言变式。在性别和语言态度相关性研究中,龙慧珠(Lung, 1997)发现香港女性比男性对普通话持有更积极的态度,而黎美玲(Lai, 2007)的问卷调查也发现香港女生对英语和普通话比男生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在本研究中,澳门本地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对普通话和英语在工具性维度上评价更高,且存在显著差异。

英语在澳门的行政、经济、教育和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使用,是澳门社会的一种公共交际用语,在澳门享有事实上的正式语文的地位。例如,英语是澳门幼儿园到高中的科目之一,也是不少学校课程的授课语言。英语是澳门高校入学考试规定科目之一和澳门一些高校(例如澳门大学)主要的授课语言。此外,澳门公私雇主都较为重视员工的英语水平,英语水平也是澳门本地报纸上招聘广告中对求职人员语言水平的基本要求之一。目前英语水平已经成为澳门许多行业对应聘人员的基本要求。

在澳门回归以后,普通话在澳门的经济,尤其是旅游业和博彩业中广泛使用,也是澳门社会的一种公共交际用语。澳门公私雇主都较为重视员工的普通话水平,澳门本地报纸的招聘广告也把普通话水平作为求职人员语言能力的基本要求之一。目前普通话水平已经成为澳门许多行业对应聘人员的基本要求。此外,普通话是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高校的主要授课语言,对于想去中国内地和台湾求学深造的澳门学生而言,较高的普通话水平成为他们去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求学的优势。

英语和普通话都是澳门的交际语,英语是澳门第一种交际面广泛的语言,而普通话

是世界各地华人在澳门交际时使用的交际语。在本研究中,澳门本地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对普通话和英语在工具性维度上评价更高,且具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女生对英语和普通话对她们的的重要性更加敏感。本研究结果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社会语言学研究(Bilaniuk, 2003; Labov, 1966; Trudgill, 1974)的结果一致,都发现女性对有威望的语言或语言变式持有更积极的态度。

## 7. 结语

本文通过对澳门某高校本地大学生对粤方言、普通话、英语和葡语的语言态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澳门本地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对普通话和英语在工具性维度上给予更高的评价,且达到显著水平。本文尝试从语言威望的角度解释澳门男女大学生语言态度的差异,认为澳门女大学生对英语和普通话对她们的的重要性更加敏感。

需要指出的是,问卷调查具有成本低、速度快、操作方便、覆盖面广、数据易于分析等多个优势,但是问卷调查采集到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无法发现深层次的原因。今后的研究需要使用访谈法和话语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分析澳门男女大学生语言态度差异背后的原因。其次,在研究语言和性别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孤立研究性别,还应该考虑性别和其他社会变量例如社会阶级、文化认同等交互影响。第三,澳门语言态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研究澳门的语言态度,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加强语言态度研究的模式和理论构建。为了描述一个地区的语言态度,解释相关的研究结果和预测未来的语言态度变化趋势,过去的语言态度研究提出不少语言态度研究的模式和理论,澳门语言态度研究为我们应用和检验这些模式和理论的实用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 附注:

1. 金项目:2017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澳门语言态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FJ2017B119)和2017年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术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澳门语言传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ZYG001710)

## 参考文献:

- 杨永林 2004 《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Baker, C. 1992. Attitudes and Languag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ilaniuk, L. 2003. Gender, language attitude, and language status in Ukraine. *Language in Society*, 32(1): 47-78.
- Gardner, R. C. & Lambert, W. E. 1959. Motivation variabl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nadian*

-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4): 266-272.
- Gardner, R. C. & Lambert, W. E.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Giles, H. & Coupland, N. 1991. *Language: Contexts and Consequenc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yland, K. 1997. Language attitudes at the handover: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in 1997 Hong Kong. *English World-Wide*, 18(2): 191-210.
- Klann-Delius, G. 2005. Gender and language. In Ammon, U., Dittmar, N., Mattheier, K. and Trudgill P. (eds.), *Sociolinguis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pp. 1564-1582).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Kraemer, R. & Birenbaum, M. 1993. Language attitudes and social group memb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7(4): 437-449.
-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degaard, H. J. 1998a. Boys, girls, language and identity: Language attitudes and linguistic behaviour in a rural community in Denma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8(1): 3-25.
- Ladegaard, H. J. 1998b. Assessing national stereotypes in language attitude studies: The case of class-consciousness in Denmark.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9(3): 182-198.
- Lai, M.-L. 2002.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e First Post-colonial Generation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Issues in Gender, Medium of Instruction, Social Class and Cultural Ident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urham: University of Durham.
- Lai, M.-L. 2007. Gender and language attitudes — A case of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4(2): 83-116.
- Lung, W.-C. 1997. Language attitudes and sex-based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in Hong Kong. *Linguistische Berichte*, 171: 396-414.
- Mann, C. & Wong, G. 1999.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A survey from Macao on it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3(1): 17-36.
- Pennington, M. C. & Yue, F. 1994. English and Chinese in Hong Kong: Pre-1997 language attitudes. *World Englishes*, 13(1): 1-20.
- Schilling, N. 2011. Languag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R. Mesthrie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pp. 218-2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udgill, P. 1974.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8年第2期)

Young, M.-Y. C. 2006. Macao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A post-1999 survey. *World Englishes*, 25(3-4): 479-490.

Young, M.-Y. C. 2009.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Maca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6(4): 412-425.

## **A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cao tertiary students' gender and their language attitudes**

*Yan X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gender is a hot research area in sociolinguistics. Previous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find that gender has certain influences on language attitudes,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as well as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This study employs questionnaires to investigate Macao local tertiary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Cantonese, Putonghua, English and Portugues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emale students evaluate Putonghua and Englis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along the instrumental dimension than males.

**Key words:** Macao; gender; language attitudes

( 阎喜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



# 詈语使用的性别差异样本分析

## ——以英雄联盟游戏主播为例

许 婷

**提 要：**本文以样本分析为研究方法，以社会语言学中语言与性别的关系为研究视角，选取了四位在其直播时段具有一定人气的英雄联盟（League of Legends, LOL）游戏主播（2男2女），录制并转写了时长各为一小时的直播视频，通过分析发现了他们之间在使用詈语上存在相似性和差异。虽然总体上样本中的男女主播都会以主题类似的非指向性詈语表达情绪，但在具体使用上存在不同的倾向，如频度、偏好类型等。

**关键词：**詈语使用；社会语言学；性别差异

### 1. 引语

所谓詈语，指的是“表达说话者感情状态的一种禁忌语”（尉万传，2016）。这一定义与英语中的 swear words 颇有相似之处。同时，这一定义也展现出禁忌语和詈语的关联和区别，即相似之处在于二者皆有禁忌语的特点，但詈语用以表达感情状态。詈语作为一种禁忌语、一种语言现象，在国内外都受到学者的关注。在国内，研究涉及禁忌语和骂詈语的并不算很多，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此类语言并不文雅，难登大雅之堂。国内关于詈语或禁忌语的研究，多见于文学作品、文化中。在研究中，桑哲（桑哲，2017）重点研究了文学经典《三国演义》中骂詈语的类型、特色和接受。他将他的研究成果和文学史、历史联系起来，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体现了骂詈语的文化魅力。在文化方面，骂詈语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符号，在不同民族、不同方言甚至在宗教中都有其特点。相关的研究涉及了少数民族语言如摩梭语（袁焱与许瑞娟，2013）、彭州方言（杨绍林，2011）以及宗教中的詈语（疏志强，2002）。跨文化、跨语言地研究詈语也是近年研究詈语的一种趋势（相关的研究见薄淑艳，2010；黄宏，2010；孙毅与陈雯，2014；尉万传，2016）。对于单个的骂詈词的发展演变如“王八”，也已有学者做了相关的研究（陈卫恒，2010）。骂詈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经历着变迁，如张谊生（张谊生，2010）就对骂詈语的词汇化、标记化和构式进行了探讨，并在其

文章中阐述了一些攻击性较强的詈语的叹词化现象。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对骂詈语的认识,对骂詈语的本身解读、文化因素以及语言使用的跨文化比较进行了一定的深化,也说明了骂詈语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以性别差异为出发点对骂詈语的使用进行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多。在国外,关于使用詈语性别差异的研究比较丰富,这些研究分别对使用詈语性别差异的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如态度、频度、强度、针对对象、使用原因等,这一现象在胡剑波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到(胡剑波,2008)。国外对詈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中,且研究对象多为以英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的人。本文拟以中文中的非指向性詈语为研究材料,以网络主播为研究对象,采取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不同性别的主播在游戏语境下的詈语使用情况,并希望能回答以下问题:

- (1) 在直播中,四位网络游戏主播使用的詈语有什么特征?
- (2) 不同性别的四位网络游戏主播使用的詈语有什么差异?
- (3)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性别网络游戏主播之间显现的差异?

## 2. 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了拥有较多受众的网络游戏——英雄联盟(LOL)作为直播情境,这款游戏自上线以来就具有较多的玩家,观看游戏直播的人数可能比较多,因而主播与观众的互动就可能较多。经过观察,作者选取了在其直播时段具有一定人气的四位LOL游戏主播,男女各两人,录制了平均时长为一小时的直播视频,大致上包含两局游戏的直播内容。在视频录制好后,作者将视频内主播说的所有话转写为中文文本,其中有一个案例包含了能听到的对话,因此加入了与主播通话的参与者的说话内容。在转写过程中,主播短时间内重复的话的内容也按照原本的样子转写出来,转写的文本根据意群进行断句。转写后,四位主播的视频说话内容大体概况如下:

表1 样本的基本信息

视频 编号	性别	说话内容类型	大致字数统计
1	男	同性谈话和异性谈话(共包含3人)	11460
2	男	仅一人说话	6789
3	女	仅一人说话	6561
4	女	仅一人说话	8138

## 3. 案例分析

### 3.1 词的层面: 詈语及使用分析

从转写的文本来看，在所选取的四位主播中，只有编号 1 的男性主播在所录制的视频中并没有使用詈语，其余主播均使用了詈语。使用的詈语从主题上可分为两类：家庭和性。在所选取的 4 个样本中，使用詈语的样本（2、3、4）均包含了这两类詈语，且在詈语相关的主题上发现两种詈语均被使用，且男性在二者中更偏向于“家庭”相关的詈语，而女性在这两种詈语中的使用偏好性较弱。

此外，通过观察样本可以看出，使用詈语的主播在使用时既包含指向性较强的詈语（以其带有一定的攻击性，这里称为詈骂语），也包含非指向性詈语，其中非指向性詈语所占的比重较大。

表 2 样本中非指向性詈语使用情况

性别	性相关的詈语	家庭相关的詈语	总数
男	19 (40.4%)	28 (59.6%)	47
女	16 (47.1%)	18 (52.9%)	34

据上表的内容可以看出，在使用的频度上，样本中使用非指向性詈语的男性使用频度要高于女性。此外，在具体的詈语表现形式上，女性的语言相较之下更多样。

### 3.2 语义层面：使用意义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非指向性詈语，这类詈语主要和情绪表达相关。通过观察视频和转写文本，笔者发现，这类詈语在出现时主要表达了惊讶、激动或愤怒的情绪，在表达的情绪类型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使用上，这些詈语可能出现在句中的任意位置，主要作为插入语、副词、叹词的功用出现。以下是文本中的几个例子：

- (1) 我操差一点，算了算了。（叹词）
- (2) 跑了跑了跑了，舔一下，妈的，好烦。（插入语）
- (3) 你他妈有种，我走了我走了。（副词）

上述三个例子取自样本 2，类似的例子在样本 3、4 中也能找到。这些詈语在不同程度上对表达的意义和表达的语气进行了强化，使得说话人的情绪更加鲜明。具体表现为惊讶、激动、焦急，甚至是生气。文本中的非指向性詈语几乎都与情绪有关，其中偏向激动和焦急这两种情绪的詈语出现比例较大。这和游戏中紧张的气氛有关。事实上，在詈语出现时往往带有不止一种情绪，因而很难将情绪清晰地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说某类情绪的倾向性更大。

在性别差异上，女性使用的詈语多以名词性的詈语为主，使用詈语如“妈呀”“妈的”多出现在句首，而男性则更倾向于使用语气较强的主谓短语如“我操”。究其原因，

这种差异的出现可能是因为男性倾向于表现得更强势，而女性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会使用类似的语言，但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因此使用的骂语语气较弱，即使使用语气强的骂语，比例也相对较小。

### 3.3 语用层面：使用对象及语境分析

观看这类游戏直播的观众可能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其中主要为玩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的人，而不同的观众对于主播类型的喜好可能不同。观众的需求可能也会对主播的语言使用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四个样本都录自英雄联盟的游戏主播，他们所处的语境大致上相同——游戏语境。游戏语境下的主播需要一边对游戏进行讲解，一边看观众发的弹幕和观众互动，从转写的文本中也可以发现他们在交流时会存在重复的现象，即一个字、词语，甚至是句子的重复。在这样的语境下使用骂语和游戏直播相对轻松的环境是相适应的。

在骂语使用上，较短的骂语可能会重复三遍，或者将不同类型的骂语词连起来使用，以进一步强化语气和表达情绪。在这种现象上，样本中使用骂语的男性主播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女主播则相对较少。

从使用对象给予的反馈上来看，对女性主播使用骂语时可能遇到观众在弹幕中提醒的现象，如有的观众会在弹幕上让女主播不要说脏话，而反观男性主播，这类提醒却很少见到。这从侧面说明了，观众对于女主播文明用语的期望值要高于对男性主播的，他们希望作为公众人物的女性能够文明用语，以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

### 3.4 社会交际层面：使用策略分析

从转写成的文本整体而言，骂语的使用在各个样本的全文中比例较少。在使用策略上，样本2男性主播使用骂语更倾向于展示自己的气势，对游戏对手的蔑视，以及在游戏中激动的情绪。而样本中的女性主播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女性主播使用骂语也会展现出情绪的起伏，但样本3中的女性主播在直播中使用骂语体现了她性格的随性不拘束。她在直播中表示自己是一个随和的人，只要观众对其使用的骂语不涉及家人就可以接受。样本4的女主播使用骂语较少，可能存在避免使用的倾向。

表3 样本非指向性骂语使用情况

样本编号	1	2	3	4
使用骂语的次数	0	47	24	10
语气较强的骂语占比	0	40.4%	37.5%	20%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使用非指向性骂语上样本2的男主播要远高于样本3、4的

两位女主播。其中包含了语气较强的詈语，在这里特指带有“操”“我操”的詈语及其变体“我勒个擦”，这类非指向性詈语在文本中出现频繁。根据表3第三行的数据可以得知，男性使用这类语气较强的詈语更多。但就比重来看，样本3的女主播使用的比例和样本2男主播近似，意味着该女主播也有较多地使用语气较强的詈语的倾向，而样本4的女主播则在频度和比重上都偏低。这可能是由于样本2的男主播需要构建自己的强势地位，而样本3的女主播也不甘受社会期望约束，也通过詈语的使用展现自己的强势地位。样本4的女主播则倾向于选择顺从社会对女性使用语言的期望，较少地使用了詈语。

这类非指向性詈语中最常见的“我操”，有两种较为常见的使用习惯：

- (1) “我操”+事件；或者事件+“我操”
- (2) {……，“我操”，……}事件叙述

第一种是将“我操”放在一个事件叙述的开头或者结尾，来表达一种可能包含态度和评价的情绪，第二种则是将“我操”作为一个插入语使用，功能和第一种类似。从样本的情况来看，使用该詈语的主播都更倾向于把“我操”放在句首（男性：17次中有10次；女性：10次中有7次）。

文本中另一个出现频率高的詈语为“妈的/他妈的/妈”。这类詈语主要出现在句首和句中。使用该詈语的主播中，相比男性，女性更倾向于将其放在句首（男性：28次中有两次在句首；女性：18次中有9次在句首）。这类词放在句首的作用类似“我操”，但语气相对较弱，而放在句中时，除了作为插入语，也可能是副词用来加强所修饰词的意义，因此有以下三种：

- (1) “妈的/他妈的/妈”+事件；
- (2) {……，“妈的/他妈的/妈”，……。}事件叙述
- (3) “妈的/他妈的/妈”+形容词或副词

通过对比文本中这两个最典型的詈语，在同样的条件下，男性倾向于把“我操”放在句首，而女性倾向于把“妈的/他妈的/妈”放在句首，这样的情况说明了该男性更倾向于建立语言上的强势地位，从情绪变化时下意识的转向“我”（自己）就可以看出，而女性在情绪变化时下意识的转向“妈/他妈”（他人）：将“自己”放在句首和将“他人”放在句首，暗含着“重要性”上的不同体现，将“自己”放在句首更具有“主人”的意味。

#### 4. 讨论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詈语在四个样本中总体所占的比例较小，说明不具有指

向性的谥语虽然攻击性没有指向性谥语强,但仍然不在公众人物如游戏主播的偏好语言之列。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崇尚“雅”的文化传统有关。因此这些主播的行为总体上可看作是顺应社会主流的。但即便如此,非指向性谥语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诚如韩礼德(Halliday, 1985)所言,语言的使用是一种选择,那么选择使用或者不使用某种语言自然有其影响因素。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发现,人们会使用语言进行他们在社会中的身份构建(Wardhaugh, 1998)。

样本1中的男性主播在整个录制的约一小时的视频中均未使用谥语,这可能是出于一种正面形象的身份构建,也是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一种顺从。而样本2中的男性主播相比于样本1的主播则使用了较多的谥语,包含了具有指向性和不具有指向性的谥语,这可能是该主播为了展现自己的强势与个性,也可能仅仅是习惯。这一现象说明,即便总体上,男性相比女性而言更为强势,使用谥语这类具有一定冒犯性的语言也并非绝对。是否使用谥语,可能取决于说话者在自身的社会经验中,以及在类似的语境中形成的观念、态度和用语习惯。而在这些语境中,说话对象、社交距离以及一系列其他的因素都可能对语言的使用产生影响,例如一个人长期听到周围的人说某种语言,则可能潜移默化形成类似的用语习惯。而对于某一谥语的冒犯性可能说话人和听话人本来就有着不同的判断。

样本3的女性主播使用谥语是出于自己的性格外向,这说明一个人的性格(如内向型和外向型)可能对一个人的用语习惯产生影响,但性格这一概念太过于模糊,往往很难找到一些准确的切分点,也许是某一方面的特征更显著,因此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样本4的女性在直播过程中使用较少的非指向性谥语,这一现象和样本1类似,可能是为了在观众心目中构建更好的形象。这两位女主播使用谥语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自己和观众的社交距离,优化了互动的气氛。从传统观念上来看,男性使用谥语的可能性更大,女主播使用谥语也可能是想要和观众中比重较大的男性观众建立一种同群体联系(in-group relations)。

对比样本中男性主播和女性主播,可以发现相同之处在于使用谥语往往都因为情绪的变化,且使用的谥语主题类似,而有男性更偏向于家庭主题的谥语,可能是性相关的谥语在无指向性的情况下给人的冒犯性更大。而该男性使用谥语更多,其中语气更强的谥语多则可能是是因为需要展现自己的个性及强势,这和传统研究中构建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现象一致。两位女主播使用非指向性谥语的语言更多样,且倾向于把家庭相关的谥语放在句首,说明她们使用谥语更加委婉,而比样本2男性在谥语使用时更倾向于和观众社交氛围的构建。根据分析笔者发现,样本2男性使用谥语时更具有“主人”的意味,但这并不代表笔者提倡女性使用这类语气强的谥语来构建自己的“主人”

地位。对于詈语的使用需要辩证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样本的观察中，笔者发现在观众中对于男性使用詈语的容忍度可能要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大众对女性文明使用语言的期待值更高。观众的需求和期待会影响主播的语言甚至是行为，那么这个观众的期待到底是什么样？这些需求的影响有多大，又是如何影响着主播语言行为的呢？关于人们在网络上使用詈语，国外已有学者做了研究，发现詈语的使用在政治新闻的评价中可以促进人们参与政治生活（Kwon& Cho, 2015）。而在中国，观看直播的观众使用詈语，特别是指向性詈语也已是普遍现象。那这种现象又是怎么形成，对于网络环境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去解决，因为网络直播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已然不容忽视，同时一些攻击性较强的詈语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此外，方言也可能对詈语使用产生影响。在直播中笔者观察到，在主播与观众互动时可能会带入一些方言，甚至是方言中的詈语，方言的使用可能暗示着社交距离的拉近，那么方言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使用标准语言（如普通话），又进一步以詈语的形式出现，也是值得思考的。

## 5. 结论

本文以非指向性詈语为研究材料，以样本分析为研究方法，通过比较两男两女四名游戏主播的视频，发现他们使用的詈语主要为非指向性詈语，而主题主要有两类：家庭和性。在使用詈语时，样本中总体而言男性使用的频度更高，且语气更强，而女性则相对频度更低，语气更弱。在使用的目的和策略上，男性更倾向于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和强势，而女性则更倾向于缩减和观众的社交距离，以此构建更好的交流环境。这些差异正说明了一个人是否使用詈语，与其在社会经验中形成的对詈语的观念、态度和用语习惯有关，也会受到语境中说话对象、社交距离等的影响。由于是样本分析样本较少，因此本研究看到的个体差异多于普遍代表性。关于直播中观众对主播的用语看法和期望，人们在网上詈语的使用的成因及影响，以及方言对詈语使用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薄淑艳. 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对比汉英禁忌语语用差异 [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357-359.
- [2] 陈卫恒. 从文献资料看詈语“王八”的形成过程——兼与杨琳先生商榷 [J]. 中国文化研究，2010（4）：102-112.
- [3] 黄宏. 英汉禁忌语的语用比较与语用失误研究 [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388-390.

- [4] 胡剑波. 英语詈语使用中的性别差异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7): 76-79.
- [5] 桑哲. 《三国演义》骂詈语的类型、特色和接受 [J]. 明清小说研究, 2017(4): 82-96.
- [6] 疏志强. 浅析禅宗骂詈语 [J]. 修辞学习, 2002(1): 9-10.
- [7] 孙毅, 陈雯. 中西方禁忌语的隐喻: 转喻双向度耦合述略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4(7): 97-102.
- [8] 杨绍林. 四川彭州方言中的禁忌语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2): 181-185.
- [9] 尉万传. 跨文化视阈中的汉英詈语对比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24): 5-9.
- [10] 袁焱, 许瑞娟. 永宁摩梭詈语的文化阐释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0): 32-36.
- [11] 张谊生. 试论骂詈语的词汇化、标记化与构式化——兼论演化中的骂詈语在当代汉语中的表达功用 [J]. 当代修辞学, 2010(4): 1-13.
- [12]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13] Kwon, K. H., & Cho, D. (2017). Swearing Effects on Citizen-to-Citizen Commenting Online: A Large-Scale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Versus Nonpolitical Online News Site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5, 84-102.
- [14] Wardhaugh, R.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3rd ed.). Britai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A Sample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Using Swear Words ——A Case Study of Hosts in Livestreams of the League of Legends**

*Xu 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a case-study method and analyz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and language in sociolinguistics. In this study, four hosts (two men and two women) who are relatively popular during their live period are chosen and they play the game League of Legends in their livestreams. The recording is one hour in average and transcribed into text in



Chinese. Data analysis shows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found among them in using swear words. In general,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group tend to use swear words with similar themes to express emotions, but they tend to show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frequency, type preferences, etc.

**Key words:** using of swear words; sociolinguistics; gender differences

(许婷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 京张两地城市语言景观的状况、问题及建议

## ——以北京市延庆区和张家口市区的公示语景观为例

王帅臣

**提 要：**以北京市延庆区和张家口市区主要干道的公示语景观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状况和语言多模态两个角度加以分析，了解两地基本状况，发现公示语在拼音运用和外文翻译两方面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依据实地调查和相关研究，提出吸收以往经验成果，依法做好公示语标写工作和转变认识，扩大宣传，全面提升语言服务水平的建议，并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拼音转写”的标牌标写基本策略，以及“拼音转写和外语译写”结合的补充策略。

**关键词：**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基本策略；补充策略

### 1. 引言

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Landry, R. & R. Bourhis 1997）。公示语是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吕和发 2005）。可见，公示语景观是城市语言景观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人们的日常出行，也是城市对外开放和交往的窗口之一。因此，公示语景观成为观察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视角，从中可以实时鲜活地反映出语言与城市经济、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关系。

北京、张家口（以下简称京张，但范围上指延庆区和张家口市区）两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但是现实发展水平又存在差距。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尤其是 2022 年冬奥会的临近，这对协调两地发展、展示国家形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主办方的公示语景观，是奥运会语言服务的内容之一，能够体现城市语言文字管理的状况和水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人文环境和文化建设。笔者 2018 年 2 月对北京市延庆区、张家口市区的公示语景观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两地不同程度存在未按国家法律法规、各类规范进行标写等问题，未能有效达成设置公示语的目的，需要

进一步规范、完善。

## 2. 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的总体状况

公示语景观分布在各类公共场所，如交通轨道、旅游景区、公园商场等，范围广泛，形式多样，旨在通过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等为民众提供各种必需信息。此类公示语是各级城市管理部门自上而下设立的，能够代表官方立场、体现法律政策。本文意在从对外交往、城市管理的角度了解公示语景观的状况，因而选取了京张两地具有代表性的繁华交通主干道作为考察范围。所选干道包括北京市延庆区（以下称延庆）的东外大街、妫水北街、东街，张家口市区（以下称张家口）的胜利北街、五一大街、解放路、东安大街、宣化路、滨河中路。同时选择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部分景区，如延庆的古崖居景区<sup>①</sup>，张家口的张家口堡景区和大境门景区。所选区域是本地人，尤其是外来人（含外国人）都会去的地方，其公示语景观状况可以最大程度反映出本地语言景观的特点。在统计时，依据一个表意完整的标牌算一个分析单位的原则，复合标牌按其组成部分分别加以计算，如道路导引牌上的每一个地点算一个单位。如内容重复，只算一次。先后共收集延庆公示语 292 条，张家口公示语 262 条，以此作为本文分析讨论的基础。此外，相关章节也参考他人相关研究，一并讨论。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的总体状况主要围绕语言状况、多模态状况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反映两地城市语言景观的特征。

### 2.1 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的语言状况

根据在公共场所出现地点的不同，公示语景观可以分为公共交通和旅游景区两类。每类景观又按其功能分为几小类。其中公共交通类包括在公共交通场所中起标示道路和具体地点、起到提示等各类服务作用的公示语景观。具体包括标示街、道、路、巷的路标、公交车站的站牌和显示公交线路的公交线路牌的公示语（以下简称“路标语”），指引道路和具体地点的导引牌公示语（以下简称“导引语”）、以及公共场所提示、警示、乃至宣传等服务的标牌公示语（以下简称“服务语”）。旅游景区类包括景区景点的标示牌、指引线路的导引牌公示语（因标示和导引标牌数量较少，且一致性较强，故合在一起统计分析，以下简称“景区名称语”），也包括起到提示、提供注意事项、服务，以及解说的标牌（以下简称“景区服务语”）。京张两地各类标牌的语主要用汉字、汉语拼音（以下简称拼音）、外文等。下面从语言情况对两类公示语景观及其小类进行穷尽分析。

#### 2.1.1 公共交通类公示语景观的语言状况

经实地调查，京张两地公共交通类公示语景观的情况为：延庆 205 条，张家口 165 条。现将两地公示语景观中的汉字、拼音、外文等进行分类（表 1）。

表1 京张两地公共交通类公示语景观的语言状况

公示语景观	地点	纯汉字	汉字+拼音	汉字+外文	汉字+拼音+外文
路标语	延庆 88	10	69	3	6
	张家口 55	28	16	3	8
导引语	延庆 67	3	2	14	48
	张家口 25	2	2	2	19
服务语	延庆 50	23	1	25	1
	张家口 85	51	1	31	2

备注：地点后数字为该类公示语的总数量，其余数字表示各类公示语景观的数量。延庆汉字+外文类公示语中有两条为汉字+朝鲜文（韩文）。公示语中还有纯外文一类，因其包含在导引牌中，依照统计原则，数量上不做统计，但在分析时列出，见下文。

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中的语言多以汉字为最常见的形式，汉字的辅助形式拼音次之，英语再次之、朝鲜文（韩文）最少，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主体倾向性和多元化特点。公示语景观的语言基本组合形式有五种，即纯汉字型、汉字+拼音型、汉字+外文型、汉字+拼音+外文型、纯外文型。

#### 2.1.1.1 纯汉字型

即公示语景观只用汉字书写。如延庆的“严禁吸烟”“创明文城区 办百姓实事迎世界盛会”“参与垃圾分类 建设绿色延庆”等，张家口的“福安街”“粮库”“出站口”“谨慎驾驶千趟少 大意行车一回多”等。此类公示语景观在京张两地的路标语和服务语中所占比重较大。相比之下，张家口所占比重更为突出，约为50%~60%。

王克非、叶洪（2016）曾在2016年对北京东城区的王府井商业街、海淀区的学院路和朝阳区的三里屯三个地段的标牌进行语言种类调查，得到纯汉字标牌比重平均为29.2%。尽管该文统计标牌的范围和本文不太一样，还包括门牌、店牌和店牌旁的宣传广告等。但是相比之下，京张两地的服务语、张家口的路标语纯汉字比重略高一些，这从侧面反映出京张两地，尤其是张家口，在对外开放、国际交往、以及提供语言服务等方面与北京主城区还有一定差距。

#### 2.1.1.2 汉字+拼音型

即公示语景观采用汉字和拼音的形式书写，一般汉字在上，拼音在下。汉语拼音是中国地名罗马字书写的标准，用拼音标写街、道、路、巷等地名符合要求。如延庆的公交站牌、公交线路牌等（分析见下节）。此类型在延庆的路标语中所占比重最大，张家口比重极少。在单一罗马化转写方面延庆做得较好，这与在北京主城区举办过奥运会、

加之延庆本地多也次举行大型会议等有一定关系。因为语言环境建设是大会前期必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 2.1.1.3 汉字 + 外文型

即公示语景观采用汉字和外文书写。书写形式也是一般汉字在上，外文在下。如延庆的“小心地滑 (CAUTION WET FLOOR)”“公共汽车站 (Bus Stop)”“无障碍 (Wheelchair Accessible)”等，张家口的“停车车位 (Lots Available)”“车场入口 (CAR ENTRANCE)”“注意台阶 (Mind Your Step)”等。此类型在京张两地服务语中所占比重最大，体现了其服务外国人出行、提供语言帮助的设置初衷。

#### 2.1.1.4 汉字 + 拼音 + 外文型

即公示语景观采用汉字、拼音和外文（主要为英文）三者结合的形式书写。一般是汉字单独成行，拼音和外文在下成行排列。如延庆的路牌“妫水北街 (Guishui North St)”、导引牌“庆园街 (QINGYUAN St)”等。张家口导引牌“建国路 (JIANGUO Rd)”“钻石路 (ZUANSHI Rd)”“建设东街 (JIANSHE ST (E))”等。此类型书写形式与 2.1.1.3 类不同之处在于，其拼音基本为地名，而 2.1.1.3 类多是服务语的外文翻译。此类在京张两地导引语中所占比重最大。

#### 2.1.1.5 纯外文型

此类型只在延庆发现一例，即西环城路 (W. Ring Rd)。在张家口未发现。

2.1.1.3 ~ 2.1.1.5 都涉及到外文，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从中可以看出，外语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用英语表达的，只有极个别是朝鲜文（韩文），说明京张两地在服务牌、导引牌中，外语语种的倾向性极其明显，即英语在外语中占主导语言的地位。这既与英语在世界的地位一致，也与我国外语教育中英语独大的局面契合。但是从双语标牌的比重来看，延庆导引语比重最大，约为 92.5%；其次为服务语约为 52%，路标语约为 10.2%，双语标牌平均比重约为 47.3%。张家口也是导引语比重最大，约占 84%，其次服务语约占 38.8%，路标语约占 20%，双语标牌平均比重约占 39.4%。两者相比，延庆双语标牌比重更大。比重数值之间的差距，侧面反映了两地实际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不同。但是这一差距不是太大，这可能与张家口近几年为扩大开放，抓住迎接冬奥会、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契机，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活动有关，其中也包括改善语言环境的措施。

标牌的双语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和交往程度。王克非、叶洪（2016）曾对北京三个地段的双语标牌（外语 + 汉语拼音）进行调查统计，其中双语路牌为 100%，双语警示牌为 53.7%，三地双语（含多语）标牌平均占比为 58.8%。赵蓉晖（2011）曾对上海市内交通的信息导向系统，以及市内公共服务、娱乐、商务设

施的导向系统等进行调查分析,统计时把双语、多语和纯外语形式合为外语信息,最后得到外语信息比重在以上两种场合各占61.6%、65.8%。赵文的统计范围略大于本文。但是从以上基于实地调查的分析数据中,仍可以大致归纳出作为一线开放城市北京、上海的标牌双语化率约为60%左右。如果以此作为国内城市开放程度的一个参考数值的话,京张两地的开放程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具体来看,王克非等统计的路牌、警示牌与本文交通类公示语中的路牌、服务牌大体一致,京张两地导引牌双语率和北京主城区相差不多。但是京张两地其余双语标牌均低于北京主城区和上海。可见,除了导引牌之外,京张两地平均双语化比重还是偏低的。各地的导引牌双语比重之所以一致性强,主要在于这些城市的导引牌都采用了“专名拼音,通名意译”的方式。以上的对比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京张两地本土化倾向稍强,在提升奥运语言服务、与国际接轨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

## 2.2 旅游景区类公示语景观的语言状况

京张两地旅游景区类公示语景观的语言状况,和公共交通类有所不同,即单一化倾向较为明显。具体情况为:延庆景区名称语30条,景区服务语57条;张家口景区名称语62条,景区服务语35条。旅游景区类公示语景观的语言状况分为四类,即纯汉字型,如延庆题写在岩石上的景区名称“古崖居”,张家口大境门上题写的“大好河山”;汉字+拼音型,如张家口的“大境门(Dajingmen)”“西境门(Xijingmen)”;汉字+外文型,如延庆的“请勿跨越(No crossing)”、张家口的“爱护花草 从我做起(Love Flowers and Plants Begin from Me)”;汉字+拼音+外文型,如延庆的“古崖居景区(Guyaju Area)”“前山景区(Qianshan Scenic Spot)”等,张家口的“堡子里街道办事处(BUZILI SUB-DISTRICT OFFICE)”“关岳庙(Guan-Yue Temple)”等。从四种类型的分布来看,除去延庆古崖居景区的两条朝鲜文(韩文)服务语外,如果考虑到地名也是拼音书写的话,那么汉字+拼音+外文型和汉字+外文型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从双语标牌的比重来看,延庆景区名称语约为86.8%,景区服务语约为96.7%,平均比重约为90.4%,张家口景区名称语约占84%,景区服务语约占88.6%,平均比重约占85.9%。两地相差不大,延庆双语化略高于张家口。对比公共交通类来说,两地景区的各类标牌双语化都比较高。这与景区主要接待外来人(含外国人)有关。加之景区的双语化名称语、服务语比重较大,这两方面的标牌书写,在服务管理等方面都有较为严格的标准。发展旅游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一般重视程度也比较高。

## 2.2 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的多模态状况

多模态指超出传统的语言之外,还会和其他诸如文字、图形、数字、声音、动作、环境等共同传达意义的情况。当今的图像传媒特征使得多模态成为研究语言景观的一

个新视角。多模态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本文把多模态为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陈松 2017），非语言模态主要是图形、符号、数字等。各种模态都具备表达意义的潜势，在信息传递的语境下，作为书面语的语言模态以及其他模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同时存在同时操作，这种互动本身就产生意义（胡壮麟 2007）。由于上文对公示语中的语言种类有所涉及，本节语言模态主要考察公示语的结构形式和汉字状况，非语言模态主要涉及出现的图形、箭头、数字等。

### 2.2.1 公示语景观的结构形式

公示语景观多有标示地点、提供服务的功能。其中交通类公示语多标示、指示地名，服务类公示语多有提示、警示、宣传等作用。从结构形式上看，标示具体个体特征的专名和表示地名类别或特征的通名，通过各种排列而成地名，从而实现一地一名、清晰明了。服务类公示语多通过词语、短语、句子等不同语法单位，达成种种服务目的。下面将公示语中公共交通类的路牌、导引牌和旅游景区类的景区名称类合为一类，称为名称类，将公共交通类和旅游景区类中的服务语合为一类，称为服务类，以便考察每类公示语的特征。

#### 2.2.1.1 名称类公示语的结构状况

专名+通名型 即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完整表达、标示地名。如延庆的“高塔路”“庆源街”“会展广场”“八达岭”“延庆站”“延庆图书馆”等，张家口市的“宣化路”“福安街”“容宸广场”“通桥”“忠厚里”“张家口堡”“大境门”等。此类型形式所占比重较大。传统地名和最新的公共设施多采用此种形式，有较强的生命力，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认知习惯和心理预期。

专名型，即地名标识语只通过专名构成，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划分出通名的地名。如延庆的“大榆树”，张家口自身作为地名。此类型地名历史上多为小地名，沿袭成俗，随着发展逐渐成为区域名称。如“张家口”因明代守备在张家堡北城墙开了一个小门，门小如口，加之为守备名张珍，故名“张家口”，从而沿袭下来，成为地区专名，反而使原来的发源地张家堡（今张家口堡，当地人也叫堡子里）仅仅成为一个景区名。

多个专名或通名型，即打破专名、通名常规搭配，重复出现专名、通名的组合。如延庆的“妫水北街南”，就是专名+通名+专名组合；张家口市的“马路街社区”，就是专名+通名+通名组合。此类地名多为新兴地名，多为公交站点或机构地址，是为了适应公共交通、邮政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方便人们指称而出现的细化名称。

从名称类公示语景观的结构形式，可以窥见不同的历史信息。专名型多体现该地最初的历史发展，所占比重不大。专名+通名型是一个地区发展起来之后，按此模式，不断扩充发展，成为最常采用的命名法。多个专名或通名型一般是后来新兴的地名，能反

映该地区近期发展状况。

### 2.2.1.2 服务类公示语景观的结构状况

词语型 即公示语以词语为形式和载体,内容以宣传为多。如两地都有关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如“平等”“公平”“友善”“粮食”等。

短语型 即公示语以短语为形式和载体,内容以提示、禁止为多。如延庆的“小心滑倒”、“爱护文物”等,张家口的“请爱护花草”“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等。

句子型 即公示语用单句、对偶句、排比句等形式表达发出号召、提醒注意等目的。如延庆的“节水高荣 节水高尚”等;如张家口的“消防通道 禁止停车”,“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等。

词语型多以潜移默化的宣传影响为目的,短语型、句子型多能提供服务、提示警示。服务语中双语化比重约占一半,可能体现了城市管理部门在服务、宣传方面兼顾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一种考虑。

### 2.2.1.3 公示语景观的汉字状况

公示语景观的字形基本上为现代规范的简化汉字,但是极个别由于各种原因,有篆书或是繁体。如两地的“新华书店”店名,延庆路边的“延庆文明”栏目,多与文化单位、文化行为有关。但是也有极个别不规范现象的遗存,如张家口堡景区中“鼓楼北予”地名中的“予”,是二简字,应该更换。此外公示语景观的字体基本上是宋体,但是小部分服务语也用行楷、行书、黑体的,非宋体部分多集中在服务语。这与宣传传统文化有关,也体现了服务语有相对灵活的表达手段。

### 2.2.2 公示语景观的非语言模态状况

京张两地公示语的非语言模态以图形为主,符号(含箭头)为辅,极少量有数字。延庆公示语中有图形的85条,有符号(含箭头)的56条,有数字的1条;张家口公示语中有图形的62条,有符号(含箭头)的22条,有数字的1条。就多模态的分布而言,两地主要集中在服务语,其次为导引语。延庆在导引类公示语中也有较大比重分布,而张家口则没有。这主要原因是延庆有许多路口导引牌,每个地点、机构的导引都有图形,而张家口路口导引牌较少,且不使用图形。就比重而言,延庆图形出现在标牌中的比重约为29.1%,符号约为19.2%,平均比重约为48.3%;张家口图形出现在标牌中的比重约为23.7%,符号约为8.4%,平均比重约为32.1%。相比之下,延庆公示语的非语言模态运用比重略高一点。数字出现在公共厕所导引牌中,数量较少。

通过调查,发现两地公示语都有相当比重的非语言模态配合语言模态。两者结合,非语言模态能够起到补充作用,从而将公示语的意义传达给不同语言背景的受众。

选择不同城市具有代表性区域的公示语景观,可以发现各自特点和城市间的差异。



从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中，可以看出两地在各方面都有一些差异。两地已经开始朝着国际化方向迈进，但是整体水平尚待提高，总体上延庆略好于张家口，张家口势头强劲。从公示语景观中的语言来说，服务语种略显单一；从多模态来看，公示语景观的多模态已经初现，但是比重和种类都尚不丰富。京张两地作为冬奥会的联合举办地，在公示语方面尚需要进一步协调整合，实现统一规范。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在语言服务方面仍大有可为。

### 3. 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的不规范状况

管理机构的不一致，所依据的标准也并不完全相同<sup>[7]</sup>，加之各城市管理部门意识强弱不同，社会经济发展也有所差异，导致公示语景观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拼音标写和外文翻译两个方面。

#### 3.1 拼音问题

##### 3.1.1 拼写问题

京张两地交通类公示语景观中，街、道、路、巷等路标语地名存在拼音拼写的问题。一是作为地名标识，未能进行正确的单一罗马化转写，混淆了地名转写和翻译的界限。如延庆的“东外大街（DONGWAI St）”，“DONGWAI”属于汉语地名的罗马化转写，而“St”则是英文的罗马化转写，两套转写系统出现在一个路牌中，由此带来的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一地两名或一地多名。如同一地名在同一或不同类型的标牌上而出现多种不同形式。如延庆的“东外大街”导引牌上，就出现了“DONGWAI St”和“DONGWAIDA JIE”、“DONGWAI DAJIE”三种标写形式。张家口的“清河桥”在导引牌上有“QINGHE-QIAO”和“QINGHE BRIDGE”两种形式。“大街”作为通名，在导引牌上也出现了两种形式，如“盛华大街 SHENGHUADA ST”、“五一大街 WUYI ST”。同一地名，在路牌和导引牌上也存在不一致，如张家口的通桥，在路牌上是“TONGQIAO”，在导引牌上则成了“TONG BRIDGE”。宣化路在路牌上是“XUANHUA LU”，在导引牌上是“XUANHUA RD”。

二是地名转写时，没有按照规范进行分词连写，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分词时没有按照规范进行词语划分。这体现为等距分词标写，如延庆的公交站牌“川北小区南门”转写为“CHUAN BEI XIAO QU NAN MEN”。或体现为在公交线路起始站和终点站，也是等距分写，没有划分出词语。类似的还有公交 Y22 “上虎叫村——延庆南菜园总站”拼音为“SHANG HU JIAO CUN” “YAN QING NAN CAI YUAN ZONG ZHAN”；公交 Y20 的“康西草原—延庆火车站北广场”拼音为“KANG XI CAO YUAN” “YAN QING HUO CHE ZHAN BEI GUANG CHANG”；公交 Y32 “延庆南菜园一千家店”

的拼音为“YAN QING NAN CAI YUAN”“QIAN JIA DIAN”。或体现为有的公交没有按照词语分写,但是外加括号,如公交Y5“延庆火车站北广场—丁家堡”拼音为“(YAN QING HUO CHE ZHAN BEI GUANG CHANG)”“(DING JIA BU)”。公交Y29“延庆火车站北广场—南天门”的拼音为“(YAN QING HUO CHE ZHAN BEI GUANG CHANG)”“(NAN TIAN MEN)”。或体现为只有部分按照分词连写规则,如公交925“长陵—延庆南菜园”拼音为“CHANG LING”“YANQING NANCAIYUAN”。张家口景区内的某些地名如“玉皇阁”,拼音为“YUHUANGGE”,没有分词连写。也有部分公交线路的站点未分写,而是全大写连在了一起。如公交Y33“延庆火车站北广场—康庄小区”拼音为YANQINGHUOCHEN-ZHAN BEIGUANGCHAN、“KANGZHUANG XIAO QU”。张家口地名转写较为规范,如“东安大街”拼写为“DONGAN DAJIE”,符合分词连写规则。但是在公交系统中,只有个别的公交站点有拼音转写,但是没有很好贯彻分词连写,也是等距小写字母拼写。其余大多数公交线路站点则没有拼音,没有进行转写,只有汉字,也就涉及不到拼音拼写问题。此外,导引牌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分写、连写不一致,“清水桥”拼音连写为“QINGSHUIQIAO”,“解放桥”拼音分写为“JIEFANG QIAO”,有的分词转写时出现分词错误,如“忠厚里”写成了“ZHONG HOULI”。

### 3.1.2 注音问题

拼音的基本功能是注音。在两地个别服务语中有注音,都是等距排列书写。如延庆的“高压危险”拼音为“GAO YA WEI XIAN”,“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拼音为“SHE HUI ZHU YI HE XIN JIA ZHI GUAN”。张家口的“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拼音为“jin zhi xiang wei cheng nian ren chu shou xiang yan”。这几条服务语应该按照《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要求进行分词连写。

关于“堡”的注音问题。京张两地有一些带“堡”字的地名。如延庆Y05公交有“丁家堡”这一站,但是出现了“BAO、BU”两种注音形式,这可能体现了延庆在普通语音和本地音之间的徘徊矛盾心理,其实这两个音都是普通话读音,只是意义略有不同。《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中就以“堡”字的三种读音为例进行说明。在这方面,延庆可以学习一下北京主城区的做法,主城区“马家堡地铁站”的注音就是“MAJIAPU”(PU是堡的另外一个普通话读音)。相比之下,张家口在景区张家口堡中的“堡”注音为“bu”(未标调),含义为有城墙的村镇,而没有使用更为广泛的读音bǎo。这体现了当地对张家口历史发展历史的一种尊敬,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理性构建,当然也是符合普通话读音的。

此外,拼音在注音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如大小写问题。如延庆公交站牌、

线路的注音，都是大写。京张两地导引牌上的地名绝大多数也是大写，但是张家口大境门景区则有“Dajingmen”和“DAJINGMEN”两种形式。个别拼音字母出现混用，如延庆导引牌上的“绿韵公园”中的“绿韵”的拼音为“Lvyun”，用v代替替，这是不符合拼音使用规范的。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标牌更换不及时的现象。如延庆导引牌上的地点许多仍是延庆县某某地，而延庆2015年11月已经撤县设区，可见并未及时更新公示语。张家口有五一大街和五一路，但张家口市政府2006年就发布过主城区主干街路标准名称的公告，其中就有五一路更名为五一大街的内容，而标牌没有实现完全替换。标牌的滞后性可能造成有效指示信息不足，信息更新频率不高等问题。

### 3.2 翻译问题

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的翻译问题主要表现在翻译不一致、翻译不准确、翻译不规范、翻译不正确等方面。

翻译不一致是指是否翻译、如何翻译等问题不一致的情况。同是具体地名，京张两地就不一样。延庆是“专名音译，通名英译”，张家口则完全是拼音。通名“路”，两地翻译后写为“RD、ROAD”。同是通名“街”，翻译后延庆写作“STREET、St”，张家口写作“STREET、ST”。导引牌上的“南街”，如在“明德南街”中写成“MINGDENAN ST”，其他的翻译成“ST(S)”。延庆“古崖居景区”的名称出现了四种形式：“古崖居 Guyaju (Ancient Cliff-Dwelling Site)” “Guyaju” “GUYAJU (ANCIENT CLIFF HOUSE)” “古崖居遗址 Ancient Cliff Dwellings”，古崖居的核心景点“奚王府”有“Xi Palace” “Residence of the Chief Tribe”两种形式，龙庆峡也有“LONGQING -XIA” “Longqing GORGE”两种形式。张家口堡内的同一景点，也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如“关帝庙”译成“Guan Di Miao”和“Guandi Temple”，同理“玉皇阁”译成“YUHUANGGE”和“The Jade Emperor Pavilion”。同一地名“鼓楼北街”译成“Gulou North Street” “GULOUBEI JIE”。同样的情况还有鼓楼南街、鼓楼西街等。同是景区内的“北关街社区”译成“BEIGUAN JIE STREET COMMUNITY”，“鼓楼西街社区”则译成“GULOU WEST STREET COMMUNITY”，两者通名的翻译并不一致。

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可以说最能从细节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管理。京张两地将卫生间称作“公共卫生间”。延庆出现了“Public Toilet” “WC” “Public Restroom”三种形式，张家口也有“Public Toilet” “WC”两种形式。两地男厕所写成“men /male”、女厕所写成“women/ female”。其实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市将公厕的标志WC全部换成了Toilet，并给出了男女厕所的规范译法，即男厕所为“Gents/Men”，女厕所为“Ladies/Women”。方位词的翻译也存在不一致情况，延庆将方位词译为英

文全拼单词,如 North,而张家口则用缩写,南一般译作 S,并以(S)形式标在最后,如德胜南街 DESHENG ST(S)、明德北路 MINGDE RD(N)。但是上段中提的“北关街社区”和“鼓楼西街社区”中的方位词处理又不一样。此外还存在个别导引牌上的地名和实际地名不一致的现象,如延庆导引牌上的“延庆县第三幼儿园”写作“Yanqing No.3 Kindergarten”,而实际则是“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幼儿园”,写作“Beijing Yanqing No.3 Nursery School”。

翻译不准确主要涉及一些文化词语。如延庆古崖居中有一处景点叫“龙爪石”,译作“dragon's claw stone”,张家口大境门有一处景点叫“卧龙亭”,译作“Wolong Pavilion”。“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与西方的龙完全不一样,在翻译界也多有争议。我们认为中国龙在西方文化中是空缺的,可以采用“比较通行的做法是音译或直译,初次出现时进行意译或加注<sup>[8]</sup>,或是将其翻译为“Loong”(黄佶 2018)。如果想要强化景区公示语文化内涵、或是翻译具有文化内涵的景区景点,也可以采用这种做法。

翻译不规范指只从字面去理解,未遵从规范的翻译原则,容易造成误解。如张家口堡中的“马道底街 10 号”译成了“At the end of Street Road No.10”。马道底街因在城墙马道底下而得名,可见底街是下面街道的意思,并不是街道的末尾。张家口市中心的公示语“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下河嬉水、游泳、捕鱼、滑冰”,翻译成“For the security in your life, please do not paddle, swim, fish and skate in the river.”。此处的 security 如换成 safety,则更显规范准确。因为 security 主要指公共安全, safety 则指个人安全。公示语“小心地滑(carefully floor)”应该翻译成“CAUTION! Wet Floor”。根据《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指南》<sup>②</sup>推荐的规范译法,张家口堡景区里的“爱护文物(Cherish Historical Relics)”应该译成“Please Show Respect for Historic Site”。两地的“请勿吸烟(No Smoking)”,应该译成“Thank You for Not Smoking”。

此外,还有一些翻译存在错误。如张家口堡景区中的“商店”标牌上写成“Shopping 写,其实直接译成“Shop”就可以了。张家口导引牌上“五一广场”的译文为“WUYI SQUAR(E)”,应该是 SQUARE 的误写。

此外,还有一些翻译存在错误。如张家口堡景区中的“商店”标牌上写成“牌上写成一些翻译存,其实直接译成“其实直接译就可以了。张家口导引牌上“五一广场”的译文为“译文为。张家口导引牌(E)”,应该是 SQUARE 的误写。

#### 4. 京张两地公示语景观的建设

##### 4.1 吸收以往经验成果,依法做好公示语标写工作

作为城市语言景观的公示语,其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及差异鲜明的反映了制定者或

管理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京张两地在导引牌上的一致，而在路牌上的不一致，这就反映了两地管理者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其反映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倾向性是有差异的。地名标识的单一罗马化问题，有人从依据的法律法规方面进行了阐释，提出应该严格遵守法律和国际、国内标准化要求，用汉语拼音标写（郭建中 2005）。另一方面，高芳（2013）从地名译名单一罗马化的原则与限度的视角，指出我国地名都应尽可能地使用汉语拼音代替外语翻译，但同时指出现阶段并非所有地名都适合采用汉语拼音形式，我国地名的单一罗马化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推广；郭风岚、吴江菊（2015）从标准化和分级、分层、分类的管理原则出发，提出“汉字+全拼写”为标准格式，用于标写所有地名标识语；“汉字+全拼写+括注英释”为标准补充格式，为方便外国游人，主要用于标写部分地点类标识语。我们认为，公示语的标写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相关规定为准，这既是贯彻国家法律和语言政策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章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2017年12月1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该标准是第一项针对外语使用的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在第1部分“通则”中指出，“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应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和地名管理法规的规定。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台、站、港、场，以及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企业事业单位等名称，根据对外交流和服务的需要，可以用英文对其含义予以解释。地名标志应执行GB17733。”在国家法律和国家标准指导下，公共服务领域的公示语景观，应该坚持单一罗马化原则，并根据公共场所对外交流和服务的需要，可以实现拼音和外文译写的有机结合。

设置双语公示语景观的目的是要方便外国人的出行，展示中国的好客之道。但只有立足外国人的实际语言服务需求，公示语才能实现其有效性。从现有的调查来看，郭风岚等对37个国家的160名在京外国人进行调查，其中绝大多数（74.38%）的人更喜欢“拼写+英译”形式，也有超过一半的人喜欢依此形式设计的标识（郭风岚、吴江菊 2015）。此外，北京外国使馆的地址书写多使用全拼音地名（王克非、叶洪 2015）。加之考虑与一些大型的对外地图、导航系统等接轨，服务不懂外语的游客等因素，我们以郭风岚、吴江菊（2015）的标牌标写设计为基础，提出“拼音转写”的标牌标写的基本策略，以及“拼音转写和外语译写”相结合的补充策略。在具体公示语标写上，立足受众阅读、接受习惯，调整以前地名全部大写的做法，注意字母大小写和分写连写规定。具体如下：

基本策略:

适用于路牌 / 导引牌 / 公交站点牌

妫水北街 Guishui Beijie

五一大街 Wuyi Dajie

适用于公交线路牌:

Y05 丁家堡—延庆火车站北广场

Dingjiabu Yanqing Huochezhan  
-Beiguangchang

补充思路: 在对外交流和服务需要时, 加入外文翻译(以英语为例)。包括以下情况:  
路牌 / 导引牌:

妫水北街 Guishui Beijie

Guishui Street

五一大街 Wuyi Dajie

Wuyi Road

此外, 涉及到名胜古迹、旅游名胜等及有文化内涵的景区景点应该加入翻译。如“凤凰岭”景区, 可以写成 Fenghuang Ling (Phoenix Moutain)。

再如, 在以地名作为站名时, 而附近又临近旅游区、地铁等, 可以在站牌、线路牌上附加外文翻译。以专 16 公交的终点站“凤凰岭”为例, 可以写成, 凤凰岭 Fenghuang Ling (Moutain)。

交通线路也应加入相应的翻译, 以北京为例。一些专字头、特字头、临字头、区间车、运通车除了在路线牌上要有拼音外, 这些车辆的特征, 如“专、特、临、区间、运通”等应该有拼音和翻译, 如不便翻译, 也可以只有拼音。

线路牌: 专 16 地铁北安河站—凤凰岭

Zhuan 16 Ditie Bei'anhe Zhan Fenghuang Ling

Zhuan16 Metro Station Fenghuang Moutain/ Phoenix Moutain

#### 4.2 转变认识, 扩大宣传, 全面提升语言服务水平

京张两地双语公示语景观中的主导语言是英语, 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强烈愿望。但是外语使用已进入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使用最多的是英语, 这是事实。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日语、韩语, 还有日益增加的俄语、法语等。可见, 国际化并不等同于英语化。要想和国际接轨, 只有走标准化之路。标准化才是国际化的基础。从京张两地来看, 我们接轨国际的意识, 基本上是与英语接轨, 在其他语种方面还很不足。在这方面

我们要转变以前的认识。因为标准既是国内标准，也是国际标准。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及系列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尤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讨论(李琴美 2016)，多限于学术界与管理部门，这就形成专家之间，专家、管理机构、教育部门和大众之间存在认识上的差异。许多人都认识拼音就是注音的，怎么拼写却关注不多，更很少有人关注分词连写规则等。其中，拼音“拼写普通话”的功能尚未充分而有效地发挥，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很不够(李卫红 2013)，相关的宣传普及工作就更少了。汉语拼音正词法等相关内容应该成为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教育的内容。只有加强宣传，才能逐步提升城市管理部门、民众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法治意识，形成专家支撑、政府作为、民众参与的良好互动局面。

语言服务要细化、要有针对性。公示语景观不论单语双语，在内容上要结合时代发展，如增加环境保护的内容，增加当地特色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形式上，要注意标牌上以图文为代表的多模态设计研究。毋庸置疑，多模态不仅包含诸如视觉的文字、图像、符号等，甚至还包括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方面的内容。它能更大程度地传递信息，而信息的接受者也更能通过多种模态“解析”出需要的信息，可以适当弥补语言文字在传达信息方面的某些不足。

语言服务要规范化。近年国内公示语景观的标准化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双语公示语翻译标准化工作，其间既发表了各种报告，又制定了规范，也出版了词典、手册等，初步建设了公示语翻译语料库(吕和发等 2015)，又制定了公共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的国家标准，这些都可以为语言服务的规范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总之，公示语景观设立在各类公共场所，与本地人、外来人(含外国人)都有密切关系。只有在国家法律、法规、规范的指导之下，实现科学、规范、有效地标写公示语，才能服务大众。京张两地联合举办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促进两地协调发展的契机。这对加快两地语言文字工作的法治化、地名标准化、翻译规范化、认识科学化，实现城市公示语景观的健康发展等有着重要作用。两地应该抓住机遇，做好语言服务，进而提升城市的人文环境。

附注：

- ① 因延庆在城区内没有景区，又考虑到和同类张家口景区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因此并未选择其他更为著名的景区，而是选择了不在城区的古崖居风景区。
- ②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指南》是根据《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编写的，并提供公示语推荐译文。

参考文献:

- [1] 吕和发.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05, (1).
- [2] 王克非, 叶洪. 都市多语景观—北京的多语生态考察与分析 [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16, (1).
- [3] 赵蓉晖. 上海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中外语使用情况调查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4月12日第003版.
- [4] 陈松. 多模态视域下北京市核心区语言景观研究 [D].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7.
- [5] 胡壮麟.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 (1).
- [6] 田飞洋, 张维佳.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 语言景观研究的新理论—以北京市学院路双语公示语为例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4, (2).
- [7] 王克非, 王颖冲. 论中国特色文化词汇的翻译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 (6).
- [8] 黄佶. dragon 还是 loong: “龙”的翻译与国家形象传播 [J]. 秘书, 2018, (2).
- [9] 郭建中. 再谈街道名称的书写法 [J]. 中国翻译, 2005, (6).
- [10] 高芳. 中国地名译名单—罗马化的原则与限度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 (1).
- [11] 郭凤岚, 吴江菊. 北京市城区地名标识语标写存在的问题及规制途径 [J]. 城市问题, 2015, (6).
- [12] 李琴美. 地铁站名的罗马化转写规范探析—以深圳、广州、北京、上海为例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2).
- [13] 李卫红. 依法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更大作用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 (11).
- [14] 吕和发, 任林静, 邹彦群. 公示语外译国家标准有效实施的整合方略研究 [J]. 标准科学, 2015, (10).
- [15] Landry, R. & R. Bourhis.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 The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 A Case Study of the Public Signs in Yanqing District and Zhangjiakou City

*Wang Shuaich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ublic signs of the main road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multimodality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to investigate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Yanqing District and Zhangjiakou Cit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public signs in using Pinyin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s and related research, two proposals are



京张两地城市语言景观的状况、问题及建议——以北京市延庆区和张家口市区的公示语景观为例

put forward, that is, doing the work of the public signs mak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anguage law,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language service in an all-round wa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wo corresponding design strategies of public signs, that is, to use Pinyin translation as the standard strategy, and to use “Pinyin plus translation” as the supplementary one.

**Key words:** Jingzhang area;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public signs; standard strategy; supplementary strategy

(王帅臣 北京语言大学)

# 澳大利亚华裔的中文母语保持和身份认同： 历史与现状

沈椿萱 姜文英

## 1. 引言

在我六岁那年的一天，学校里有个孩子冲着我喊“Ching Chong Chinaman, Born in a jar, Christened in a teapot, ha ha ha（中国佬，中国佬，瓦罐里出生茶壶里养，哈哈）”。我听完压根不知他所谓何意，却从其表情里依稀感觉到了嫌恶。

我回家问妈妈，“妈妈，我不是中国人，对不对？”妈妈极其严肃地看着我，然后说道，“你的确是中国人”。

那一刻，从她生冷的语气中，我仿佛听到了一个可怕的诅咒。我感觉已无法从妈妈那里得到一丝慰藉，于是转向比我大四岁的哥哥，在我看来，他对这个世界的经验比我多得多。然而，他也答道，“你最好习惯这个事实”。

（Yang, 1996, p.65 cited by Ang, 2001, p.37）

这是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和教授洪美恩（Ien Ang，亦译伊恩·昂）引用于她的学术著作《论不说中文：生活在亚洲与西方之间（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中的一个真实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那个六岁的孩子——是第三代澳大利亚华裔。一百多年前，他的先辈从中国南方移民到澳大利亚，而他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一个叫丁比拉（Dimbulah）的采矿小镇。现如今，他用他的摄影和表演作品讲述着他家族的移民史和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坎坷的心路历程。他就是现澳大利亚著名华裔摄影师和表演艺术家杨威廉（William Yang）。他的故事被洪美恩作为一个典型人物故事引用，来诠释海外华裔对“中国性（Chineseness）”的复杂情愫。什么是“中国性”？以及它和华裔的母语保持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学者们对于语言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或语言更替（language shift）的研究兴趣已持续半个多世纪（Fishman, 1964, 1991；Melo-Pfeifer, 2015；

Tannenbaum, 2003），而很多研究者也认为移民及其后代对自己族裔身份的认同与他们继承本族裔的语言存在重要联系（Hatoss & Sheely, 2009；He, 2006；Lee, 2013；Mu, 2015, 2016；Phinney et al, 2001；Zhang & Slaughter-Defoe, 2009）。本文将从澳大利亚的历史、国家语言政策以及 30 个华人家庭的调查来深入讨论以上问题。

## 2. 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和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历史背景

纵观过去两百多年，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陈平，2013）：第一阶段是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的百年间，为语言自由放任期；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这是一个英语独尊的时期，由于白澳政策的主导，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对除英语以外的语言持极其排斥的态度，该局面一直持续到 1972 年惠特拉姆（Whitlam）政府上台；第三阶段则为 1972 年至今，政府主张多元文化，强调社会公平正义，重视移民语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自 20 世纪末以来，亚洲语言开始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极大重视。从 1994 年的《亚洲语言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到 2012 年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AIAC, 2012）白皮书，亚洲在澳大利亚的教育、政治、经济、外交领域中的地位愈加突显，亚洲语言，如中文、日语、印尼语等更是被列入了中小学外语课程的优先选择列表中（ACARA, 2011）。亚洲语言教育已一跃成为 21 世纪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的重点（Lo Bianco & Liu, 2007）。

语言政策的变化体现了澳大利亚政府对移民语言的重视，移民后代的母语保持和身份认同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就中国大陆移民而言，从早期 19 世纪 40 年代因农场劳动力短缺而招来的大批契约劳工（陈平，2013；Pulla & Woods, 2014），到今天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而来到澳大利亚工作生活的华人群体，他们对自己祖国语言文化的态度以及身份的认同必然存在天壤之别。颜乐燊博士和陈国贲博士（Ngan & Chan 2012, p.9）把这种华人移民及其后代自觉与不自觉地对祖国文化以及华人身份的认同程度称之为“中国性（Chineseness）”，它是一个动态的，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着的概念（Pulla & Woods, 2014）。

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大批契约劳动力从中国南方的沿海地区输送到澳大利亚的农场和牧场做工。继而 19 世纪 50 年代随着“淘金热”的掀起，又一大批华人离乡背井来到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地区做矿工（陈平，2013）。那时候华人劳动力这个最大的移民群体一般以男性为主，他们一方面受西人统治者的排斥和歧视，很难融入主流社会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因为与家人两地相隔，思念故乡和亲人，在异乡的生存孤立无援（Inglis, 1972）。当“淘金热”慢慢褪去，有些工人返回了故土，而有些则留在了异

国他乡。留澳的矿工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大多数开始转向园艺种植,有些人在当地成了家,有些人则成功地将远在故乡的家属接到澳大利亚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的子女组成了早期的ABC(Australian-born Chinese),即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华裔队伍(出处同上)。在白澳政策的推行时期,政府要求从非英语国家来的移民放弃本民族语言,以英语独尊,家长和孩子之间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也往往受到限制(陈平,2013),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裔的语言保持和身份认同(Pulla & Woods, 2014)。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白澳政策取消,华裔通过教育程度的提高才开始慢慢转型为商人、白领阶层甚至专业技术人员,华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受到的偏见和歧视越来越少,对自己的中国性有了重新认识。有些第二代第三代ABC开始审视和接受自己的混合身份(hybridity)(Ngan & Chan, 2012)。穆光伦博士(Mu 2015, 2016)研究中的受试者大多对自己的中国性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同时也证明了他们保持的中文水平和身份认同的程度相关性颇高。

### 3. 身份认同的后结构主义研究路向

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已热衷于身份认同的研究,从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son 1968)的八个阶段认同发展理论到泰弗尔和特纳(Tajfel & Turner 1979)的社会认同理论再到菲尼(Phinney)及其同事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理论和族群认同量表(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简称MEIM)(Phinney, 1989, 1992),包括后来的修订版(MEIM-R),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推动身份认同的研究。在全球化、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对身份认同的观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往的研究者多以静态的、固定的、单一的眼光看待身份认同,而后结构主义阵营的研究者则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dynamic)、多面的(multiple)、流动的(fluid)的建构过程,是通过语言学习和使用、社会体验等经历,产生、演变和不断加强而来的。因此,后结构主义强调移民的身份认同与其语言保持的过程密不可分(He, 2004, 2006; Lo-Philip, 2010; Norton, 2000; Shin, 2010等)。

后结构主义研究者采用定性的研究方式,通过观察(observation)、访谈(interview)、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等方法来收集数据,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即揭示其动态性和多重性。

### 4. 本研究调查

本文重点探讨父母及其孩子们的身份认同和对中文学习的观点。该研究调查了澳大利亚布里斯班30个华人家庭,父母双方均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父母为第一代

移民，他们的孩子为移民第二代。调查方式为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访谈围绕“身份认同和中文学习”的主题展开，借鉴以往的研究（Hatoss & Sheely, 2009; Lee, 2013; Zhang, 2010; Zhang & Slaughter-Defoe, 2009 等）拟定了 16 个相关问题作为引导，和被试展开访谈；同时，研究者不局限于设计的问题，而是留予被试自由发挥的空间，根据访谈主题深度挖掘被试的经历和观点，赋予主题新的意义（Galletta & Cross, 2013）。表 1 为被试父母的背景信息，如下：

表 1 被试父母的背景信息

	选项信息	被试人数 / 总人数
性别	男	1/30
	女	29/30
受教育程度	高中	4/30
	本科	19/30
	硕士	7/30
在澳居住时间	5 ~ 10 年	5/30
	11 ~ 15 年	14/30
	15 ~ 20 年	10/30
	21 ~ 25 年	1/30
出生地	中国	30/30
职业	全职母亲	10/30
	职场父母	20/30

如表 1 所示，参与本调查研究的父母以女性占主导地位，母亲一般积极参与访谈，她们坦言自己对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比父亲更熟悉。只有一位父亲认为他比孩子母亲更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和语言发展。被试父母 85% 以上获本科及以上学历，多数被试在澳居住长达十年以上，职场父母的数量为全职母亲的两倍。

与此同时，每一个家庭中有一位孩子参与了访谈。这些孩子均出生于英语国家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本研究挑选的是 10 岁左右的孩子，就读于澳大利亚小学中的较高年级，已经具有独立参与访谈的能力，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表二为被试孩子的具体信息，如下：

表2 被试孩子的背景信息

	选项信息	被试人数 / 总人数
性别	男	19/30
	女	11/30
年龄	10岁	23/30
	11岁	7/30
年级	四年级	9/30
	五年级	16/30
	六年级	5/30
出生地	澳大利亚	28/30
	新西兰	2/30

30位被试父母全部选择用中文进行访谈,而30位被试孩子中除两位自愿选择中文以外,其余都选择用英语进行访谈。被试父母的访谈用时长约为45~80分钟,被试孩子的访谈用时长约30分钟,访谈的时长主要取决于被试的语速和健谈程度。笔者对所有访谈都进行了录音、转写,其中32篇中文访谈语料被翻译成英文,并由另外两名语言研究者进行校对。该研究采用了定性数据软件NVivo 1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得出了六个主题(theme)。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主要针对中文保持和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结果进行讨论,讨论中所引用的被试均用假名。

## 5. 当代华人家庭的母语保持和身份认同

### 5.1 身份认同

#### 5.1.1 父母的身份认同

本研究调查的30位父母中,有29位给自己的定位是华人,只有一位认为自己是一半澳大利亚人一半华人,说明他们虽然生活在澳大利亚,但依然保持着浓厚的中国情愫,怀揣着强烈的“中国性”。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孩子有必要通过学习母语来延续父辈的“中国性”。大部分家长还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孩子并不会因为他们的相貌而就认同自己华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继承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例如,布莱恩(Brian)的母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译文: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文化丢了。即使我们住在海外,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依然还是中国人。这一点是我们、他们都改变不了的事

实。所以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根。我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犹太人。你知道吗，犹太人最初的国家很早就被毁了，可是他们又能够建立起新的国家，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们的教育。即使他们流落异乡，他们的民族性依然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依然被传承下来。同样的道理，如果我没让我的孩子学习中文，将来他的孩子就不可能再会说中文。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后代就再不是什么中国人了。语言和文化都没了，还怎么叫华人？不就是澳大利亚人了吗？）

布莱恩母亲利用犹太人这个例子来阐述她对语言和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见解。大多数父母认为，让孩子学习中文，并通过语言学习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才能让孩子形成对自己华人身份的认同。同时，将近半数的家长担心孩子会因为不认同自己的身份而与父母产生疏离。

### 5.1.2 孩子的身份认同

对于身份认同，参与调查的孩子们的选择和他们的父母们大相径庭。近 3/4 的孩子认为自己是一半澳大利亚人一半华人，而剩余的 1/4 则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利奥（Leo）是这 3/4 的孩子中的一员，他说：

（译文：我会说我是有一半澳大利亚人一半华人。我在学校大部分时候说英文，所以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主要是澳大利亚人，而且我也出生在澳大利亚。但是我和我的同学又不太一样，因为我还会说中文，我的父母来自中国，我也上周末中文学校。大部分同学是不去中文学校的，但是我知道一小部分人会去日文或韩文学校。所以我认为我是一半澳大利亚人一半华人。）

利奥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他已经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有过仔细的思考，他清晰地描述了他与同学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父母的族裔背景、使用的语言、是否上中文学校这几个方面。但与此同时，他又觉得他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一样出生在澳大利亚，上一样的学校，并且在学校说英文。其余选择一半澳大利亚人一半华人的孩子所提供的解释与利奥大同小异。而且，不难发现语言是他们考虑身份认同问题时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 5.2 对中文保持的态度

### 5.2.1 父母的态度

在本研究中，父母们一致肯定了学习中文的好处和重要性。他们提到的重要性包括：（1）中文是维系华人家庭交流和情感的重要纽带；（2）中文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离不开中文学习；（3）保持中文水平会给他们的孩子增添优势和机会；（4）学习英汉两种语言有利于孩子的智力发展。

25 位家长认为在他们孩子的中文学习中，听说能力的培养最重要，它不仅是家庭

内部交流的重要工具,也能帮孩子拓展社交空间,有助于他们未来的就业。在家庭交流中,许多父母表示,说中文能够让他们自如地表达情感,传递他们想要给孩子的文化价值观,从而保持甚至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有超过半数的家长表示,如果孩子全盘接受澳大利亚的文化,失去和祖辈用中文进行基本日常交流的能力,从而和父母之间产生文化鸿沟,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

有些家长还提到随着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不断壮大,尤其是近十年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数量大增,会说普通话在华人移民聚居区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Mark)母亲提到:

(译文:首先,我们住在森尼班克区[Sunnybank],走到哪里都是华人面孔,都是中国人经营的商店,说中文(普通话)是家常便饭。其次,虽然英语好能帮我们结识很多其他(族裔的)朋友,但是都不如和中国朋友来得交往密切。我们既说英语也说中文,又有同样的文化背景,所以中国朋友之间会觉得更加亲密。)

马克母亲从自身的经历和体会出发,肯定了说中文在华人社区和朋友圈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观点在诸多前人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即在一个少数族裔聚居的社区当中,共同的语言不仅能起到促进社区交流的作用,也能够帮助社区成员构建共同的身份认同(Hatoss & Sheely, 2009; Mu, 2016等)。

除了口语交流之外,父母们对中国文化也表达了强烈自豪感。他们表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有很多值得传承的文化美德。他们希望能够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文化精髓代代相传给海外出生长大的孩子。其中一位母亲说,“没有(中华)文化的滋养,年轻一代就犹如一块贫瘠的土壤,只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顶着一个不能完全属于他们的外壳”。父母们普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能让他们的孩子茁壮成长,认同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能帮助他们克服很多心理的矛盾和困难。爱德华(Edward)母亲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译文:如果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华人的身份,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怎么让其他人(其他族裔的人)看得起我们,尊重我们?现在好多欧洲裔和其他亚裔的人都想学中文,对我们的文化感兴趣,如果连我们自己这些都不会了,人家会怎么看我们?文化的根没了,不仅是一大遗憾,更会是一大损失。)

本研究中的所有父母都认为送孩子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就是为了通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结识更多的华人朋友。与此同时,大多数父母赞同学习中文就是给孩子未来增添一个重要的筹码,随着中澳经济纽带日趋紧密,父母们相信中英双语能力将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 5.2.2 孩子的态度

参加访谈的孩子们对于学习中文的态度主要分三种：非常积极(positive)、爱恨交加(a mixture of love and hate)和非常消极(negative)。其中只有两个孩子山姆(Sam)和威廉(William)对学习中文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虽然他们也曾提到汉字学习的诸多不易，但是他们感觉到了收获，也渴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读写水平。他们都提到了喜欢看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四大名著中的一些故事，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另外有21个孩子对中文学习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在中文学校可以和朋友玩(Ray)”“可以经常去中国度假(Cindy)”“可以听到更多有趣的故事(Nicholas)”“能在学校的外语课(中文)上给同学们展示自己的中文水平(Jeff)”等等；与此同时，他们恨的是学习过程中读写汉字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困难。利奥表明：

(译文：我想把中文说好，这样我就能交更多的朋友，因为有些人只会说中文，英文说得太不好……我们在用中文互相开玩笑时也很好玩，但是有时候很无聊很累，因为我们还要写很多(中文)作业……(中文)读写有时候令人沮丧，因为汉字实在是太多了。)

利奥所遇到的困难是普遍的。孩子们都抱怨汉字量多，字体复杂，而这恰恰给他们的中文学习造成了巨大的困难。除了以上两种态度之外，本研究中还有7个孩子表示自己完全不喜欢学习中文，他们只想说英语，讨厌被父母强迫去周末中文学校。亚当(Adam)就是其中一个。他解释道：

(译文：中文对我来说太难了。我讨厌听人说一大段中文。我只喜欢写英语，不会让我觉得手很疼。汉字的笔画太复杂，要花大量的力气去写不同的笔画。不管怎样我都不喜欢学中文。我希望我只要学英语说英语就好了。)

前面提到，有1/4的孩子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亚当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的描述中，他提到了很多次“hate”“dislike”“complicated”“hurt”等比较负面情绪的词。他表示希望周末可以不用去中文学校，不用再做中文作业。

此外，本研究中唯一一位在调查期间就已经放弃学习中文的孩子安妮(Anne)说道：

(译文：我妈妈让我尝试一下学习中文。我同意了。我确实努力去尝试听懂老师的话，学一些中文，但是那对我来说行不通。我上课经常分心，因为我压根不懂老师上课在说什么。我觉得我一点中文都不懂……我坐在课堂上太无聊太压抑了，所以最后只好放弃了。)

安妮在访谈中提到，她在中文课上一点自信心都没有。她感觉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因为她日校里的朋友全是说英文的，在家爸爸妈妈也没有跟她说中文。当她在全班同学面前回答不上来老师的问题时，她感觉无比尴尬和羞愧。

### 5.3 家庭语言环境

#### 5.3.1 父母及家庭成员间的语言使用情况

根据 30 位父母的描述, 只有一位父母和孩子的日常交流以英文为主, 其余父母则表示他们在家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说中文, 因为选择说中文对他们来说最为放松自如, 也让他们感觉更亲切, 不会产生距离感。这一结果和很多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Lee, 2013; Tannenbaum, 2003; Zhang, 2010; Zhang, & Slaughter-Defoe, 2009 等)。但不少父母表示日常交流的话题和用语没有深度和广度, 且不涉及到文化知识和书面语言, 因此, 父母们一致同意送孩子去周末中文学校进一步学习相关知识, 参加学校和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比家庭日常生活交流更为重要。但是从前面安妮的例子来看, 家庭语言环境对孩子语言习惯的形成和中文的基本理解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父母从小没有给予足够的中文输入, 孩子在课堂上无法理解老师传授的语言知识, 没有自信继续学习中文。可见, 家庭语言环境在语言保持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Fishman, 1964, 1991)。

本研究中还发现有 8 位孩子的祖父母居住在澳大利亚, 有的和孩子们住在一起, 有的则不住在一起, 还有个别孩子, 如西蒙 (Simon) 和尼可拉斯 (Nicholas) 的祖父母会每年定期从中国过来和孩子们住几个月。根据父母们的观察, 祖父母在孩子的中文水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对学龄前孩子而言尤为如此。一方面, 祖父母在带孩子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中文输入, 另一方面, 孩子们跟祖父母沟通的过程中不得不选择中文进行交流。很多时候, 父母也会因为祖父母在场而要求孩子多说中文。比如, 雪莉 (Shelly) 的母亲说, 因为家里老人长期跟他们一起生活, 她就给她的两个孩子制定了规则, 餐桌上必须说中文, 进出门一定要和祖父母打招呼。如果不是考虑到祖父母的感受, 她就不会坚持和孩子说中文, 事实上, 不在祖父母面前, 孩子们基本上已经不说中文了。尽管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大, 祖父母给孩子们起到的语言作用越来越少, 但是祖父母通常被认为是“语言的根 (linguistic roots)”以及“和过去的纽带 (connection with the past)” (Melo-Pfeifer, 2015)。

#### 5.3.2 孩子的语言使用和偏好

在本研究中, 17 位孩子表示他们平时既说英语也说中文。在访谈中, 只有两个孩子瑞 (Ray) 和尼克拉斯选择用中文进行访谈, 其余孩子都是选择使用英文。在访谈过程中, 这两个孩子表达流畅清楚, 有些时候停顿思考, 还时不时地使用一些英文词, 但是总体上来说与笔者交流无障碍。30 位孩子中, 只有安妮在家全程用英文和父母交流, 如果同不会说英文的亲戚交流则需要父母帮助其翻译。而其余 29 位孩子表示在家会使用两种语言和父母进行交流。只有 1/3 的孩子报告自己和父母从小习惯用中文进行日常

交流，不会说中文的一些地方就用英文补充，父母也能听懂。有半数孩子提到他们习惯了父母说中文而他们用英文回应的交流方式，他们自己很少说中文，但是听懂基本的中文没有障碍。而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在父母没听明白的情况下，孩子用一半英文一半中文翻译的方式达到交流目的。比如辛迪（Cindy）回忆说：

（译文：我的父母通常说中文，但是我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他们说时偏向于说英文。如果他们听懂了，我们就这样了。但是如果我说的一些较难词汇他们没太明白，我就不得不想办法用中文再解释一下。我们的交流有点中英掺半。）

有一小部分孩子，比如尼克拉斯，米歇尔（Michelle）和莎拉（Sarah）表示父母在家会阻止他们一直说英文。尼克拉斯解释到虽然他父母英文正常交流没问题，但是让他们一直听英语或遇到有难度的词汇，他们也会头疼。在尼克拉斯的记忆中，如果他和父母有争执，他们会不断地转换英文和中文来找到一个解决争执的方法，姐姐也会帮他尼克拉斯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语言大战（fight with words）”。此外，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和兄弟姐妹甚至中文学校的同学之间最习惯的语言选择是英文。只有在中文课上，老师要求讲中文的时候他们才会使用中文。课间通常都还是说英文，但有孩子提到他们偶尔会用一些中文词来开玩笑，或者故意不让其他一些孩子参与游戏。

## 6. 讨论和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当代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亚洲语言受重视的政策形势下，华人移民及其子女的母语保持和身份认同，结论如下：（1）第一代移民对母语保持的支持，对自己华人身份的认同，和对祖国文化的深厚情感对下一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研究调查的孩子中（第二代）有3/4都认同了自己的华人身份，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父母的“中国性”，这与历史相比（Inglis, 1972; Pulla & Woods, 2014）是重大进步，出生成长于澳大利亚的ABC这一代能够审视、接受甚至表达出自己的身份认同完全得益于宽容的国家语言政策、华人社区的发展和中文学校同华人家庭之间的共同努力。洪恩美教授（Ang 2001）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语言缺憾和身份认同危机在本研究中的大多数被试身上并没有发现。著名的语言学家费什曼（Fishman 1964, 1991）曾提出家庭是有效减缓或阻止语言更替的决定性语域（domain）。同时，许多研究也表明家庭也是身份认同构建的摇篮（Lee, 2013; Phinney et al., 2001; Zhang & Slaughter-Defoe, 2009）。

此外，在被试对自己中文学习经历、家庭生活经历以及自己喜好与态度的叙述中，我们也看到了身份认同的动态性和多面性：很多认为自己是一半澳大利亚人一半华人的孩子在学校里说英语的时候，和学校同学相处的时候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是澳大利亚人，

然而跟家人、朋友说中文的时候,他们又觉得自己是华人,这正是对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所赋予他们的灵活、动态、双重的身份认同。父母和孩子们的叙述中处处可见语言在他们的身份认同构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Hatoss & Sheely, 2009; He, 2006; Lee, 2013; Mu, 2015, 2016)。

当然,这些移民第二代的语言和身份认同都还在发展变化中,他们的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笔者希望未来可以通过长期的纵向研究或后续的追踪调查对身份认同构建的动态性和发展变化有更深入的探讨。

#### 参考文献:

- 陈平, 政治、经济、社会与海外汉语教学——以澳大利亚为例[J]. 世界汉语教学, 2013(3), 400-412.
- Lo Bianco, J. & Liu, G. 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与中文教学生态环境[J]. 世界汉语教学, 2007(3): 120-131.
- ACARA. (2011). The shape of 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 Languages. Retrieved October 20, 2017, from [http://docs.acara.edu.au/resources/Languages\\_Shape\\_of\\_the\\_Australian\\_Curriculum\\_new.pdf](http://docs.acara.edu.au/resources/Languages_Shape_of_the_Australian_Curriculum_new.pdf)
- AIAC (2012).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trieved October 10, 2017, from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australia\\_in\\_the\\_asian\\_century\\_white\\_paper.pdf](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australia_in_the_asian_century_white_paper.pdf)
- Ang, I.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1<sup>st</sup> ed.). New York: Norton.
- Fishman, J. A. (1964).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s a field of inquiry. *Linguistics*, 2(9), 32-70.
- Fishman, J.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Galletta, A., & Cross, W. E. (2013). Mastering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beyond: from Research design to analysis and publication.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atoss, A., & Sheely, T. (2009).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identity among Sudanese-Australian refugee-background youth.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0(2), 127-144.
- He, A. W. (2004).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classes. *Pragmatics*, 14 (2/3), 199-216.
- He, A. W. (2006). Toward an identity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4 (1), 1-28.
- Inglis, C. (1972). Chinese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6(3), 266-287.
- Lee, B. Y. (2013).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formation: The case of Korean immigrant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in the USA.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3(11), 1576-1588.
- Lo-Philip, S.W.-Y. (2010).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eritage language literacy and identity processes.

-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21(4), 282-297.
- Melo-Pfeifer, S. (2015) The role of the family in heritage language use and learning: Impact on heritage language polic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8(1), 26-44.
- Mu, G. M. (2015). A meta-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ritage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6(3), 239-254.
- Mu, G. M. (2016). Looking Chinese and learning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The role of habitus.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15(5), 293-305.
- Ngan, L. L-S. & Chan, K. (2012) *The Chinese face in Australia: Multi-generational ethnicity among Australian-born Chinese*, New York: Springer.
- Norton, B. (2000).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Gender, ethnicity, and educational change*. Harlow: Longman/Pearson.
-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 34-49.
- Phinney, J. S. (1992). 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A new scale for use with diverse group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7, 156-176.
- Phinney, J. S., Romero, I., Nava, M., & Huang, D. (2001). The role of language, parents, and peers in ethnic identity among adolescents in immigrant famili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0(2), 135-153.
- Pulla, V. & Woods, J. (2014). The resilient Chinese in Australia: Ethnicity, identity and ‘Chinesenes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 29(5), 388–395.
- Shin, S.J. (2010). “What about Me? I’m Not Like Chinese but I’m Not Like American”: Heritage-Language Learning and Identity of Mixed-Heritage Adults.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9(3), 203-219.
- Tannenbaum, M. (2003). The multifaceted aspects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 new measure for its assessment in immigrant famil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6(5), 374-393.
- Tajfel, H., & Turner, J.C.(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33-37).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Zhang, D., (2010).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parents and their second-generation children in the U.S..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33(1), 42-60.
- Zhang, D., & Slaughter-Defoe, D. T. (2009). Language attitudes and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SA.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2(2), 77-93.

(沈椿萱 姜文英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 香港南亚裔学生学习中文的研究调查 及政策建议

李楚成 梁慧敏

**提 要：**据政府统计，目前香港来自南亚地区的居民人数超过八万，由于他们不谙中文，加上文化上的差异，使他们升学和就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进而造成种种社会问题。为了充分了解南亚裔学生在中文听说和读写方面碰到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需求，本研究向 15 名南亚裔大学生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南亚裔学生学习中文的困难，源于缺乏粤语口语和书面汉语的各种元语言意识。文章首先回顾香港各界近年在协助南亚裔居民学习中文上所做的努力；其次，根据调查所得分析中文教学中口语水平和读写能力的辩证关系，就教学法和教学方向提出相应建议，最后从语文政策的执行方面出发，为教育部门检视、调整语文政策提供参考；我们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对症下药，配合适当的语文政策，最后必能惠及更多的青年人乃至整个南亚族群，从而推动香港社会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香港南亚族裔；两文三语；中文学习；语文教育政策；政府措施

## 1. 背景

按 2016 年政府的统计，香港少数族裔人口总数达五十八万，占全港总人口 7.97%，比 2011 年增长了 29.5%，其中来自南亚地区（主要指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居民人数已超过八万。当中有些是新移民，更多的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南亚族裔迁移本港的历史，可追溯至香港开埠初期。由于印度和香港先后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因而形成了两地的联系。这些南亚居民的祖辈主要来自印度次大陆，在港英时期由殖民地政府招募到香港，为警队、雇佣兵（噶喀兵 Gurkhas）或保安部门服务；有些则经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聘用为海员来港参与发展迅速的中国海运贸易（Erni & Leung, 2014）<sup>1①</sup>。

殖民地时期，公文以英语为准，南亚裔港人只要懂中文，便可担当重要职位（谢锡金等 2012），有些甚至能成为公务员团队的一分子。然而当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倒计时之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 1995 年 8 月起，聘任公务员的中文语文能力要求已和英文语文能力要求看齐（黄湛利，2016）；虽然自 2006 开始，政府降低了

入职难度，求职者若考获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GCSE) /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 /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 (GCE O Level) 中国语文科 C 级也可视为符合入职要求，学者（谢锡金等，2012）认为这对鼓励南亚族裔学习中文，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中文科考试的程度偏低，实在难以满足生活和职业的需要。因此南亚裔人士在语言方面的劣势并未能大幅减少。

目前，南亚裔居民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学习中文，由于几乎没有说中文的家庭环境，大多数南亚裔学生学习中文时都困难重重，以致无法应付正规教育中中文科的要求（粤方言口语及书面中文）。过去十多年的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政府统计处，2001，2006，2011）显示，每 100 名自小学开始在港上学的南亚裔儿童，只有 1-2 人能升读高等院校（Erni & Leung, 2014），其比例远低于本地学童。这也导致社会经济条件不富裕的南亚裔人士，很难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以致在以经济划分阶级的香港社会中长年沦为弱势社群，甚或遭排斥（Ku, Chan & Sandhu, 2005）。南亚族裔面对的主要问题包括：适合其学习水平的中文书面资料不多、不能适应学校生活和主流课程、有限的学校选择、进修和职业发展路径及机会等（Pérez-Milans, 待出）；关于自殖民地时代以来，香港的教育语言政策的关键问题，请参考 Kan & Adamson, 2010; Tollefson & Tsui, 2014）。在进一步讨论之前，下一节将首先就香港各界近年在协助南亚裔居民学习中文上所做的努力作出简要的梳理。

## 2. 香港近年在南亚裔中文学习方面的研究调查和政策支持

为了寻求解决南亚裔居民所面临的求学、就业、贫穷等社会问题的方法，香港社会各界纷纷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以便找出对症下药的方略。如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香港融乐会（2003）、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2010）、香港明爱九龙小区中心（2010）的研究和调查，从就业问题出发，探讨南亚裔人士在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并提出改善建议；又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2005）、平等机会委员会（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简称平机会 2012），则从种族歧视角度出发，研究南亚裔人士在融入香港社会时面临的各种问题；而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及天主教香港教区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九龙）（2012；2014），则从南亚裔人士的贫穷情况和成因入手，探讨政府的扶贫政策；另外，由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局委托）（2008）、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2013）、香港浸会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慈善团体“亲切”委托）（2007；2008）、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2014；2016）、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研究中心（2016）等大专院校或机构所做的研究调查，则是从教育角度出发，讨论少数族裔学童的共融发

展, 以及学习和升学困难。

虽然以上的研究都不是从纯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但其共同的结论是: 中文能力不佳是造成南亚裔人士生活上种种问题的来源之一。平机会(2012)一项研究更指出, 由于语言障碍, 南亚族裔人士几乎无法有效利用各种以中文书写的政府资源。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5)的意见书也指出: 并非所有招聘广告都有英文版本, 限制了少数族裔获得求职信息的机会, 何况一些本身连英语能力仅达到基本沟通水平的少数族裔人士, 更是难以求职。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信息的缺乏, 少数族裔进入就业市场时, 职业选择往往非常有限。

可见, 少数族裔人士在求学或就业上遇到问题归根究底都是“语言上”的问题, 语言是所有困难的来源, 是核心困难所在(袁振华, 2007; 谢锡金等, 2012; 丛铁华等, 2012; 关之英, 2014)。本港的高等学府同样渴望为南亚裔居民尽一份力, 尝试以不同的切入面, 提升其语言能力, 尤其以训练中文能力为重。如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大学——学校支持计划”, 向学校提供校本专业支持服务, 结合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教学法和课堂实践, 以提升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教育局, 2015a)。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编制了《针对非华语学生的中文教学参考资料——教师手册》(教育局, 2015b), 而后又获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的支持及语文基金的拨款, 提供“教授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深造课程, 为教授非华语学生的在职中、小学中文科教师提供专业培训, 以支持教师的教学工作(语常会, 2015)。

政府近年即着力改变现状, 为支持南亚裔而投放资源, 包括资助各种研究和提供支持措施, 有关政策的其中两大重点, 放在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方面。

2011年《施政报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例如在就业支持方面, 少数族裔及新来港人士可报读雇员再培训局(政府培训机构, 帮助学员就业)特设的课程, 亦可通过劳工处的就业中心专责柜位获得就业服务。劳工处也在不同地区举办招聘会, 协助他们就业。政府并计划为少数族裔设立多一家支持中心和两家分中心, 扩大“融入小区计划”, 又会提供更多以少数族裔语言广播的电台节目(第100段)。经过多年的讨论, 政府的支持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方面从2013年开始有了更具体的目标和实行方法, 2013、2014、2015三个年度的《施政报告》都将语文政策的重点放在非华裔中文教学的支持上。2013年要求加强各种支持, 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更有效学好中文的机会, 2014年的重点在加强幼儿教育至中小学阶段少数族裔学习中文的支持, 2015年的政策要点则是为中小学提供“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和支持教学材料, 并于该学年开始在高中分阶段提供与资历架构挂钩的应用学习中文课程。



近年政府对少数族裔学生中文教学提供的支持还包括：为学校提供额外经常拨款、为教师提供专门的支持及培训、开办中文学习支持中心、推行“课后中文延展学习计划”、开办暑期衔接课程等等（政府新闻处，2014）。至于非政府组织方面，融乐会与平机会也陆续推出各种支持措施，帮助“弱势少数族裔”融入主流社会（Erni & Leung, 2014）。例如提供多种语言、涵盖实用数据的“非华语学生教育服务”网站，已定期扩展和更新，供各界人士，包括非华语学生、家长、校长、教师、非政府机构及其他义工社会服务组织参考（见教育署，2001；教育统筹局，2005；教育局，2014）。除中英文之外，浏览语言也包括少数族裔的语言，如印度尼西亚语、尼泊尔语、他加禄语、泰语和乌尔都语等（教育局，2016）。

加上语常会以及优质教育基金对少数族裔中文学习的支持，政府的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收效却不尽如人意。乐施会、融乐会等非营利组织亦对香港的南亚裔居民投入颇多关注，并定期对该族群的贫穷问题、教育状况等做追踪调查。乐施会（2016）的调查指出，一直以来，尽管有很多在香港居住的少数族裔学生积极学习中文，但成效不够理想。虽然自2014/2015学年开始，教育局就开始为学校提供“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可是，“学习架构”推行已逾三年，除了各学校招收学生非华裔学生人数接受支持的信息外，教育局并没有提供关于“学习架构”的成效评估报告供各界参考，例如三年间非华裔学生的中文听、说、读、写的平均成绩及进步区间等资料。目前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政府的大力投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相反，《东方日报》等本地媒体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等社会团体近年也多有批评之声。

接受专上教育被认为是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检验南亚裔学生中文学习的成效，南亚裔学生公开考试中文科的报考人数和通过率可视为指标之一。乐施会（2016）的报告对录取非华语学生的学校应考“全港性系统评估”及公开考试的情况做了调查分析。报告指出，2013/2014学年，中六级非华语学生应考香港中学文凭试（HKDSE）的人数仅占非华语学生总人数的5.6%。虽然同一学年，应考综合中学教育证书（GCSE）的中三、中四和中五学生的比例分别为25.3%、53.2%和65.0%。然而，综合中学教育证书的难度颇低，只等同小学二至三年级的程度，完全不足以应付升学就业，以及日常生活所需；且由于是国际试，根本有别于本地需要，若在主流学校读满6年的非华语学生，没有资格考综合中学教育证书，只能考DSE，但很多考DSE的非华语学生都不合格（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4）。融乐会（2015）在《探讨香港非华语学生于本地就读专上教育机会》的研究报告也指出，碍于语言所限，非华语学生未能应付各个专上院校课程的语言要求，使非华语学生的课程选择更少。其调查的257个课程中，仅有51%（130个）完全以英文编写教材及评核，对不谙中文的非华语学生，却有44%（114个）

课程主要以中文教学。另一个更为直观的方式是参考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资助的南亚裔学生人数。立法会(2015)档提到,多年来通过大学联招入读教资会资助学士学位课程的非华语学生数目一直偏低,在2014-2015年只有104名,其中南亚裔学生只有39人。同期,联招取录了17,600名当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南亚裔的比例只占0.2%,可见他们入读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总体来看,19岁至24岁南亚裔青年在2011年的就学比率为26.4%,远低于香港的整体比率(44.4%)。其中,巴基斯坦人只占18.2%,而尼泊尔人亦只有17.3%(立法会,2016)。乐施会(2016)认为香港少数族裔学生入读大学或专上教育的比率远低于本地学生,显示香港的教育体制未能公平地为他们提供向上流动的途径,局限了他们谋职和改善生活的机会,而这一状况目前仍未见到质的改变。

本文认为政府投入和成效不成比例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幼儿教育阶段的支持力度不够、教材的设计缺乏统一标准、政策的推行缺乏细节指引和统一的评估标准、未能照顾少数族裔学生实际的语言需要和学习难点、缺少细致的语言调查。上文提及的各调查研究虽然也颇有启发意义,但在细节上还有尚待补充的地方,例如从语言学角度了解南亚裔学生学习中文的成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有哪些改进办法。为了更具针对性,本文希望从稍具语言学知识的南亚裔学生那里取得一些突破,探究其中文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难关,并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本研究最后成功访问到15名南亚裔学生,完成了一个初步的实证调查。其目的有二:(1)了解南亚裔学生在学习口语(主要指粤方言)和书面中文时遇到的实际困难;(2)讨论目前为南亚裔学生开设的中文课程和教育局的支持措施是否符合其需求,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 3. 研究方法和过程

上文提到,多年来通过大学联招入读教资会资助学士学位课程的非华语学生数目一直偏低。以本研究取样的香港教育大学为例,从2012/2013学年到2015/2016学年,学校共收录了31名非华语学生入读教资会资助课程,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及泰国。前两个学年所有非华语学生均入读英国语文教育荣誉学士课程(以全英语授课);2015学年始有学生入读小学教育荣誉学士课程(数学)及体育教育荣誉学士课程(香港教育大学,2016)。能够在教育大学成功访问到15名南亚裔本科大学生实属不易。

本研究从立意之初就将研究对象定位在已获高校录取的南亚裔大学生,尤其是修读人数最多的英国语言教学专业的学生,很幸运最后有15名同学接受了邀请。从相对数字来看,15名南亚裔学生几乎占学校非华语学生总人数的五成;然而,从绝对数字来看,若只采用定量分析,可能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因此,本调查采取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

合，且更倚复位性分析的方式。学者（庞继贤、王敏，2001）也认为二语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常常不是线性发展和具有明显因果关系的。影响语言习得的因素纷繁复杂，这些因素具有内化的不可观察的特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互动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所以，要百分百地模拟实验室的条件，并对有关变量做到真正的控制是很难的。因此，除学生个人背景资料之外，本实证研究均采用开放问答的方式采集数据，并且不提前对问题和解决方法做出假设，目标是收集当事人视角的看法及未经筛选的第一手资料。另外，陈向明（1996）提出，如果调查可以站在被研究者的角度，或可从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中推衍出他们看待世界以及建构意义的方法。从被研究者的方面考察正是本调查的目的之一。如果参加该实验的受访者都学习过英国语文教育荣誉学士课程，想必具备一定语言习得和教学两方面的专业学习背景。他们在接受访问时或能提供与众不同且独到的见解，帮助研究者实现突破。因此，受访者不再是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实验的参与方，通过良好的互动相信亦可提高研究的解释力。本文因为篇幅有限，无法罗列出所有访谈记录，而只是筛选出部分极具参考价值的回答，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更多的观察分析笔者会再另文详述。

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后，研究小组先通过学生的英文名字选出潜在受访者，之后发送电邮邀请他们参加聚焦小组（focus group）面谈。最后有 15 名主修英国语言教育的同学接受了邀请。

本研究的定量和定性数据是通过半结构式问卷和聚焦小组面谈这两种方式完成收集。作为聚焦小组的引题材料，英语半结构式问卷早在邀请时就附在电邮中发送给受访者了。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收集受访者的个人资料，以建立个人语言背景数据库，重点是了解其孩童时期语言学习和读写能力发展的情况。第二部分收集受访者对相关语言在日常生活、语言政策和教学实践方面所持的意见。

参加聚焦小组（每组 2-3 人）之前，接受邀请的 15 位受访者会先完成问卷的第一部分，并通过电邮寄回给研究人员。聚焦小组会谈期间，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研究人员会做实时记录，处理之后再请受访者于 48 小时内核对纪录的准确性。这一步骤能说明研究员分辨出受访者不同经历中的异同点，以便在后续的会谈中收集重点资料。聚焦小组共面谈 7 次，主要询问受访者学习中文的具体经验，详细会谈记录与问卷调查的结果会进一步做交互分析。

本研究的受访者介乎 18 至 22 岁之间，就读大学一至四年级，包括印度裔（5 人）、巴基斯坦裔（5 人）、菲律宾裔（4 人）和尼泊尔裔（1 人）。为了方便记录，本研究按照其性别（男 M / 女 F）和国籍（印度 In，巴基斯坦 Pa，菲律宾 Ph 和尼泊尔 Ne）来进行编码，例如 “In3F” 是指 “印度裔小组中的第三名女性受访者”。各受访者详细信

息的概述见表1。

表1 受访者的性别、国籍、年龄、移居香港时的年龄、家庭语言和小区语言

受访者编号	原国籍	性别	年龄	移居香港时的年龄	宗教	家庭语言	小区语言
In1M	印度	男	18	2	天主教	英语	印地语
In2F	印度	女	18	香港出生	锡克教	旁遮普语	旁遮普语
In3F	印度	女	20	香港出生	锡克教	英语	旁遮普语
In4F	印度	女	18	香港出生	锡克教	旁遮普语	印地语
In5F	印度	女	21	8	印度教	英语/印地语	孟加拉国国语/印地语
Pa1F	巴基斯坦	女	19	1.5	伊斯兰教	乌尔都语/欣德科语(Hindko)	乌尔都语
Pa2F	巴基斯坦	女	18	香港出生	伊斯兰教	欣德科语(Hindko)	乌尔都语
Pa3F	巴基斯坦	女	19	香港出生	伊斯兰教	旁遮普语	乌尔都语
Pa4F	巴基斯坦	女	22	6	伊斯兰教	乌尔都语/英语	乌尔都语
Pa5F	巴基斯坦	女	19	0.5	伊斯兰教	乌尔都语/英语	乌尔都语/旁遮普语
Ph1M	菲律宾	男	23	10	没有	英语	他加禄语
Ph2F	菲律宾	女	20	15	基督教	英语	他加禄语
Ph3F	菲律宾	女	22	香港出生	天主教	他加禄语/英语	他加禄语(英语)
Ph4F	菲律宾	女	22	1	基督教	英语	他加禄语
Ne1F	尼泊尔	女	19	4	佛教/印度教	尼泊尔语	尼泊尔语(马嘉尔语)

#### 4. 研究结果分析

表2所列的是15名受访者对中文等几门语言的自我评价,由于大多数受访者除了英语,还能熟练地使用两种或以上的语言<sup>2②</sup>,所以表2除了列出受访者对中文、家庭语言、小区语言的自评之外,还提供了一门其他语言的评分做参考。自评的部分,本研究参考了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评级标准<sup>3③</sup>,设定为7分制,分别对应5\*\*,5\*,5,4,3,2,1七个等级。从表格可以看到受访学生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小区都很难得到中文方面的支持。究其原因,丛铁华等(2012:77)曾分析到:南亚裔人士的居住环境及生活圈子比较封闭,呈现一种自成一国的状态,成为一种封闭式的小区(closed community)。

由于缺乏语言环境，受访者对听说和读写的自我评分普遍偏低，听说读写四个项目的平均值分别为 2.97/3.7/1.67/1.4，听说的均值略高于读写的均值，但绝对分值仍然不高。对比表 1 中各受访者移居香港的年限，可以发现在港居住的时间与中文的流利程度之间并不存在正比关系。

表 2 受访者对中文、家庭语言、小区语言和其他语言的自我评估

受访者	中文 (听 / 说 / 读 / 写)	家庭语言 (听 / 说 / 读 / 写)	小区语言 (听 / 说 / 读 / 写)	其他语言 (听 / 说 / 读 / 写)
In1M	1-1/1/1	英语 (L1) 6/6/6/6	印地语 (L2) 1/1/1/1	法语 (FL) 3/4/4/3
In2F	2/2/2/1	旁遮普语 (L1) 7/7/1/1	印地语 (L2) 5/5/0/0	法语 (FL) 2/2/3/2
In3F	6/5/0/0	英语 (L1) 7/7/7/6	旁遮普语 (L2) 5/5/1/1	法语 (FL) 5/3/3/3
In4F	5/2/1/1	旁遮普语 (L1) 7/7/1/1	印地语 (L1) 6/5/4/3	法语 (FL) 6/6/7/6
In5F	0/0/0/0	英语 (L1) 7/7/7/6	印地语 (L2) 6/5/4/3	法语 (FL) 6/4/6/4.5
Pa1F	6/5/2/2	乌尔都语 (L1) 及欣德科语 (Hindko) (L2) 6/6/2/2	乌尔都语 (L1) 6/6/2/2	法语 (FL) 2/2/2/1
Pa2F	6/5/3/2	欣德科语 (Hindko) (L1) 7/7---	乌尔都语 (L1) 6/5/3/1	--
Pa3F	7/7/5/5	旁遮普语 (L1) 7/7/1/1	乌尔都语 (L2) 6/6/1/1	法语 (FL) 5/5/5/5
Pa4F	4/3/1/1	乌尔都语 (L1) 7/7/3/2	乌尔都语 (L1) 7/7/3/2	法语 (FL) --
Pa5F	3/2/2/2	乌尔都语 (L1) 6/5--- 英语 (L1) 6.5/6.5/6.5/6.5	旁遮普语 (L1) 6/6---	法语 (FL) 3/1/1/1
Ph1M	3/2/2/2	英语 (L1) 7/7/7/6	他加禄语 (L1) 7/7/4/3	法语 (FL) 5/5/5/4
Ph2F	5/4/4/3	英语 (L1) 7/7/7/6	他加禄语 (L1) 7/7/6/5	--
Ph3F	2/2/0/0	他加禄语 (L1/L2) 7/7/7/7	他加禄语 (L1/L2) 7/7/7/7	法语 (FL) 1/2/2/2
Ph4F	1.5/1.5/0/0	英语 (L1) 7/7/7/7	他加禄语 (L2) 3/3/2/2	法语 (FL) 5/5/5/4
Ne1F	4/3/2/1	尼泊尔语 (L1) 5/4/1/1	尼泊尔语 (马嘉尔语) (FL) 1/1/1/1	--

注：L1= 第一语言 L2= 第二语言 FL= 外语

接下来再看看受访学生对粤方言听说和书面中文读写能力的感知难度和重要性的评估（5 分制标准，分数越高难度 / 重要性越高）。

表3 受访者粤方言听说和书面中文读写能力的感知难度和重要性

受访者 (13女, 2男)	粤方言听说能力		书面中文读写能力	
	感知难度	重要性	感知难度	重要性
In1M	3	4	5	3
In2F	2	4	2	3
In3F	4	5	5	5
In4F	3	5	5	5
In5F	5	2	5	5
Pa1F	2	4	3	2
Pa2F	3.25	5	5	5
Pa3F	1	5	2	5
Pa4F	3	5	5	4
Pa5F	3	5	4	2
Ph1M	3	4	3	4
Ph2F	5	4	4	4
Ph3F	3	5	5	4
Ph4F	4	2	5	3
Ne1F	2	4	4	3
平均分	3.08	4.2	4.13	3.8

从上表可以发现他们普遍认为中文学习殊不容易,听说和读写感知难度的平均分别为 3.08 和 4.13,其中中文读写有 8 名受访者给了 5 分(即“最困难”),听说则只有 1 位认为难度达 5 分。

即使父母中其中一位是华裔的受访者也认为中文读写难度不低,Ph2F 的父亲是说粤方言的华裔,为了能使她掌握中文,四岁时她父亲还特意送她回香港学习,但效果并不理想。对此,她提到:

汉字字符就像绘图,但英文字母只是 ABC。你能记住 26 个字母便没有问题了。但每个中文字都有一个不同的字符,所以书写中文就像视觉艺术。(Ph2F)

Pa1F、Pa2F 和 Pa3F 自儿时起就在以粤方言为教学语言的幼儿园学习,所以 Pa1F 和 Pa3F 对于粤方言听说的感知难度分别为 2 分和 1 分,书面中文读写的感知难度分别为 3 分和 2 分(2 分为受访者中的最低分)。但 Pa2F 也依然认为两项的难度都不低(3.25/5)。

表 2 也列出了各受访者对于听说和读写重要性的评估,平均分分别为 4.2 和 3.8(即“非常重要”),可见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可粤方言在香港的重要作用。其评分也能响

应梁慧敏 2009 年和 2014 年语言调查所录得的关于粤方言重要性的平均分（分别为 4.57 和 4.71；同样是 5 分制标准，分数越高重要性越高）（李贵生、梁慧敏，2010；梁慧敏，2014）。

当问及具体困难时，受访者都一致认为汉字是所有困难的根源所在，例如以下意见：

学习汉字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可依循的规则。就英语而言，语言符号和声音结合起来就成为字词，这种方式却不适用于学习中文。对我们来说，中文构字非常随机。（In3F）

汉字属表意为主兼表音的音义文字系统，每一个汉字都包含了“形”“音”和“义”三个元素，加上汉字独特的书写形式——方块字，使汉字跟南亚裔学生本身所掌握的表音语言，例如乌尔都语、印地语等拼音文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谈及如何学习汉字新词，受访者的经验大致是相似的。Pa4F 提及，每次接触生词时，老师会以诵读来示范发音，然后在黑板上写一至两次笔画顺序，之后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将该字抄十几遍。Pa5F、In3F 和 In4F 都表示对上述的“教学法”很熟悉。

对于南亚裔学生来说，汉字笔画多，又较难通过语音来记忆，书面形式和发音之间没有任何可感知的联系，这使他们学习中文时遇到极大的困难。虽然一部分汉字是由象形文字演化而来，但中文的字符很大程度上却由发音来支配。大多数汉字（约 80%）<sup>4④</sup>是由“形符”（表意义）及“声符”（表读音）两部分组成的文字（李卓敏，1989，第 1-3 页）。形声字是汉字系统的主体，由有限的部件充当形符和声符，按照固定的结构模式构字。汉字数量虽然多，但基础部件充其量只有几百个，若利用形声字所共有的声符，带出一批形声字，相信可以减轻学生学习文字负担。然而，学习者必须先下一番苦功，一个一个地学懂数百个汉字，具备足够汉字储存量之后才能在字形结构中找出带“音”的“声符”，正如厄巴尔（Erbaugh，2002：47）所说：

从字符中理解语音是困难的。若不会说中文，便不会察觉到其语音是什么。（……）对学生而言，语音提示没有什么说明，除非他已经记住了数百个字。

一般而言，口头表达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发展读写能力，但这对于香港的南亚裔学生来说，这方面却帮助不大。关于香港三语使用的研究调查（李贵生、梁慧敏，2010；梁慧敏，2014）指出，粤方言是香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在生活和工作各场合的使用频率都遥遥领先于英语和普通话。但是，由于缺乏家庭和小区语言环境，南亚裔学生无论是输入或输出，都很少使用粤方言。由于无法提高区别声调间细微差别的语音敏感度，他们不能自信地与华裔人士交流，而且在社交互动中，Ph1M 和 Ph2F 就指出说，华裔人士的消极反应也往往会抑制南亚裔学生使用中文交流的欲望。下文笔者将结合受访者提及的难点提出相应教学上的建议，并进一步就目前政府的相关政策展开讨论。

### 5. 基于调查的讨论和建议

南亚裔学生对粤方言不熟练的直接后果,使他们无法将汉字的“形”和“音”对应起来,而只能采用“图像记忆”的方式记忆汉字,更严重的是由于其口语和书面中文水平无法达到各年级的基本要求,他们很难投入到以粤方言为教育语言的课堂中,跟上主流中文课程的希望更加渺茫。因此,本文认为要提高南亚裔学生的中文读写能力,也要提升他们的口头表达水平,不能顾此失彼。如何平衡又可持续地加强口语和书面中文教学,中国大陆“拼音先行”的教学方法或可作为借镜。

在中国大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改论述的启示下,中国黑龙江省教育学院的丁义诚、李楠、包全恩提出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下称“注提”)的教改建议。实验1982年从中国黑龙江省三所小学的一年级开始进行,经过20多年的完善和发展,取得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效果。实验的基本方法是:(1)一开始用三周时间进行拼音教学,让学生熟练掌握汉语拼音;(2)在学生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情况下,先阅读拼音课文,进而阅读汉字全部注音课文,再阅读汉字(难字注音)课文;(3)利用汉语拼音写话和作文,先用纯拼音写话,进而用拼音夹汉字和汉字夹拼音作文;(4)从一年级开始,先打下能识能写350个汉字的基础,进而通过大量阅读来增识汉字,通过大量作文练习写字;(5)在大量的听、读、说、写的训练中,打好说普通话的基础(王策三,2001;庄健,2002)。

“注提”实验的最重要的创新是打破了过去语文教学“重文轻语”的传统方法(王均,1987)。学生可以在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情况下,先阅读拼音课文,进而阅读汉字全部注音课文,再阅读汉字(难字注音)课文。虽然“注提”实验的教学对象是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童,但对非母语的中文教学也有借鉴价值。南亚裔学生的母语,如乌尔都语、尼泊尔语、他加禄语虽属于不同的语系,书写系统亦不同,但都属表音文字,与汉语截然不同。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掌握拼音要比汉字容易很多,受访者Ph2F就认为普通话更容易学习,因为普通话采用汉语拼音辅助阅读学习之故。而在香港,基础教育容易忽略口语表达的问题,因为华裔子弟可以利用自身本身具备的语音知识将汉字学习联系在一起,而这一从小习得的口语能力是南亚裔学生所不具备的。

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不少的受访学生其实是掌握一定的听说能力的,然而由于没有受过系统的语音方面的训练,他们在同华人进行交谈时普遍缺乏信心。笔者认为如何在学生已有的中文听说能力的基础上将“语”和“文”结合在一起或许是南亚裔中文教学的一个突破点。“注提”实验对笔者最大的启发是“阅读先行”和“大量输入”。众所周知,语言的输出依赖于语言输入的“量”和“质”。举例说明,如果要帮助南亚裔学生通过中文学习以融入香港校园生活,并且为校外的日常生活提供语言上的支持。必



须要首先了解同级华裔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所掌握的中文能力，并且帮助他们摄入足够量的语汇、句式和语法点等知识作为交流的基础。而目前南亚裔学生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难是中文的储备与实际需求的巨大落差。如前文提到的，综合中学教育证书的难度只等同小学二至三年级的程度，完全不足以应付日常生活所需。

因此，本研究认为南亚裔中文教学现阶段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在较短时间大幅提升学生“读”和“听”的输入量。笔者认为“注提”实验“拼音先行”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一方面，借助一定的“拼音方案”，降低阅读难度，也可以缓和学生对“汉字”的抗拒心理。另一方面，在正式教授汉字之前，通过“拼音方案”可以促进南亚裔学生元语音学习意识的确立，有关阅读和识字发展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也曾表明，“拼字表现方式的系统或能作为辅助交流的处理网络，从而说明语音处理……在拼字和语音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互惠影响”（Peterson, Ingvar & Reis, 2009, 第 173 页）。通过优化口语发音，提高学生使用中文口语交流的信心和意愿。当读写能力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再加入汉字和写作的教学。最后把听、说、读、写融为一体，既学口语，又学书面语，语文并重，先语后文，寓识字于读、写之中（王均，1987）。

这里也带出一个问题，香港的教育制度没有充分考虑粤方言这一主要口语的重要性（Lee & Leung, 2012）。回归后，香港虽然一度提倡母语（本地惯用语：粤方言）教学，但所谓“母语”在这种政策中只是教学的手段，旨在传达相关的学科知识，其本身的能力发展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李贵生、梁慧敏，2010）；而且在香港接受训练的中文教师似乎也不太理解口语语音对书面语文发展的影响，而且在香港接受训练的中文教师似乎也不太理解口语语音对书面语文发展的影响。因此，教师很少试图以粤方言作为教授汉字的基础。现时在香港，在政策或实践层面上没有相应的支持，以帮助南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学生有系统地提高和巩固其口语知识和能力。倘若没有良好的汉语听说知识，要跟得上主流课程中中文读写的教学指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教学设计方面，不论南亚裔学生何时开始学习中文，首要任务应该是为他们打好坚实的语音基础。笔者尝试在其他的实验中验证以上的设想，但实验需要长时间的观察，若有足够数据，笔者将再撰文详加分析。

## 6. 对语文教育政策的建议

上文提到，“注提”实验的成功是经过了长达 20 多年的实践，期间得到了教委、各省份语文教师的大力投入，以及人教社对教材和各种拼音读本出版的支持。而这些条件是目前香港的中文教学界所欠缺的，要提高南亚裔学生中文教学的素质与成效，教育政策上的支持是关键。本文希望香港语文政策的制定可以参考以下一些要点（参照

Tse, Marton, Ki & Loh, 2007, 第381–382页; 另见“公平和反种族歧视的学校教育战略”, Erni & Leung, 2014, 第235页):

#### 6.1 支持南亚裔学童入读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幼儿园

乐施会(2014)曾批评“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框架”只为小一至中六的学生提供,完全忽略了学前儿童。希望政府重视这一黄金学习时段,为少数族裔学童提供直接、恒常的中文学习支持,不要错失打好中文根基的机会(Li, 2017)。Li and Chuk(2015)也发现,那些缺乏早期中文沉浸机会(6岁前),以及缺乏在幼儿园和初小阶段与同龄人交流和互动机会的南亚裔受访者,一致认为汉语声调是不可逾越的绊脚石。本研究受访者 Pa1F、Pa2F 和 Pa3F 对自己口语水平给予最高评分,聚焦小组访谈时,他们都指出入读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幼儿园对于他们掌握中文有巨大帮助,Pa1F 强调及早的语言沉浸使他觉得中文并不难学,而且一旦习得口语,对中文读写提高有莫大的帮助。Pa3F 也鼓励南亚裔儿童及早入读本地学校。对此,笔者也呼吁政府应该持续拨款,支持南亚裔学童,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童入读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幼儿园,增加早期语言沉浸的机会(Li & Chuk, 2015),打下坚实的语音基础。

#### 6.2 以口语能力的提升促进读写能力的发展

教学策略方面,过去十多年来,香港大学谢锡金教授以综合感知方法(integrated perceptual approach, IPA)教授汉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Tse et al., 2007, 见第393–394页)。该方法从学生或多或少熟悉的意思、文本和语境开始,由上而下以引导的方式教授汉字,以提高学生对相同语义部首或语音部件的汉字意识作为目标,例如以上位词“动物”来引出幼儿园学生所熟悉的下位词(Lee, Tse & Loh, 2011, 第670页)。此举不但促进了学生对相似部首或部件的汉字的联想,而且能说明学生建立起语义网络的关联。教学实践显示,学生不但积极投入课堂学习,课外也能够应用元知识,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字词加以联系。此方法同时用在南亚裔中文汉字教学上,并受到了学生、教师、校长和家长的好评。

长远来看,在南亚裔学生开始学习汉字后,涉及汉字字形译码和其他类型的元语言知识,就有机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知识包括:

(a) 学习者的语素意识:“思考形成语素,并运用有关字词”(Kuo & Anderson, 2008, 第47页);

(b) 学习者的形态语素意识:“思考中文语义信息如何编码、拼成字词(即语义部首和复合的语音成分),以及思考字词中字义的提示”(Kuo & Anderson, 2008, 第54页)

南亚裔学生学习中文的困难,源于缺乏口语和书面汉语的各种元语言意识(Kuo &

Anderson, 2008)。如果可以协助学习者建立目标语言的坚实语音基础, 常规课程中以读写为主的教与学也可以得以顺利展开。上述建议如要付诸实施, 将需要教与学各方参与者的共同努力。相信有关措施将有助于改进传统教授汉字的做法, 能够让缺乏汉语语音知识的南亚裔学生有效地学习中文。

### 6.3 拓展南亚裔学生的汉语社交圈

In3F 指出, 他之所以中文口语流利是因为她有很多华裔朋友, 而且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受访者 Pa1F 和 Pa3F 也提到融入说中文的圈子是他们口语流利的原因。乐施会(2014)的报告指六成(60%)南亚裔家长表示其子女每天在家从不或只观看一小时以下粤语电视节目。近半的学童(47.2%)从不阅读教科书以外的中文书籍。此外, 逾七成(71.8%)学生的主要玩伴是相同族裔或以英文沟通的其他族裔朋友。要改善这样的情况, 语常会或其他政府基金可考虑增设南亚裔学生和华裔学生共同参与的拨款项目, 用经费支持等方式提高南亚裔学生参加融合活动的积极性, 强化南亚裔学生和华裔学生的网络圈子, 特别是居住同一小区的学生, 促进同辈间的互动。

### 6.4 努力营造说中文的家庭或小区环境

受访者在焦点访谈中提到缺乏家庭或小区的语言环境也不利于他们学习中文, 一名颇具语言天赋的受访者 Ph1M, 十岁时来港, 精通多种语言, 听说读写的自我评分分别为: 英语(7/7/7/6)、他加禄语(第一语言: 7/7/4/3)、法语(5/5/5/4)(见表3, 参照他的粤方言听说及中文读写的自我评分为3/2/2/2)。受访者外语学习经验丰富, 但在面对中文读写时却一筹莫展, Ph1M 提到, 虽然他在香港生活了12年, 但是由于家人和邻居都给了他中文是不可能学会的印象, 导致他的中文学习也颇为被动。

要改善家庭或小区的语言环境, 就不应该将已经离开校园的南亚裔居民排除在外。面对语言问题的不单是在校的南亚裔学生, 还有在职或求职中的南亚裔居民; 前者有可能因为不谙中文而遭遇升学或就业上的困难, 后者则往往已经碰到了切实的难处。由于两者的需求有异, 因此针对南亚裔社群的中文教学还应该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分。面向南亚裔在职人士的中文教学, 应该以帮助他们了解香港职场文化和行业语言需要为目的, 从而务实地协助他们适应职场环境中具体的工作需要。

即使是在南亚裔居民内部, 着力点也应该根据不同种族的实际情况有所区分。根据香港统计处2011年少数族裔主题报告, 在印度人的工作人口中, 大部分女性是“非技术工人”。大部分巴基斯坦男性工作人口(38.4%)受雇为“非技术工人”, 但有约(42.6%)的女性则为“专业人员/辅助专业人员”。巴基斯坦人(29.5%)多从事“进出口、批发及零售业”。至于尼泊尔人, 从事“住宿及膳食服务业”(31.5%)及“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业”(24.8%)的工作人口比例较高。报告又指出, 同一种族的男性及女性

工作人口从事的行业也有相当大的分别。在尼泊尔人和巴基斯坦人中,从事“建筑业”的工作人口比例,男性(分别是23.2%及18.9%)明显较女性(分别是1.7%及1.8%)为高。另一方面,约有一半尼泊尔裔的女性从事“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但男性从事这行业的比例尚不足20%。根据政府的资料,本文提出如下的建议:首先,对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裔居民需投入更多资源,针对这两国的在职或求职者的语言培训,应该向他们参与较多的工作范围倾斜,并且以提高沟通能力为主;例如课程内容中需要更多包含“进出口、批发及零售业”“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及“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业”等的语境式教学。其次,高中生的语言教学应该从升学和就业两方面入手,对于有志于升学的学生,中国语文的教学必不可少;而对于即将就业的同学,职业语言的培训则更有用,除了帮助他们提前熟悉职场文化,也可以让他们在职业规划上有更清晰的认识(梁慧敏,2016)。只有弄清楚不同南亚族裔的切实需求,政府的资源投入才可以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 7. 结论

香港政府近年加强了支持措施,帮助南亚裔学生应付中文书面语的学习,包括在小区中心提供课后辅导、与语文学者合作,创建方便使用的在线学习资源、吸引专家研究、发展以学校为基础的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课程,后来更取消了“指定学校”(designated school)制度,以方便南亚裔学生和华裔学生在同一学习环境中交流<sup>5⑥</sup>。这些措施是否能有效促进南亚裔学生的中文发展,并满足其课堂中文读写上的需要,仍有待观察。回归后的早期政策措施,严重低估了南亚裔学生面临的语言挑战,另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又没有充分尊重南亚裔学生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宗教和文化习俗)和民族语言身份(Chee, 2012; Gao, 2012a, b; Gu & Patkin, 2013; Ku et al., 2005),以致后来各非政府组织就此类问题提出诸多批评。现通过平机会对不平等现象的监察,社会各界至少可了解到南亚各社群所面对的语言挑战,并积极准备应对方案。

无论是单语还是多语的社会,读写能力的习得都不会在毫无规划的情况下发生(Coulmas, 2013; Lin & Li, 2015; Street, 2003)。与英国殖民地时代不同,1997年以后中文对香港的意义更加重大,特区的语文政策使社会中的“象征性资本”(symbolic capital)产生了巨大变化(Bourdieu, 1991; Gao, 2011)。社会期望南亚裔学生与年龄相若的本地学生一样,能够掌握两文三语。香港行政长官在2014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政府会在幼儿教育至中小学阶段加强支持少数族裔学习中文,同时表明一项独立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正付诸研究,当中会考虑学生的具体语言背景、学习需要和评估模式(关之英,2010,2014),以帮助他们掌握中文,融入主流社会,这种发展应是借鉴于内地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本土化措施,也就是一种“具包容性的多元化中国

国家语言政策模式”（Zhou, 2012, 第 18 页）。

参考 15 名南亚裔学生关于中文学习的问题调查，上文的建议将有助于拉近南亚裔学生与华裔学生的中文差距，并纠正香港社会因不同族裔而产生的语言不公正现象（Ku et al., 2005; Pérez-Milans, 待出）。我们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对症下药，配合适当的语文政策，最后必能惠及更多的青年人乃至整个南亚族群，以配合香港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

#### 附注：

- ① 与中国发展海上贸易，也吸引了一些南亚商人在殖民时期的香港定居，特别是巴斯人和博拉穆斯林贸易商人（Erni & Leung 2014, 第 21 页）。
- ② 香港的南亚裔学生懂得多种语言并不罕见。例如，在巴努（Pannu, 1998）中有关香港印度裔青少年的语言选择和身份的日常生活语言研究中，她的 8 个研究对象（4 位男性，4 位女性）为中学五年级（11 年级），介乎 16-17 岁的学生，他们全部“母语为旁遮普语，但英语和粤语的水平也十分高”（第 224 页）。
- ③ 考生的表现将以五个等级（1 - 5 级）汇报，第 5 级为最高等级。在第 5 级的考生中，成绩最优异的可获评为 5\*\* 级；成绩次佳的获评为 5\* 级；其余的则评为 5 级。（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2011）
- ④ 周有光（1978）对《新华字典》（1971 年版）所收录汉字的形旁和声旁进行了分析，发现该字典中共有汉字 8075 个，形声字共 6524 个，占 81%；李燕、康加深（1993）对 7000 个通用汉字所做的详细结构分析显示，形声字共 5631 个，占通用汉字的 80.5%。
- ⑥ “指定学校”是私人营办的学校，接收很少少数族裔学生，专门照顾少数族裔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其目的是“为非华语学生增加教育机会”，并提供“额外资源，以支持提升非华语学生的学与教”（Erni & Leung, 2014, 第 132 页；更多细节见第 132-137 页）。

#### 参考文献：

- 陈向明 1996 《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6）。
- 丛铁华、岑绍基、祁永华、张群英 2012 《香港少数族裔学生学习中文的研究：理念、挑战与实践》，香港大学出版社。
- 东方日报 2017 《探射灯：中文课程离地 少数族裔前途》，2017 年 6 月 25 日。
- 黄湛利 2016 《香港公务员制度》，香港：中华书局，第 123 页。
- 公民党：《“为少数族裔人士提供的就业支持服务”的意见书》，引自：[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hc/sub\\_com/hs52/papers/hs5220170213cb2/823/1/ec.pdf](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hc/sub_com/hs52/papers/hs5220170213cb2/823/1/ec.pdf)。
- 关之英 2010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误区与对应教学策略之探究》，《中国语文通讯》，91（2）：

61-82.

关之英 2014 《香港中国语文教学(非华语学生)的迷思》,《中国语文通讯》,93(1):39-57.

乐施会 2014 《低收入家庭南亚裔幼儿园学生的中文学习挑战研究调查》,引自:[http://www.oxfam.org.hk/content/98/content\\_20711tc.pdf](http://www.oxfam.org.hk/content/98/content_20711tc.pdf).

乐施会 2016 《中小学为非华语学生提供中文学习支持的研究调查》,引自:[http://www.oxfam.org.hk/content/98/content\\_24801sc.pdf](http://www.oxfam.org.hk/content/98/content_24801sc.pdf).

立法会 2015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交立法会扶贫小组委员会“少数族裔的贫穷问题”意见书》,2015年11月24日。

立法会 2016 《立法会少数族裔权益事宜小组委员会少数族裔儿童的教育》,2016年11月23日。

李贵生、梁慧敏 2010 《香港工作场所中三语使用的初步调查》,《中国语文研究》(1),97-110。

李燕、康加深 1993 《现代汉语形声字声符研究》,陈原主编《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卓敏 1989 《李氏中文字典》,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梁慧敏 2014 《香港工作场所中三语使用情况的再调查》,《中国社会语言学》,23(2):45-59。

梁慧敏 2016 《从香港的语言实况和语文政策探究南亚族裔学习中文的策略》,《中国语言战略》1。

教育局 2014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 Hong Kong,引自:[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overview/Education%20Opportunities%20in%20HK\\_February%202014.pdf](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overview/Education%20Opportunities%20in%20HK_February%202014.pdf).

教育局 2015a 幼儿园校本支持服务 > 大学 - 学校支持计划,取自:<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sch-based-support-for-kindergartens/university-school-support-programmes.html#4>.

教育局 2015b 非华语学童 > 给老师的配套与支持,取自:<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teacher/index.html>.

教育局 2016 《中国语文教育一课程档》,引自:<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html>.

教育署 2001 《为少数族裔儿童提供学校教育》,引自:<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ed/papers/b46c01.pdf>.

教育统筹局 2015 Education facilities for non-Chinese speaking children,引自:[http://www.hkhrm.org.hk/racial%20discrimination/database/eng/nc%20facilities%2004\(final\).pdf](http://www.hkhrm.org.hk/racial%20discrimination/database/eng/nc%20facilities%2004%20(final).pdf).

平等机会委员会 2012 《有关南亚裔人士对种族之间接触及歧视经验的研究》,取自:<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Research/content.aspx?ItemID=10125&mode=cc>.

庞继贤、王敏 2001 二语习得定性研究方法述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王策三 2001 《教育论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王均 1987 《从汉语“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谈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第 168 页。
- 香港 01 周报 2017 《欠“中文第二语言课程”非华语学童困境依然》，2017 年 10 月 13 日。
- 香港城市大学 2003 《香港南亚裔人士就业情况研究报告》（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基金”资助之专题研究成果报告）。
- 香港教育大学 2016 新闻稿《教院录取非华语生》，引自：[https://www.eduhk.hk/main/tc/features/FeatureBanner\\_20160505\\_231607](https://www.eduhk.hk/main/tc/features/FeatureBanner_20160505_231607)。
- 香港浸会大学儿童发展中心 2008 《共融体验活动对儿童及青少年的转变及影响研究报告摘要》（“亲切”委托之专题研究成果报告）。
-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2011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评级程序与水平参照成绩汇报》，引自：[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HKDSE\\_SRR\\_A4\\_Booklet\\_Jun2011.pdf](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HKDSE_SRR_A4_Booklet_Jun2011.pdf)。
- 香港明爱九龙小区中心 2010 《在港南亚裔人士工作状况调查报告》。
- 香港融乐会 2015 《探讨香港非华语学生于本地就读专上教育机会的研究报告》，引自：<http://www.unison.org.hk/DocumentDownload/Researches/R201508%20Post%20Secondary%20Report.pdf>。
-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2014 缺乏配套 学生难达本地中文要求，《社情》2014 年 1 月号。
- 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团体 小区工作部少数族裔服务队 2010 《少数族裔与华裔求职情况比较调查》。
- 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 天主教香港教区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九龙）2012 《南亚裔居民在港的法定最低工资保障及使用政府解困纾贫措施或服务的情况 / 调查结果研究报告》。
- 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 天主教香港教区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九龙）2014 《香港南亚少数族裔家庭贫穷状况民间调查报告 / 南亚少数族裔的状况及需要》。
- 香港行政长官 2013 《二零一三年施政报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3/chi/index.Html>。
- 香港行政长官 2014 《二零一四年施政报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index.Html>。
- 香港行政长官 2015 《二零一五年施政报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index.Html>。
- 香港政府统计处 2001 《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取自 [http://www.censtatd.gov.hk/major\\_projects/2001\\_population\\_census/index\\_tc.jsp](http://www.censtatd.gov.hk/major_projects/2001_population_census/index_tc.jsp)
- 香港政府统计处 2006 《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统计》，取自 [http://www.byccensus2006.gov.hk/tc/index\\_tc.htm](http://www.byccensus2006.gov.hk/tc/index_tc.htm)
- 香港政府统计处 2011 《2011 年香港人口普查》，取自 <http://www.census2011.gov.hk/tc/>。
- 香港政府统计处 2016 《2016 年香港中期人口统计》，取自 [www.byccensus2016.gov.hk/tc/index.html](http://www.byccensus2016.gov.hk/tc/index.html)。
- 香港政府新闻处 2014 《香港便览 2014 - 教育》，<http://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ducation.pdf>。

-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2013a 《倡议政府带头聘用少数族裔人士 解决少数族裔就业问题》。
-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2013b 《少数族裔中学生升学就业感知障碍调查》。
- 香港中文大学 2008 《追踪非华语学童在主流小学适应及成长发展研究报告撮要》(教育局委托之纵向研究成果报告)。
-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2005 《香港种族歧视研究》，取自：<http://www.cuhk.edu.hk/ipro/pressrelease/051028c.htm>。
- 谢锡金、祁永华、岑绍基 2012《非华语学生的中文学与教：课程、教材、教法与评估》，香港大学出版社。
- 袁振华 2007《香港南亚裔学生中文学习的困境及对策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取自：<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511-2008013902.htm>。
- 周有光 1978 《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中国语文》(3)，172-177。
- 庄健 2002 《“注音识字 提前读写”实验成功》，《光明日报》6月17日。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ee, Wai-Chi. 2012. *Envisioned belong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ethnicities in Hong Kong schooling*. *Asian Anthropology*, 11, 89-105.
- Coulmas, Florian. 2013. *Writing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rbaugh, Mary. S. (ed.) 2002. *Difficult charact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riting*.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National East Asia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 Erni, John Nguyet and Leung, Lisa Yuk-ming. 2014. *Understanding South Asian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Gao, Fang. 2011. *Linguistic Capital: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ducational language policies for South Asians i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2(2), 251-263.
- Gao, Fang. 2012a. *Imagined community, identit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22(1), 140-154.
- Gao, Fang. 2012b. *Teacher identity, teaching vision,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ents in Hong Kong*. *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8(1), 89-99.
- Gu, Mingyue and Patkin, John. 2013. *Heritage and identity: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from South Asia in Hong Kong*.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24, 131-141.
- Kan, Vincent and Adamson, Bob. 2010. *Language policies for Hong Kong schools since 1997*.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8(2), 167-176.
- Ku, Hok-bun, Chan, Kam-wah, and Sandhu, Karamjit Kaur. 2005. *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education of South Asian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Hong Kong*.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Th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Kuo, Li-jen, and Anderson, Richard. C. 2008.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omparing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cross languages. In Koda, Keiko and Zehler, Annette. M. (eds.), *Learning to read across languages. Cross-linguistic relationships in first- and second-language literacy development* (pp. 39–67).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Lee, Monique. T.-N., Tse, Shek-kam and Loh, Elizabeth. K.-Y. 2011. The impact of the integrative perceptual approach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Hong Kong kindergarte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1(5), 665-679. DOI: 10.1080/03004431003768006.
- Lee, Kwai-sang. & Leung, Wai-mun. 2012.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in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Hong Kong. *Multilingual Education*, 2:2: 23 pages.
- Li, David Chor-shing. (2017). *Multilingual Hong Kong: Languages, literacies and identitie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Li, David Chor-shing and Chuk, Joanne Yim-ping. 2015. South Asian students' needs for Cantonese and written Chinese in Hong Kong: A linguistic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12(2), 210–224.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4790718.2015.1009375>
- Lin, Angel and Li, David Chor-shing. 2015. Bi/Multilingual literacies in literacy studies. In Rowsell, Jennifer and Pahl, Kate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iteracy studies* (pp. 79–88). Abingdon, UK: Routledge.
- Pérez-Milans, M. (to appear). Bilingu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O. García and Angel Lin (Eds.),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Vol. 5)*. Dordrecht: Springer.
- Peterson, Karl Magnus, Ingvar, Martin and Reis, Alexandra. 2009. Language and literacy from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In David. R. Olson & Nancy. Torrance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iteracy* (pp. 152–1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eet, Brian (2003). What's "new" in New Literacy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5(2), 77– 91.
- Tse, Shek-kam, Marton, Ference, Ki, Wing-wah and Loh, Elizabeth. Ka-ye. 2007. An integrative perceptual approach for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structional Science*, 35, 375–406.
- Tollefson, James W., and Tsui, Amy B.-M. 2014. Language diversity and language policy in educational access and equity.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38, 189–214. DOI: 10.3102/0091732X13506846.
- Zhou, Minglang. 2012.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PRC's minority/indigenous language policy and practice. Nation-state build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Gulbahar. H. Beckett & Gerard. A. Postiglione (eds.), *China's assimilationist language policy. The impact of indigenous/minority literacy and social harmony* (pp. 19-3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李楚成 梁慧敏 香港理工大学)

# 语言变异研究第三思潮的新发展

## ——评《中国的语言与社会变迁——大都市普通话消除平庸》

刘永厚 张颖

**提 要：**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语言变异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语体变异研究逐渐打破了变异学派早期所持的静态观和反应观，开始强调语体的动态观，并充分考虑说话人的主体性。张青（Qing Zhang）的《中国的语言与社会变迁——大都市普通话消除平庸》（2018）新著将语体视为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整合了语言变异研究第三思潮的最新思想，提出了一个以语体为导向并涵盖内容、形式和意义三个维度的语言变异研究新模式。

**关键词：**语言变异；语体变异；大都市普通话；社会语言学

### 1. 语言变异研究的三个思潮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语言学创立之日起，语言变异始终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研究人员寄希望于从共时的语言变异中发现进行中的语言变迁，但共时的变异和历时的变迁总是交织存在，语言变异中蕴含着语言变迁，但又难以捕捉和揭示它。社会语言学者们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曾实践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从广度和深度上将语言变异研究持续向前推进。

埃克特（Eckert 2012）将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研究划归为三个思潮阶段。变异学派代表了第一个思潮，它致力于建立语言变项与社会阶层、性别、年龄和种族等宏观社会范畴之间的相关性，揭示出了语言变异的异质有序性特点，代表研究如拉波夫（Labov 1966；1972）。第二个思潮用民族志学的方法探究了宏观社会范畴如何与人们具体情景中的语言实践相关联，在宏观社会范畴和具体的微观范畴之间建立了联系，为第一思潮宏观的社会调查发现提供了本地的解读视角，例如米尔罗伊（Milroy 1980）研究了个体所属的社会网络类型与土语变项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尽管土语可能在整个社会层面被污名化了，但在微观层面和本土实践中却具有正面价值。这一阶段论及的微观范畴有社交网络、职业群体、学生实践共同体（Eckert 1989；2000）等。至此，前两

个思潮都强调语言是社会范畴的标记，考虑说话人静态的社会范畴，认为身份就等同于范畴属性，聚焦于土语特征或非标准语音特征。

第三个思潮认为语言变异组成一个动态的社会符号系统，它不仅反映静态的社会身份，更是动态建构意义的资源，所以是推动社会变化的重要力量。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语体实践，并将语言变项视为特征的标记。第三思潮聚焦于一切具有区别性意义的语体，如语音特征、句法特征，甚至穿着打扮和其他行为习惯等非语言特征，认为人们的语体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学习和工作的社会差异化中发展而来的，张青（Zhang 2005；2008）代表这一阶段的研究思路。

“变异研究从第一思潮发展到第三思潮，有关语言与社会二者关系的整个视角发生了反转。[第一思潮认为语言反映社会，语言是社会范畴的标记]，第三思潮强调语体实践，认为说话人不是方言被动的、稳定的持有者，而是语体实施者，其在终身的自我建构和差异化发展中不断定制着语体。语言变异模式显然……是一个说话人主动产出社会差异的语体化过程”（Eckert 2012：97-98）。

埃克特教授的学生、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张青（Qing Zhang）的专著《中国的语言与社会变迁——大都市普通话消除平庸》（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ing Commonness Through Cosmopolitan Mandarin）于2018年由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正式出版，代表了第三思潮语体变异研究的最新进展。此书通过丰富翔实的语料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新兴群体、新兴社会阶层的语体差异化发展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挖掘了几个不同历史时期语言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推进了以语体为导向的语言变异研究模式。

## 2.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一个新兴汉语变体（或称语体）展开，作者将其命名为“大都市普通话”（Cosmopolitan Mandarin，简称CM）。书中重点介绍了北京雅皮士群体和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如何在改革开放后把这一新语体用作符号资源来凸显对差异性身份和形象的追求，并探讨了这一新变体如何成为一股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

书中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前两章是研究背景，介绍了语言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普通话兴起的历史以及语体观、拼凑、对话主义和语域化等核心概念；第二部分包括四章，为主体部分，讨论了大都市普通话在塑造北京雅皮士和中国新兴中产消费者群体形象中的作用，以及大都市普通话在语域化初期出现的争议和政府的相关反语域化的努力。最后一章为第三部分，概括了以语体为导向的研究范式，发展了语体变异理论，并预测了大都市普通话和普通话二者将来的发展趋势，讨论了两种语体背后所蕴含的语言意识

形态在推动社会历史变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下文先介绍北京雅皮士和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如何将大都市普通话用作一种符号资源来凸显社会差异。

### 2.1 北京雅皮士——用语言差异建构职业新形象

本书的雅皮士指的是在外企工作、职场地位较高的年轻白领。这一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均显著受西方影响,堪称中国的新中产阶级。北京雅皮士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被识别出来,其语言使用的差异性也伴随其中,他们通过使用不同于国企白领的语音特征来凸显差异,建构出一个有文化、有品位和有涵养的国际大都市白领的身份,与“京腔京调”的“京片子”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作者指出北京话在众多方言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附着在它身上的文化特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自元代起便作为国家的首都,其文化、语言以及众多的文学作品都使得北京话与北京人的形象紧密捆绑,尤其是京味文学的发展与传播更加速了一些典型的北京话语音特征深入人心,而这些语音特征则成了北京人的代名词(p.65)。本书第三章主要讨论了四个语音变项,其中三个是北京本地语音变项,另外一个变项与港台腔有关,被作者称为大都市语音变项。

在三个本地变项中,儿化音(rhotacization)和吞音(lenition of retroflex obstruent initials)被称为“京油子”音位变体。“京油子”旧指北京不务正业、轻浮油滑的人,现多指谙熟北京地区人情世故、办事机灵的北京年轻人,并且多为男性。儿化音如将“名牌、门缝、明”说成“名牌儿、门缝儿、明儿”。吞音现象指音节开头卷舌音sh、zh、ch的弱化,例如“学生”(xuesheng)发成xuereng,“派出所”(paichusuo)发成pairsuor,“同志”(tongzhi)发成tongri;“毛主席”(maozhuxi)发成maoru' i。第三个本地变项是“大舌头”,即舌尖前塞擦音s、z、c的齿间发音(interdental realization of the dental sibilants),比如“现在”(xianzai)发成xiant $\Theta$ ai,“大白菜”(da baicai)发成da bait $\Theta$ ai;“小四他妈”(xiaosi tama)发成xiaot $\Theta$ i tama。“大舌头”现象在书中被称为“胡同串子”音位变体。“胡同串子”是另一种典型的北京人形象,指的是一些从小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游手好闲之徒,一般是来自低下社会阶层的男子。

相比之下,大都市音位变体指的是“轻声的非轻读”(full-tone realization of a neutral tone),即在非重读音节中把轻声发为原来声调的发音方式。例如,在北方普通话尤其是北京普通话中,“学生”和“明白”两个词各自的第二个音节都是轻声;但在南方方言尤其是港台地区,这类词的第二个音节发为原来的声调,这就是“轻声的非轻读”现象。北京雅皮士在言谈中会大量使用这一大都市音位变体。

此项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展开的,调研对象分别是在北京外企和国企的中层及以上管理层的北京职员。调查发现,国企员工总体上更多使用三个本地变项,而外企员工,尤其是女性,在构建职业身份时出于去本土化、崇尚国际化

的意图，会刻意回避本地变项，更多使用大都市变项，以便构建一个区别于本地、也不同于大陆身份特征的大都市国际白领形象。

作者使用布迪厄（Bourdieu 1977）的语言市场理论来解释相关语言现象，认为国企员工参与的是大陆标准普通话语言市场，而外企员工因在工作中常与非大陆人士打交道，他们参与的是跨国汉语语言市场（p.82）。普通话的价值在两个语言市场中有很大不同。在大陆，标准语言市场尚未统一，标准普通话（下文简称“普通话”）还不是社会声望的象征或进入精英阶层的必需条件，所以讲一口不带口音的普通话还未成为大部分中国人追求的社会声望标记，普通话也并不能作为高学历和文化涵养的首要标记。普通话本身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北京土生土长的国企员工直接拥有了普通话的语言资本（作者认为北京土话—北京普通话—标准普通话呈现一个连续体），他们学习普通话的动机并不强烈，在言语中高频使用北京本地变项也就容易理解了。

相反，中国繁荣的跨国贸易催生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兴大都市普通话市场，人们在这个市场中都是商品，需要包装并推销自己，而不带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和外语技能是极具市场价值的语言资本。但此处的普通话不仅包括大陆的标准普通话，同时还包括香港普通话和台湾的“国语”。在这个新的跨国汉语市场中，外企雅皮士们通过使用标准普通话，回避北京本地语音特征，使用去本土化的轻声的非轻读，甚至与英语混搭，创造出了大都市普通话这种跨地区的新变体。它不仅是单纯的沟通工具，更是用来凸显差异的资源，是雅皮士们主动建构国际化白领形象的手段，使用这一变体更方便雅皮士们跟世界各地的客户交流，并能带来更多的商业和职业发展机会。

除了语言变异模式与外企/国企职业性质有关之外，四个语言变项与说话人的性别和话题也有着微妙的联系。相对于外企的男性职员，外企女性员工去本土化做得更为彻底，显著高频使用轻声的非轻读语体；她们清晰的语言表达，再加上其国际化的语音变体，能够展现其区别于中国传统女性的新形象以及专业的商务风格。此外，研究者对外企男女员工访谈时发现，语体的指代意义会因性别而异，有的男性职员使用更多的本地变项来凸显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而女性员工则崇尚大都市变项来建构自己勤奋上进的职业形象。因此，并非所有雅皮士的语体价值观都一致。话题也会显著影响语言变项的使用频率。例如，在讨论与工作有关的话题时，雅皮士们使用本地语音变体的频率显著下降。这一点与库普兰德（Coupland 1980）的早期调查发现相吻合，后者调查了英国加多夫某旅行社一名女员工的职场用语，发现她主要运用三种语体：与同事进行一般会话时使用随意体，与同事讨论工作时使用半正式体，与客户及其他旅行社的员工通电话时使用正式语体。其结论为语体变异与会话参与者和话题等语境因素相关。

## 2.2 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用语言差异凸显生活方式

书中讨论的另一个社会群体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消费者。此项调查是以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一个时尚消费类电视节目“S情报站”(S是shopping的首字母)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两位女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言语特征,揭示了她们是如何通过新语体和元话语符号来引导观众建立一种新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两位主持人不仅在节目中直接给消费者提出建议,而且通过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构建了一种时尚、有品位、大都市的“文化中介”和“文化专家”权威形象(p.109)。

行文至此,需补充一些背景知识。2004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泛开展广播影视界的“净化工程”,要求广播影视要坚持使用标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除特殊需要外,节目主持人必须使用普通话,不要在普通话中夹杂外语,不要模仿港台语的表达方式和发音。但在本节目中,两位主持人的语言实践显然打破了官方规则,从其节目的口号“将shopping进行到底”就可管窥一斑。她们使用了一种全新的主持语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使用大量新词。一些新词体现了都市的新生活方式和新实践行为,如“混搭、泡泡浴、瘦身、香薰疗法”等。一部分新词则体现了新概念,如“酷、撞衫”和“另类”。这些词语不仅有助于填补汉语词汇空白,更重要的是它们附有指代价值,代表着新潮不守旧和去本土化的国际范儿。(2)汉英语码混用。主持人会在汉语句中穿插英文单词,大多是一些与都市新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相关的英语表达法,如DIY、townhouse、spa等。语码混用同样具有指代意义,英语的使用可以提升主持人的国际化形象,凸显其专家地位。(3)使用大都市普通话语音变体。作为公众人物,两个主持人在需要儿化和轻声的语境中仍然坚持“去儿化”和“轻声的非轻读”发音特点,更是凸显了自身的语言风格。

这个节目主要包括了消费、时尚起居和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主持人在描述商品和购物时会反复使用一些元符号词语,例如“选、挑选”“搭、配、搭配”“风格、品味”、“不同、个性、独特、与众不同”等,这些元符号词语实际上可以区别社会地位和消费者身份,传递一种新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这些观念是如何与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挂起钩来的呢?作者提到了“共现”理论(co-occurrence)(Agha 2007)。在节目中与上面这类词语总同时出现的是一些描述消费者社会地位和身份特征的词语,例如“有风格、有修养、与众不同、国际化”等。这两类词语的频繁共现就使得元符号话语附带了指代意义。主持人的言语风格与北京雅皮士很相似,均属于大都市普通话,她们在媒体上策略性地使用这一新语体主动建构一种新中产阶层消费者的形象,从而达到吸引观众,提高节目收视率的目的。反过来,这类语言实践也推动着中国语言和社会的变迁。

### 3. 理论基础

本书运用了拼凑理论、对话理论、语域化理论和指代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

### 3.1 拼凑理论

通过对北京雅皮士、天津电视台娱乐节目主持人使用大都市普通话的量与质的分析，可以看到新语体及其成分所包含的各种语言变项都是新兴社会群体主动凸显差异、建构身份的符号资源，强调了语言不仅是对社会变化的反应，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力量。无论是雅皮士还是节目主持人，他们都是在利用港台腔、标准普通话和英语等语言资源来重新组建大都市普通话这个新语体，而这一过程正是一种“拼凑”。“拼凑”（bricolage）指将多个语言特征以一种有意义的、连贯的方式重组为一种全新语体的过程（Zimman 2017: 5）。这些符号资源的使用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时期内发挥不同的功能，这些资源有意义潜势来应对“指代的突变性”（indexical mutability）（Eckert 2012: 94）。就像北京雅皮士使用大都市普通话，通过去本土化的语音特征来展现与自身职业更为匹配的专业化素养；时尚节目主持人同样使用大都市普通话，同时通过频繁使用与时尚相关的元符号话语以及与职业要求相背的中英语码混用来塑造自己年轻时尚的“文化中介”身份。因此，也可以看出拼凑理论不仅强调了说话人的主体性，而且还需要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来表达特定的意义。

### 3.2 对话理论

在论及语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时，本书运用了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dialogism）。巴赫金认为对话中说话人和听话人同等重要，双方共同创造语言的社会意义，听话人的反应具有主动性。巴赫金反对绝对的结构主义，强调语言中存在规范和创造两个方面，语言结构和个人主体性是一个矛盾体。对话思想反对将语言视作是空洞抽象的语法系统，提出语言是动态的，它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对话理论视角下的语体强调其组成成分隐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其中语言的“对话暗示”（dialogic overtones）是将我们现在所说和之前的表达连接起来的纽带，对话暗示同样是语体形成的关键，因为这种联系涵盖语言所附带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样对于新语体语言资源的使用和其意义潜势就起到了限定作用，提供了产生区别性语体的可能（Bakhtin 1981: 275），这样就使人们更容易理解语体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总之，巴赫金强调语言所附带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对于语体的形成

及其意义的表达十分重要，大都市普通话凸显的语言特征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有助于新语体显示差异和建构身份。

### 3.3 语域化理论和指代分层理论

一个新语体如何被大众识别并且与某些社会文化特质相联系起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分析大都市普通话的语域化过程。语域化（enregisterment）指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被特定人群确认为某种不同语域系统的过程（Agha 2003: 231）。例如，在新中国

建国初期,平等的思想被广泛呼吁,“同志”这一称呼语的流行便是当时同质性时代的见证。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同质的身份,纷纷通过各种语言资源来建构个人的社会身份,张扬个性,突显能力,大都市普通话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打破了改革开放前的同质性,而这个过程涉及到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的指代分层(indexical order)理论认为指代分层通过意识形态的中介来锁定语言的指代意义和识解语言的指代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指代形式的指代价值而言,其第 $n+1$ 层的指代价值通常是内在的,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参与而形成的,并且是对基于其第 $n$ 层指代意义的识解,并且这种识解是通过第 $n$ 层指代内在的意识形态来中介完成的。大都市普通话的第 $n$ 层指代意义是地域联系,即与香港、台湾和南方联系,但当这一变体开始与普通话竞争时,它便具有了第 $n+1$ 层的指代意义,即跨地域的社会性区别,即有品位、时尚、国际化、年轻化等意义。

然而,大都市普通话仍处于语域化的早期阶段,第五章主要讲述大都市普通话第 $n+1$ 层指代意义在社会上存在的争议。政府层面出于对普通话权威地位的维护,反对大都市普通话语域化,批评港台腔“假”和“不标准”。此时,大都市普通话第 $n+1$ 层的指代意义就变成了不标准和崇洋媚外;相反,普通话的第 $n+1$ 层的指代意义则是标准和民族自信心的体现。

而对于支持大都市普通话语域化的群体来说,他们同样不支持普通话第 $n+1$ 层指代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通话的 $n+1$ 层指代意义的识解过程同样因意识形态的中介作用而存在争议。正因如此,作者将大都市普通话与普通话的指代意义表述为“循环识解”。人们在使用中会反复对二者进行考量,因为这两种语体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工具,更是建构身份的资源,它们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紧密相联系。作者也对大都市普通话的未来进行了预测,认为其使用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但它不会取代普通话,二者会分工互补,承载不同的指代意义,在不同方面发挥作用。

#### 4. 评述

本书理论探究和语料分析相得益彰,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对汉语的语言规划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 4.1 理论基础方面

本书容易给读者一种众多小理论杂糅的印象,但各个理论的运用和整合总体上做到了彼此兼容。作者将语体描述为一个逐步浮现的差异系统,指出大都市普通话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汉语通用语在与世界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语体,因新兴群体表达心理诉求和建构身份之需而兴起,它最显著的两大语音特征(去本土化和轻声的非轻读)



被视作国际化的象征。所以在本书中，语体变异被视为是建构主体特征、群体身份和社会范畴的重要方式，这使得微观范畴和宏观社会结构有了深层次的结合与互动。而贯穿全书的对话思想和主体间性的对话主义，同样也强调了语体意义的产生离不开与个体使用者以及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维度的协商对话。

此外，书中多次强调语体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这一思想。书中的主要理论均体现了语体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特征。对话理论的核心概念“对话暗示”本身就是嵌构了历史文化内涵，是连接现在和将来的重要桥梁；拼凑理论也是利用各种现有的资源进行新形式和新意义的构建，这种建构同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语域化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新的语言形式获得社会意义的过程就是这种新语体如何从指代项（indicator）发展为标记项（marker）继而最终演变为稳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社会历史过程。

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表示联系微观语言和宏观世界的枢纽是指代层次，而语体的指代意义最终是由语言意识形态为中介而形成并最终趋于稳定。语言意识形态的形成，通常要经过符号化（iconization）、递归（fractal recursivity）和消除（erasure）这三个符号过程（Irvine 2001）。符号化指某些语言符号和某种社会文化元素频繁地共现之后，其社会文化含义便逐渐附着在这些语言符号上的过程。例如北京社会文化因素逐渐附着在某些北京话语音特征上的过程。递归指语言变体之间的意义差异被重复用来建构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对比，这一过程将微妙的区别性特征与宏观的群体对比联系了起来。消除指把一个异质的群体同质化，消除其内部个体差异。例如，当人们听到儿化音和吞音，就会联想到北京人的“油”这一整体性格特征。

以上提到的各种研究思想均清晰地展现了语体研究的几个最新动向：动态观，语体是一种会话双方协商意义的动态资源和互动的过程；整体观，最新的语体研究要兼顾语言的语体变异和社会变异；语言意识形态的中介观，语体之所以能够激发和创建意义，原因在于它本质上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刘永厚 2019）。

#### 4.2 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

在回答语体如何引起社会变迁这一问题时，作者提出一个内容、形式和意义的语体三维度新模式。其中，在形式方面，新差异的创造有五种途径：群体间的对比、明确打破规定性的传统变异规则、策略性的“声音”对比、不同语言变体的前后对比、内容和形式的同步性。这一新框架为语体变异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深入的分析视角，使得社会语言学朝着语言变异的第三思潮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本书主要语料的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习近平主席 2015 年新年贺词，后者分析了“蛮”和“点赞”两个流行词的用法。语料的时间跨度、地域跨度（北京和

天津)和不同职业群体(私、国企员工和时尚节目主持人)的翔实语料均提升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为更好地了解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为研究国家历史文化进程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此外,研究内容还涉及到大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背景知识,诸如京味文学、京片和胡同串子等典型的北京人形象,这都与国际化的大都市普通话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内容为热衷于中国文化的读者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田海龙 2018: 476)。同时,研究结果能够为解决一些社会争议和某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考方式和解决方法。例如,从大都市普通话和普通话的功能互补这一点上看,对我们的语言规划具有一定的启示,语言规划可以采取“引导向规范靠拢,但是又不强行规定”的立场(周清海 2018)。

大都市普通话语体其实就是一种华语变体,它就如同北美汉语一样,“兼容陆、台、港的语言特点,同时也广泛受到英语影响,逐渐形成有特色的华语变体”(李宇明 2017: 10)。众多华语变体的存在均有其意义,这也就是多样性的价值。周明朗(2017: 23)认为以普通话为标准的全球华语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语言生活需要,不足以表达人们的各种身份认同,所以需要标准华语的变体来满足华语世界的语言生活。

因此,本文认为将大都市普通话置于华语或者大华语变体的范畴中加以研究将更加有助于理解其起因和存在的价值,有益于探讨它与其他华语变体的关系,并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预测各个变体的发展前景。

## 5. 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标题中的 commonness 一语双关,即包含了大都市普通话突破了 common speech(普通话)的限制,弥补了其功能之不足,同时也体现了一些新兴社会群体在语言使用和生活方式上拒绝走“平庸”路线,借助大都市普通话来标新立异,追求个性。

总之,本书包含了社会语言学领域语言变异研究的最新动向,做到了理论传承和创新并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中意趣共存的文化内涵挖掘为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值得对语言变异和变迁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和阶层变迁等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对华语变体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亦是一本好书。

### 参考文献:

- 李宇明 2017 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2-13页。  
刘永厚 2019 语体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路径、热点与趋势,《现代外语》第2期,280-289页。  
周清海 2018 新加坡的华语与华人,国家语委 2018 年国际高端专家交流项目讲座,《语言战略研究》

12月9日公众号。

周明朗 2017 全球华语大同? 《语言战略研究》第 1 期, 18-24。

Agha, A. 2003. The social life of cultural value.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3 (3/4): 231-273.

Agha, A. 2007.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khtin, M.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lated by C. Emerson and Michael, H.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ourdieu, P. 1977. 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chang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6 (6): 645-668.

Coupland, N. 1980. Style-shifting in a Cardiff work-setting. *Language in Society* 9 (1): 1-12.

Eckert P. 1989. *Jocks and Burnouts: Social Categories and Identity in the High School*. New York: Teach. Coll. Press.

Eckert, P. 2000. *Linguistic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Oxford: Blackwell.

Eckert, P. 2012. Three waves of variation study: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1): 87-100.

Irvine, J. 2001. "Style" as distinctiveness: The culture and ideology of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In P. Eckert & J. Rickford (eds.).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43.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Labov, W.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Milroy, L. 1980.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Oxford: Blackwell

Silverstein, M. 2003.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3 (3/4): 193-229.

Tian H. L. 2018. Book review: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ing Commonness Through Cosmopolitan Mandari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2 (4): 473-477.

Zhang Q. 2005. A Chinese yuppie in Beijing: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rofessional identity. *Language in Society* 34 (3): 431-466

Zhang Q. 2008. Rhotacization and the "Beijing Smooth Operator" : the social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variabl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 (2): 201-222

Zimman, L. 2017. Gender as stylistic bricolage: transmasculine voic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damental frequency and /s/. *Language in Society* 46 (3): 339-370.

## **New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ave of Language Variation Studies: A Review of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 Commonness of Cosmopolitan Mandarin**

*Liu Yonghou Zhang Ying*

**Abstract:** As language variation research develops in sociolinguistics, stylistic variation studies have gradually gotten rid of the static and responsive stances of variationism, and have adopted a dynamic viewpoint towards style, taking more account of speaker agency. Qing Zhang's latest monograph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 Commonness of Cosmopolitan Mandarin* (2018) treats style as a sociohistorical process, integrates the latest thoughts in the third wave of language variation studies, and proposes a style-oriented research model, which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of content, form and meaning.

**Key words:** language variation, stylistic variation, Cosmopolitan Mandarin (CM), sociolinguistics

(刘永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张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